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馬來西亞華人新村的社會與空間變遷研究—

以拱橋新村為例

Changing Spatial Forms and Society in Chinese New Villages of Malaysia—

Case studies of Kampung Kanthan Baru

研究生：古燕秋

Yen Chew, Foo

指導教授：張聖琳

Advisor: Sheng Lin, Chang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July, 2011

謝誌

到了下筆這一刻，我才發現自己是個多麼幸運的人。當了三年的研究生，我必須感謝很多生命中的貴人，因為他們讓我可以順遂及快樂地完成學業。首先，我要感謝指導老師聖琳。從碩二開始，老師不幸接收到一個頭腦只有「邊緣」的學生，耐心及持續與我討論及修正研究主題。在論文寫作時，老師在百忙中依然適時的提醒和質疑，幫助我釐清許多寫作盲點。感謝老師的包容，無論我消失或出現，永遠都給我微笑和鼓勵。我非常感恩可以選修邢幼田老師的課，我在一年的課程中獲益良多。除了閱讀到許多有趣的書外，也讓我窺探到田野研究和資料分析的奧妙之處，慢慢愛上唸書及思考的樂趣。謝謝邢老師從論文開始之初，就一直耐心+愛心地認真與我討論，給予我許多想法和刺激。感謝桂林小組實習課的劉可強及陳育貞老師。兩位老師總是樂於和我們分享規劃想法，刺激和鼓勵學生面對真實環境中的規劃難題和挑戰。你們認真教學及關心學生的態度讓我很感動。我也永遠記得在新生座談會時，夏老師關心我的家庭狀況及提出幫助我讀書的事情。我也要感謝強大的口委陣容（劉老師、夏老師、邢老師）成員在口試時，給予我許多寶貴的建議，讓我可以跳脫出來重新閱讀及修正我的論文。

我要謝謝啟蒙老師楊祖珺及阿偉。如果不是祖珺老師鼓勵我唸研究所，我想我可能只是夢中的我，活在夢想中卻不曾真實面對內心的渴望。謝謝老師亦師亦母的關愛，你是第一個讓我喜歡上台灣的人。如果不曾在阿偉的教導下學習融入田野和研究倫理，甚至勇敢面對研究者個人的情緒，我想自己是無法在一個清醒和穩定的狀態下面對我的論文，甚至於更年輕時候自己的生命經歷。總是忙碌的阿偉在這三年中，依然與我保持淡淡的聯繫，我謝謝你的愛護。小時候，我從來不敢奢望可以唸大學，更何況是研究所。我非常幸運唸大專時得到明記叔叔提供學費及生活費，沒有你的幫助我可能早就要出社會工作。謝謝林若德先生及潘斯里梁婉清女士提供我緊急助學金，踏出到台灣升學的第一步。每每見面時，林若

德先生總是用聖經的話來勉勵我努力向上，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心靈安慰。我要謝謝漢平，如果沒有你的幫助，我是無法順利完成研究所課程。我在你身上學習到據理力爭和「知天命」的生活態度，雖然你總是叫我「不要在意」，但感謝你滿滿的愛心和支持。我深深感謝所有田野的受訪者，你們願意信任我並且分享生命中真實的故事，賦予這篇論文深刻的精神樣貌，使它成為可以說話的文章。

謝謝桂林小組的飛龍、一杯、圓圓山、總圖及小李，讓我有一段難忘的實習經驗；謝謝沛霖在某段時間的陪伴；感謝珩婷總是送我小零食及背後的友誼大心；謝謝 Mimi 口試時情義相挺；謝謝玲瑋、小熊、韻筑、婉玲在值班時歡樂相陪；謝謝發哥特地出席畢典和平常的妙語如珠；謝謝盈萱經常的一針見血；謝謝德容和孟琪在邢老師課的陪伴，又認真聽我講田野瑣事；謝謝維修及最後一學期認識的慕思勉的各種提醒。我要特別感謝鍾姐姐和凱哥，你們真是一對活寶，讓我這三年充分感受到同學愛是多麼珍貴及美好的情誼。謝謝家容和小王的照顧，有你們在真安心。謝謝永遠的 912 室友佩璇、阿方和阿胡，和你們在一起好開心，瞬間忘記研究所的壓力。感謝的情緒是可以跨海傳達，我要謝謝 77 媽咪，如果沒有你的照顧、分享和分擔，我想我已陣亡於研一時刻；謝謝我的最愛小洋及志菲，你們在我心裡總是一股安穩的力量；謝謝華華，永遠在我需要時，永遠不對我說「不」的好姐妹。這裡感謝所有幫助我的朋友，原諒我無法一一列出你們的名字。最後，我要感謝我最親愛的家人。謝謝弟妹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永遠都支持我。在必要時二話不說掏鈔票，即使你們只是打工仔；謝謝你們的懂事和乖巧，讓我能安心唸書；每次唸書及寫作時情緒爆炸，感謝你們在不明就理下依然鼓勵和肯定我。謝謝外婆對孫女的包容，謝謝可愛的瀚瀚和嫦曦。謝謝我的爸媽，你們讓我有快樂和幸福的童年，也讓我不得不面對生命的最痛。你們的犧牲和奉獻灌溉了家中的小孩，叫他們學習堅強和樂觀面對人生，謝謝你們，我永遠愛你們。最後的最後，感謝主，你的愛何等長闊高深，我願盡我所能，榮耀你的名，Amen。

100 年 7 月 · 臺灣大學的最後一個夏天

摘要

社會和空間是互相辯證的關係。社會在生產特殊歷史和文化的空間時，空間也在建構與影響社會關係，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由於創造空間的社會具有「非停滯」性質，所以本研究視社會與空間是一個動態過程，包括表現出「中心」與「邊緣」相互流動的現象。馬來西亞華人新村是英政府為了對付馬來亞共產黨而建立的居住聚落，早期具有監視與隔離的空間特色。本文希望透過研究個案—**拱橋新村**特殊的族裔地景，來探討不同族裔之間的階級流動（社會）與空間隔離與排斥（空間）的相互流動關係。

我將在第二章分析英殖民時期不同政治權力，包括英政府及馬共與華人村民的互動，如何形塑新村的空間隔離特色。第三章則是聚焦在國家獨立之後，政府推行具有社會排除性質的新經濟政策，邊緣化華人族群及新村，村民透過跳飛機提升階級地位並且改變新村的空間景觀。在全球化的今天，越來越多勞工跨國流動他鄉。第四章將探討華人村民與外勞在互動的過程中，不停改變與置換他們在社會與空間裡的階級位置，並且造成排斥性的公共空間現象。同時，我也發現流行的文化與節慶活動是連結不同族群，並且形塑跨文化空間的契機。最後，本研究認為社會與空間裡流動的中心與邊緣過程，只發生在拱橋新村的下層階級，實際上華人族群依然處於國家發展的邊緣地帶。

關鍵字：華人新村、社會關係、隔離空間、排斥性、地景、階級

Abstract

My thesis analyzes the dynamic socio-spatial relationship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Kanthan Baru of Chinese New Villages in Malaysia. Based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 investigate the changing ethnoscape in the new village and how the physical forms embody segregation and exclusion between the mainstream Malaysians and marginal Chinese, as well as the new Asian immigrant works.

First, I introduce how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battling with the communists in the rural Malaysia. Chinese New Village presented segregated and marginalized landscapes that mirrored British power. Second, I analyze how Chinese ethnic was marginalized by economy, culture, education and was “rejected” by the public servant under New Economy Policy (NEP). Chinese villagers of Kanthan Baru became illegal workers in oversea countries such as Britain, United States, Japan, in order to seek opportunity. Some of them succeeded in improving economic situations and thus transformed the landscape. In 1980s, industrialization of Kanthan Area was brought a large number of Asian immigrant workers from Indonesia, Nepal, Thailand, who relocated the Kanthan Area. Third, I investigate how the newcomers of Asian workers interact with Chinese villagers and how they have been negotiating new boundaries and transcultural spaces within these Chinese New Villages.

By examining field data, I argue that built environments are not only the container of our society, but also the interactive processes that response to essential forces driving from socio-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In conclusion, I suppose changing of social mobility and spatial segregation/ exclusion are limited in lower classes, Chinese Malaysians are still marginality of the country.

Keywords: ethnic Chinese, New Village, marginality, social mobility, landscape

目錄

第一章 諸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	3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發問-----	8
第四節 理論分析與研究架構-----	10
第五節 研究地點與方法-----	19

第二章 政治權力塑造的華人新村

第一節 華人移民的政治認同及新村空間特色-----	30
第二節 英政府、馬共與拱橋村民權力互動過程-----	32
第三節 第二次戒嚴行動與村民挪用空間-----	44
小結 強與弱的權力交織及空間之主動性-----	50

第三章 邊緣化政策與逆流向上的村民

第一節 從國家政策看政府與華人族群的關係-----	53
第二節 離鄉謀出路的拱橋村民-----	60
第三節 拱橋新村內／外部的空間變化-----	75
小結 低層村民的主動性及拱橋新村擴張地域範圍-----	80

第四章 翻轉中心與邊緣的多元社會與空間

第一節 馬來西亞國家政策的轉變-----	83
第二節 工業化後的拱橋地區與新的社會結構-----	85
第三節 拱橋地區不同族裔空間之排斥性-----	93
第四節 實踐跨文化空間的可能性-----	106
小結 下層的階級流動與空間排斥-----	111

第五章 結論-----

115

參考書目-----	121
-----------	-----

圖目錄

圖 1-1 馬來西亞位置圖	3
圖 1-2 研究分析	17
圖 1-3 寫作架構	18
圖 1-4 西馬的華人新村分布圖	19
圖 1-5 霹靂州拱橋新村位置圖	19
圖 2-1 華人新村空間規劃圖	32
圖 2-2 未搬遷前的老拱橋地區	33
圖 2-3 拱橋新村位置	34
圖 2-4 灶頭	35
圖 2-5 木床	35
圖 2-6 茅草或亞答木屋	35
圖 2-7 瞭望塔	37
圖 2-8 帶刺鐵線網及油燈	37
圖 2-9 新村大閘門	38
圖 2-10 軍警嚴格檢視汽車,確保村民沒有攜帶食物出去	38
圖 2-11 軍警檢查村民的登記	39
圖 2-12 米牌	40
圖 2-13 工人正在煮大鑊飯	41
圖 2-14 村民在大鑊飯廚房外等待領取白飯	41
圖 2-15 圍鐵線網的柱頭	48
圖 2-16 拱橋新村大路旁還能看見一些殘留的柱頭	48
圖 2-17 戒嚴柱頭	49
圖 2-18 居民再利用柱頭搭成小棚子	49
圖 2-19 柱頭的其它用處	49
圖 3-1 巴剎(菜市場)	76
圖 3-2 籃球場	76
圖 3-3 新村木板屋	77
圖 3-4 新村入口牌樓	77
圖 3-5 新村的新建房屋	77
圖 3-6 新式洋房	77
圖 3-7 拱橋新村關帝廟	78
圖 3-8 關帝廟多元禮堂外觀	78
圖 3-9 單層房屋住宅區	79
圖 3-10 雙層樓花園住宅區	79

圖 3-11 新興住宅區位置圖-----	80
圖 3-12 拱橋輝煌花園-----	80
圖 4-1 拱橋地區-----	85
圖 4-2 拱橋新村的公共空間-----	95
圖 4-3 拱橋新村夜市場-----	95
圖 4-4 外勞在衣飾攤前-----	95
圖 4-5 外勞在樹下談天-----	97
圖 4-6 拱橋新村籃球場-----	97
圖 4-7 中華小學草場-----	97
圖 4-8 外勞住的拱橋新村木板屋-----	99
圖 4-9 其中一條通往新村與花園住宅區的路-----	99
圖 4-10 閒置店屋成為外勞住所-----	99
圖 4-11 外勞夜市場與休閒公園位置圖-----	100
圖 4-12 外勞挑選食材-----	101
圖 4-13 女性勞工正在買熟食作晚餐-----	101
圖 4-14 通訊店-----	102
圖 4-15 坐在大路旁的外勞-----	102
圖 4-16 在馬路聚集談天的外勞-----	103
圖 4-17 Shagorika 雜貨店-----	103
圖 4-18 平常公園一景-----	104
圖 4-19 外勞在公園談天-----	104
圖 4-20 外勞正在玩英式籃球-----	105
圖 4-21 關帝廟舉行舞獅儀式-----	107
圖 4-22 多元禮堂共同聚餐活動-----	107
圖 4-23 傳統戲劇較不能吸引村民-----	108
圖 4-24 拱橋中華小學文藝匯演吸引眾多村民-----	108
圖 4-25 關帝廟空間示意圖-----	109
圖 4-26 外勞在欄杆外撐雨傘看表演-----	109
圖 4-27 外勞坐在禮堂邊緣的椅子-----	109

表目錄

表 1 受訪者的名單及基礎資料-----	26
----------------------	----

第一章 諸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我是在馬來西亞華人新村長大的小孩。小時候，我和爸媽及弟妹共同擠在老家的一間房間裡生活，最羨慕的是別人有能力購買屋子搬出去居住。我居住的新村以製鞋聞名，新村很多人在自家或是別人的住家工廠製鞋，也有部分大人(通常是男人)從事耕種、菜園、養魚或是工廠工人。很多人為了改善家計，選擇飄洋過海到外國跳飛機，賺取金錢回到家鄉做小生意、買車子、修建房子，或是搬出新村。還記得小時候，鄰居的哥哥，姊姊，家中的親戚會在我生命中消失好幾年，當他們回來時感覺「走路都有風」。戀家的爸爸為了妻子和小孩將來的生活，向親戚借貸到日本跳飛機。媽媽和我們在家裡都非常想念爸爸，有一次小弟生病了，媽媽抱著弟弟在觀音菩薩面前掉眼淚的情景深烙在我童年深處的記憶裡。那時候，我和弟妹格外聽話乖巧，深怕為媽媽帶來更大的負擔。幾個月後，在日本受到雇主惡劣對待及思家心切的爸爸，終於回到新村裡。爸爸說他在日本時是築路工人，每天半夜才開始工作，日本雇主還經常敲打他的頭。對於居住在赤道的人而言，日本天氣嚴寒得讓人心驚，加上工作環境很糟糕，爸爸在國外十分掛念家人，最後他沒賺到我們買屋子的錢就回到新村了。雖然我們家還是沒錢，但當時我覺得開心極了，因為我有一個完整的家。再後來的一段時間裡，爸爸不幸生病了，永遠離開我們的家。

我常在想如果爸爸沒有出國跳飛機，沒有經過那段艱辛的外勞生活，他是否可以陪伴我和弟妹長大？為什麼他要離開我們？為什麼爸爸無法在新村找到好的工作？長大後，周圍的朋友和玩伴也紛紛離鄉，他們有的到城市升學，有的到國外唸書，還有很多是到外國合法或非法的工作。當中，包括一直在外地唸書、回鄉工作、出國升學的自己。從小的成長環境及從事採訪的工作經驗，讓我心裡留下一個很大的疑問，為什麼華人新村的居民，他們要出國跳飛機才能「找到吃」？

大部份新村年輕人(甚至是我)無不希望離開新村，到城市或是外國就業發展，甚至定居在那裡。超過半個世紀歷史的華人新村落得人口凋零困境，讓我覺得很難過又疑惑。最近幾年，我發現新村出現了膚色比華人更深的外勞，新村裡的人(包括自己)對他們格外戒備，凡是發生不好的事情，例如打劫、強姦，大家第一反應是：外勞幹的嗎？當我再長大一些時，某一天我忽然想到當年在外面工作的爸爸、表哥、鄰居的伯伯，他們也曾經遭受這種「在地」歧視嗎？是什麼原因造成人類不斷遷移，還要適應完全不同的生活環境？我帶著心中的疑問進入城鄉所，我希望透過研究華人新村，可以更深入瞭解自己成長的地方，甚至解答一題對我生命而言非常重要的問題。



第二節 研究背景



圖 1-1 馬來西亞位置圖

馬來半島曾經是葡萄牙、荷蘭和英國殖民地，第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也曾經統治馬來半島 3 年 8 個月。戰爭結束後，英國恢復殖民馬來半島，但人民要求獨立建國。1957 年，馬來亞聯邦宣佈獨立；1963 年，沙巴、砂勞越和新加坡以州名義加盟，正式成立「馬來西亞」(Malaysia)。1965 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建立新加坡共和國。現今的馬來西亞是由 13 個州和 3 個聯邦直轄區組成，這是一個多元族群¹和文化的國家。截至 2009 年，全國共有 2830 萬人口，馬來人占 54.9%，原住民 11.9%；華裔 24.5% (約 640 萬人)、印度人 7.4% 及其他 1.3%。²在馬來半島，族群被定義為「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和「其他」。³馬來人是馬來半島的較早時期的住民，最早是由印尼移至馬來半島。華人和印度人則是在英殖民時期才大量進入馬來半島。

¹ 本文不以「種族」(racial group)來分類人口，因為根據馬來西亞憲法，「馬來人」意即出生在馬來西亞、能夠講述馬來話、遵守馬來習俗及信奉伊斯蘭教的人民。馬來西亞人口是以族群特質(文化、共享經驗、語言等)來分類，故本文以「族群」(ethnic group)概念來指涉華人、馬來人、印度人或其他相關社群，而不是以人種的膚色、體質等。

²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 (October 2009). *Statistics Handbook Malaysia 2009*.

³ 這份研究報告主要是討論西馬半島的族群。東馬州屬沙巴和砂勞越，除了馬華印族群外，還有原住民，他們並不在本文的討論範疇。

馬來西亞華人族群是早期的中國移民，也是僅次馬來族群的第二大國家族群，他們的祖先主要來自廣東和福建省。15 世紀，第一代華人移居到馬來半島時，也就是最初華裔墾耕者。18 世紀，越來越多華人前來馬來半島。當時他們主要居住在礦場、港口城市或是農村(Lee, Tan 2000)。20 世紀初，英政府掌控整個馬來半島，華人移民也就更進一步增加。根據統計，1911 年馬來半島及海峽殖民地人口數當中，華人共有 87 萬 4200 人(謝詩堅 1984)。當時錫礦工業迅速成長與發展，迫切需要大量勞工。不少中國人因此南來馬來半島，他們登岸地點多為新加坡及檳城兩地(礦務總會編著 2002)。華人新移民主要集中在馬六甲、霹靂拉律、吉隆坡等地開採錫礦(周宗仁 1997)。在一般人印象中，華人在移民國家都享有比較優勢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但這只是華人族群內部的少數現象。華人移民組成的社會包含不同生活階層的人民。

文平強(2009)指出從 18 世紀開始，華人開始種植甘蔗、木薯、胡椒等，成為種植業先驅。馬來半島錫礦業促進土地開發和人口聚集，吸引大量華人湧入礦區。1870 年，近打河流域發現大量錫礦後，大批華裔礦工從拉律區前來。1890 年，霹靂所有大礦家都是華人。到了 1929 年，歐洲公司憑著技術和資金優勢支配整個錫礦市場。除了種植業和錫礦業，橡膠業也是華人企業家涉及的主要產業。橡膠業佼佼者包括陳嘉庚及女婿李光前(南益橡膠公司)。根據官方數據，華人擁有馬來半島橡膠園之總面積的 30%，僅次於歐洲人。許多華人申請到承購橡膠的准證後，建立起橡膠經銷網絡。這些經銷商作為第一線買主，是鄉鎮地區的小園主們最直接的現金來源。侯政宏(2002)指出早期的華人移民也扮演中間人角色，從事轉口貿易，華裔負責和其他地區交換當地土著的產品及其他地區生產的商品。華人投資經營的小生意，是城市經濟的支柱。他們扮演多種角色，在商業和貿易、礦業和農業的開發上，扮演資金和勞動力供應的角色。在發展過程中，華人的處境各有不同，少數人在殖民當局的自由放任政策下成功把握機會而飛黃騰達，但大部分人並非如此幸運。在一般人印象中，華人在經濟上都非常成功，這只是看

到局部現象，事實上華人社群整體的面貌非常複雜。在殖民時期的馬來亞，許多鄉村地區的華人只不過是沒有土地，在礦場或種植園工作的苦力；而在城鎮裡，許多華人只能當人力車夫或受雇勞工，終生在「下層社會」掙扎求存。

在日本佔領馬來亞之前，華裔墾耕者人數已經高達 15 萬人，並在 1945 年達到 40 萬人。墾耕者人數在日治時期帶來深遠影響。他們不但增加糧食供應，後期也加入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日本佔領馬來半島(1942-1945)期間，許多原來在居住在城市的礦場工人、勞工、種植園工等紛紛逃到森林邊緣。他們當中有些人更是加入馬來亞共產黨(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CP)。馬共在日治時期，協助英殖民政府攻擊日本軍，英殖民政府戰爭專家在森林裡為共產黨提供訓練，形成一股強大力量，也就是馬來亞人民抗日軍(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MPAJA) (Ngin 1985)。二戰後，馬共成為合法政黨，而且開始在多個團體，特別是勞工組織發揮影響力，並且發起反殖民運動。在 1947 至 1948 年，英殖民政府認為馬共的影響力將損害他們的長期利益，於是推出新法律壓制勞工，扣留馬共和其支持者，並宣佈馬共是非法組織(林廷輝、方天養 2005)。1948 年，馬共決定放棄戰後以來採取的議會政治路線，改採武裝鬥爭，並遁入森林展開游擊戰。為了與外界聯繫與取得支援，馬共便在森林邊緣地區廣泛建立外援網絡，或招募或脅逼居住在森林邊緣墾殖的華人墾耕者提供資源。馬共把這些人視為主要補給來源，將他們編制入「人民運動」(民運)組織。因此，「民運」成為馬共重要外圍組織，並站在馬共活動第一線上。民運人員任務廣泛而複雜，他們不但是馬共軍隊的來源，也是後勤部隊，從事物資補給，經費籌募及情報收集等工作。他們隱身在民眾之中，與老百姓無異，很難辨識(潘婉明 2004)。

為了打擊馬共獲得民運組織的補給，英國殖民政府在馬來亞規劃一連串的剿共措施，甚至想要遣送華人墾耕者回到中國，並在 1948 年頒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然而，「緊急狀態」頒布初期，剿共效果並不彰顯，殖民政府檢討認為

癥結出於有關單位的協調和配合問題上，乃決定委派森林作戰專家布利克斯准將 (Lieutenant-General Sir Harold Briggs) 前來馬來亞出任作戰指揮官，負責籌劃、協調和指揮軍警聯合作戰任務。布利克斯抵達後，立即發表「布利克斯計劃」(Briggs Plan) 作戰計劃。布利克斯認為在偏遠地區或森林邊緣開墾的華人墾民，都曾經自願或被迫資助馬共分子。因此，設法隔離大批華人，以避免他們成為馬共「後援隊」乃是當務之急，遂提出「新村計劃」，將涉嫌華人移殖(resettlement)到特定地點或範圍。在此計劃下。受影響的人口多達 50 餘萬人，主要遷移對象是華人。為了防範共產黨，新村築起籬笆網、閘門、瞭望台等空間隔離設置，村民過著猶如集中營式的生活 (潘婉明 2004)。

截至 2002 年為止，全馬共有 450 個華人新村。新村從早期的族群隔離空間，成為國家發展邊緣的地帶。經過半個世紀發展，全國的新村目前大致分成三類，即是**市區邊緣新村**、**半城鎮周邊新村**及**鄉區新村**。有些新村因為地理位置關係，蛻變成為城市化的新村，例如：雪蘭莪州的沙登、雙溪威、雙溪毛糯和蕉賴 11 里新村，以及吉隆坡的增江和沙叻秀新村。這些靠近城市的外圍新村開發中小型工業，周圍地區發展蓬勃。這些靠近市中心外圍地區的新村，已經成為國家發展主流的一部分(林廷輝、方天養 2005)。例如全國「老大」的增江新村。增江新村位於吉隆坡北部，介於甲洞、怡保路與古晉路之間，因為中間有甲洞路分隔，形成增江「南區」與「北區」。增江北區有 3600 間房子，南區擁有 970 間房子(不包括花園住宅、組屋和公寓在內)，有高達 6 萬名居住人口及 1000 英畝面積的土地。隨著時代變遷，增江新村已經擺脫傳統新村的面貌，變成繁榮小市鎮，大部份房子也翻新成鋼骨水泥，新村裡四處可見高樓建築物(章菁燕 2010)。

另外一個城市化新村是沙登新村。沙登新村位於雪蘭莪州南部，是全國第二大的新村。沙登不僅與聯邦直轄區吉隆坡為鄰，還銜接直通政府行政中心布城的道路，更是通往南部的**主要門檻**，交通四通八達，讓他成為州內快速發展的重鎮

之一。雖然沙登已經易名為史里肯邦安新村(Sri Kembangan)，但大家依然習慣稱呼他沙登新村。沙登新村以「製鞋業」聞名全國，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期間，不少村民隨時代發展而改農從商，中小型工業隨之崛起，當中以鞋業著名。最高峰時期，沙登村內共有高達 200 多間的製鞋廠，為村民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銀行和金融業也如雨後春筍在新村林立，高峰時期共有多達 13 間的金融銀行，使新村大街呈現一片欣欣向榮景象。近年來，中國鞋業搶灘市場，許多鞋廠紛紛倒閉，至今尚有 50 多家仍然存活(蔡昭媛 2009)。另一個例子是雪蘭莪州的蒲種 14 英里新村，這個新村早期以割膠和採礦為生，近年來蒲種地區納入多媒體超級走廊的範圍⁴，蒲種是雪州內崛起與發展速度最為驚人的地區，也造成蒲種 14 英里新村的屋價與地價暴漲數百倍(星洲日報／大都會 2009)。



⁴ 「多媒體超級走廊」(MSC)是從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南郊雪邦國際機場延伸至市區邊緣的國油雙峰塔的走廊地帶。MSC 也是個科技園區，總面積約 750 平方公里。大馬政府希望打造 MSC 成為一座現代化的科技城，及亞洲主要的多媒體科技中心，以生產資訊科技、應用與研發，成為另一個「矽谷」(Silicon Valley)。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發問

華人新村是馬來西亞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特殊空間形式，早期新村研究的文獻多數以英文為媒介語。2000 年以後，才逐漸出現華人媒介語的資料。新村研究主要分成官方和非官方的資料，官方的主要是資料調查報告，例如：新村的數目、人口數、職業比例等。至於新村的歷史文獻資料和個案研究，則比較著重描述歷史背景和村民生活方式、華人人口問題和新村發展前程等(鄒雁慧 2008)。近年來也有一些新村空間的討論，如：鄒雁慧的碩士論文就是探討新村的文化景觀變遷。本研究目的是以空間和社會關係相互辯證的脈絡，探討華人族群及華人新村從成立至今的變化，提出空間「社會性」的重要性。

研究學者認為空間的形式與過程，是由整體社會結構的動態所塑造(Manuel Castells)。華人族群在英政府統治時，很多人並沒有正式公民身分及較高的經濟地位。當社會面對共產黨威脅時，國家透過軍警力量強制搬遷華人到新村，形成一個隔離和監視的空間形式。隨著馬來(西)亞宣佈獨立，華人也取得合法公民身分。新村在馬共投降後宣佈解除緊急狀態，政府隨後撤走鐵線網和瞭望塔，但是大部分華人新村仍然處於國家發展邊緣。本研究希望進入田野地點——拱橋新村，利用文史資料蒐集、田野觀察和深入訪談法，從拱橋新村居民的角度探索新村空間的實質特性，華人在馬來西亞的社會地位，希望能描繪出空間和社會間互動的關係圖像。

更重要的是，華人和華人新村一直被描述成是經濟和社會弱勢的刻板印象，我希望此研究能打破這個看法。華人社會及新村除了中低階層的國民外，還有精英階級的商人、專業人士等。當華人新村出現比他們更為弱勢的群體(東南亞外勞)時，「中心」和「邊緣」並不是一組對立的關係，而是相互形成及流動的過程。昔日的弱勢者，或許就是今天的壓迫者。因為在全球化的今天，有越來越多

各國不同的族群，流動到其他國家就業或居住，就像本研究個案拱橋新村在 1980 年代開始出現大量工廠和外勞，外勞現象造成新村出現更低層及看不見的邊緣社群及空間界線形式。以下為本研究之發問：

1. 國家的社會排除與華人新村空間隔離之表現為何？
2. 在國家政治與經濟壓迫下，中下階層華人村民的出國跳飛機策略，呈現何種階級流動及空間形式？
3. 當華人新村擴大地區範圍，新的社會群體(外勞) 與華人建立何種互動形式？雙方表現何種社會排除、階級流動與空間隔離或排斥的情況？不同的多元國籍與族群的社會有可能創造跨文化的空間形式嗎？



第二節 理論分析與研究架構

一．理論分析

這是一個從社會與空間角度出發的研究，企圖理解空間和社會相互建構的關係。文獻首先是闡述社會與空間理論，了解以往學界對空間和社會關係的立場。在這個理論框架下，以**社會排除與空間形式**的觀點探討世界華人移民在當地的社會地位、生活空間的形成脈絡。最後，本文將舉出兩個例子，探討「中心」和「邊緣」的流動關係概念，並且以此來觀察及分析華人新村的社會與空間發展過程。

(一) 社會與空間理論

Durkheim(1915)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指出「空間與時間是社會的構造物(social construct)。人類學家 Hallowell(1955)、Levi-Strauss(1963)、Hall(1966)等作品皆證明「不同的社會，製造了性質有所差別的空間與時間概念」的說法。Lefebvre 就認為空間是「社會性」產物，在空間裡瀰漫各種社會關係，不論是在生活空間、個人空間、學術空間、監獄空間等，在各處人們所經驗到的空間關係，也正是社會關係(夏鑄九等編譯 1993)。黃應貴(1995)指發展過程是社會的建構過程、社會發展的寫照。他說空間是政治和經濟的建構。尤其是外來許多制度(如教會)在不同程度上是透過空間的象徵作用來塑造及加強它的宰制，更說明空間有如意識形態的作用。必須注意的是，**空間不只是社會的建構**。黃應貴指出空間不只是地理形式或建構的環境，更是人們在其上活動而相互結合運作，建構出社會關係、文化習慣、意識形態或政治經濟等新的空間類別。這些不同的空間建構，不但可相互結合運作，更與社會生活的多層面結合而有其深度及廣泛性。

King,A.D. (1993) 主張如果建築物是被社會生產出來，它們同時也是被社會再消費。建築物以及它們所在之較大的營造環境，不單是「反映」或「呈現」特定的社會秩序，它們還積極地從事社會與文化存在之建構：社會在相當程度是藉

由它所創造的建築物和空間而構成。這意味著建築所提供的象徵和意象，形成了人們使其物質世界有意思的語彙概念之基礎。換言之，社會必須是由空間建構起來，而空間組織也在影響社會運作。雖然學者一再強調空間和時間是相互關係，但很多時候，我們依然會陷入「A／非 A」二元分立的窘境。A 的位置是「時間」，而「空間」是非 A，時間一般連結上歷史、事件變遷；空間則是停滯、再生產等。

Massey(1994)表示如果我們要了解「空間」和「社會」的關係，必須打破潛存的二元論意識形態，空間和時間定義本身的建構，必須是**相互關係的結果**。Massey 進一步闡述與定義「空間」：是有形有態的社會關係中的一個時刻(而非一種絕對的向度)，因此它不是一個停滯的狀態，因為創造空間的社會性質本身是**動態**的。他指出「空間」被概念化為動態的社會關係之同時共存；而空間也同時俱有秩序和混亂的要素。空間有秩序是因為它們確實是空間的系統，意即是一組社會現象的空間配佈(亦即相互關連的定位，而非「絕對」的位置)本身是這個系統構成的部分。另一方面，混亂的因素是現象中的空間定位，卻可能不是直接導致。這種相對的位置，是由個別決定機制的獨立運作所造成，是非意圖的結果。

Massey 認為思索空間和時間的方式之一是堅持時間和空間(space-time)是不可分隔，它們**透過現象之間的互動而共同建構**。Weisman(1997) 指出「**社會空間和物質空間有持續的辯證關係**」，兩者都是由社會造成。他認為物質空間和社會空間是彼此反映和回應。空間提供一個架構讓我們思考世界和身處其中的人。每個人對物質空間的認知，大部分都是視他們所佔有的社會空間而定。Castells 在《網絡社會之崛起》闡明他對空間的定義：在物理學上，空間無法脫離物質的動態而予以界定；在社會理論裡，空間不能不參照社會實踐而加以定義。他假設空間就是一個物質產物，相對於其他物質產物——包括人類——而牽涉歷史決定的社會關係之中，而這些社會關係賦予空間形式、功能和社會意義。Castells(2000)認為「空間不是社會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會的表現(expression)」。換言之，

空間不是社會的拷貝，空間就是社會。空間的形式與過程，是由**整體社會結構的動態所塑造**。

1. 社會排除與空間形式

當我們掌握空間和社會是相互建構起來的論點後，我們來討論在社會排除的情況下，空間與社會的互動與表現。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有許多解釋。Mayes認為每一個研究者、每一個國家有其界定與偏重的「社會排除」概念，但他指出兩個核心概念：排除於勞動市場之外及持續貧窮狀態。Roche and van Brekel 提到「社會排除」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是指社會中的特定部分，被排除或無法接近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領域；而狹義則專指經濟部分的不平等(李易駿 2006)。「社會排除」有三個典範：1)不是經濟和政治現象，而是一個社會內部缺乏團結；2) 專業化(specialization)，是一種在操作上的歧視，像是下層階級的人永久性被排除；3) 壟斷或社會封閉模式，通常強調不同階級的權力關係，如何壟斷資源分配，如：教育、工作等。在國家層級上，能否取得公民權(citizenship)、各種形式的歧視性立法、建立在不同族群的不同權利等，都是社會排除的形式表現(Taket A.2009)。

Sommers, L. M. (1999) 指出「社會經濟邊緣化」是表示某個社會空間的結構，相較整體空間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福祉，是遠遠落後預期水平。當我們來檢視空間形式時，空間的不平等關係和社會對待貧困人口、少數民族、外來移民的基本態度和政策安排有關(陳雲 2009)。從居住空間的分異，可以看到各階層社會地位、經濟收入、權力資源、文化價值的差異程度，並反映出政府空間的優越性及邊陲性，而有支配與屈從的不平等關係(黃應貴 1995)。當我們去看遭到隔離的團體或個人時，他們都具有特別的「原因」，像是族群、宗教、國籍、社會經濟階層、文化階層、教育、年齡等。這些團體被隔離起來原因是他們不能融入主流團體，或是被固定在規範或權力裡，這些被排除的邊緣群體並不適應社會規則(rigid

social pattern)。Schmidt(1998)指出我們可以分辨那些被社會隔離及邊緣的群體或是個人，他們的生活不屬於或不被允許屬於這個社會，這就是強制的隔離。這個情況通常明顯發生在一個異質社會，且有最重要差異在於主流／優勢群體，歧視或是邊緣化各種少數族群。社會邊緣化導致出現空間隔離(spatial division)的情況，例如：貧民窟。

2. 華人移民與隔離空間

遷徙是人類恒古以來的傳統。地球上，沒有任何民族敢自稱從以前到現在，只在一個地方生活。打從有歷史以來，富冒險天性個人、遊牧族群、遠征軍及各式商賈，就已經在全球各地穿梭往來。人類有千百種的遷徙方式和原因。遷徙大致可分成個體因素或結構因素。前者是「人力資本」，在各地流動尋找最佳報酬；後者可能是經濟、政治或社會問題，把人們從一個國家推擠到另一個國家(Stalker 2002)。華人移民海外的足跡遍及五大洲三大洋，人數達 3000 餘萬。移民海外的華人以南洋諸國為大宗，約占華人總數的八成左右 (周宗仁 1997)。

19 世紀中葉，中國境外有英法聯軍相迫，內有太平天國作亂，造成社會動盪、民生艱困，失業人口激增。由於中國內部缺乏就業機會，於是出現大批國人出洋承工、糊口的地方現象。雖然清朝政府曾經實施海禁，禁止人民出洋，但還是許多人偷渡出洋。吳劍雄(1993)指出此時歐洲殖民主義者在海外佔有的殖民地幅員廣大，除了自願出國打工者外，還出現誘拐與擄掠行經，俗稱「賣豬仔」，像是許多華工就被騙從澳門搭船到古巴、秘魯做苦工，中途發生許多華工被剝削、虐待至死事件。苦力貿易悲劇一再發生，清朝政府終於和古巴、秘魯簽訂合約來保護工人。1893 年，清朝政府諭令取消海禁令，人民終於可以自由出國。

19 世紀移民潮是大勢所趨，當時中國社會動盪不安；海外西方國家殖民地正在開發，需要大量勞力，在此「推力」與「拉力」作用下，就此展開中國移民

活動。19 世紀，加州發現金礦，吸引大批移民。中國人在這次大移民潮中進入美國加州和西部其他各地。中國人刻苦耐勞、安靜無爭又忠誠可靠，所以很受雇主歡迎。當白人發現中國移民越來越多，並且威脅到他們利益時，中國人開始遭到歧視與排斥。白人指責中國人掠奪他們的工作機會，也排斥他們是不同的種族和文化傳統(吳劍雄 1993)。美國排華事件開始興起，種族衝突、排華法案和運動一浪高過一浪。排華有兩個具體表現，即排斥華人移民入境；同時對入境的華人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進行限制。加拿大、澳洲、新西蘭也出現排華的社會現象(趙淑慧主編 2002)。

唐人街(Chinatown)通常等同於種族聚居區或貧民窟(slums)，並且帶有許多負面形象，如：聚賭、毒品。唐人街一般被隔絕在市中心，是維持和支持邊緣社群的地方(Chan 2005)。吳劍雄研究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美國賓州匹茲堡地區華人經驗，他表示華埠的存在實際上是一種社會隔離(social segregation)。這主要由兩種因素所造成：第一種是自願性，華人移民聚居在一起，繼續過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並保持中國人的文化認同。第二種是非自願性、被逼的，因為中國人受到歧視與排斥，他們只好退卻到同族類聚居的地方，以尋求心理上乃至實質上的防衛。在充滿敵意的陌生環境，華埠幾乎是一個心理上的安全島。隨著 1943 年廢除排華法案，華人社區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華埠裡發生一系列變化，慢慢衝破華人社區的隔離狀態(陳靜瑜 2006)。直到 20 世紀，昔日是隔離空間的華埠逐漸演變成仕紳化(gentrification)空間。2009 年「保護華埠 / 下東城聯盟」就呼籲美國政府保護華埠的低收入居民，不要在地區蓋新樓並調高房租。《大紀元 2009/08/14》

就像社會與空間理論所強調，空間與社會關係是在動態的過程中被建構，當社會出現排除或是隔離空間時，空間同時也經歷變遷。王志弘等(2009)也指出早期研究空間形式，主要集中討論多元族群並非均勻分佈，而往往形成特定的族裔

聚居區(ghetto)，並有位居邊緣或核心地段的差異分佈。他們認為族群隔離是極端情況，能穿越的邊界和領地則是常態，形成大片主流族裔地毯上，幾塊不規則分佈、或鮮豔或模糊的鑲嵌。張小鳴(2007)在研究香港菲律賓女傭的空間使用議題中就點出社會和空間的形式變遷。他指出香港中環是香港的心臟地帶，摩天大廈、各銀行總部的商業活動都在此運作。中環高級商廈管理者對菲律賓女傭表現得很不友善，如把大廈外牆圍起，不許她們靠近外牆。政府也加入建立門檻、鞏固排他性資源利益的行列，派出小販管制隊掃蕩在中環皇后廣場售賣衣服及食物的小販。然而，菲律賓女傭工會、當地菲律賓社群，及部分從菲律賓女傭身上得益的小商戶香港人，齊心反對建立門檻的排他性建議。現在星期日的皇后廣場除了是菲律賓女傭假日的休閒空間，他們會在那裡聚會談天用餐外，也演變成特殊的觀光地區。

(二) 流動的中心與邊緣

無論政治、經濟或文化，在歷史的過程中，「邊緣」其實是一個流動的過程；此一時的弱勢，彼一時可能成為強勢。(李小江等，1999)。Harvey(1993)指出社會空間(和時間)的支配性與霸權的界定，永遠都會遭受挑戰，因而總是有改變的可能。回顧前文，我們看到昔日族裔聚居區是社會邊緣化某個外來群體所形成的空間，但邊緣並不是僵固不變，像李小江等所說，邊緣是一個流動過程。美國華埠在社會變遷中，從昔日的隔離空間逐漸變化成商業中心與仕紳化地方。「空間」和「社會」是在相互關係中建構起來，而在「社會」與「空間」中，又有「邊緣」與「中心」，它們皆是一組流動及辯證的過程。

Perry, E.和 Lee, C.K.在他們的書裡分別闡述「邊緣」和「中心」的流動概念。Perry, E. (2002) 在“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中，引用許多的歷史資料來描述和分析人民「挑戰天命」的論點，他分析到中國從古至今，中國的人民如何及為什麼反抗政權。他認為「國家」

和「社會／人民」不是相對的概念，兩者的界線是很模糊。當工人抗爭運動（社會）成功推翻當代政權，他們就成為掌權者（國家）。Perry 在書中舉例土匪和地方官員的對立身份實乃一線之隔；戰亂時期，軍人可以成為土匪，或是土匪被招降成為軍人，兩者隨時能互相替換身份。Perry 提出兩個看似對立的概念，其實是可以相互競爭或是合作，是一組辯證的關係。

Lee, C.K. (2007) 在“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中，採用社會合同(social contract)和法律合同(legal contract)來分析中國兩個不同發展趨勢地區（遼寧、廣州）的勞工抗爭活動。他以 1)地區的工作作性質 2)不同工人對共產主義國家體制的不同情緒和記憶，來闡述工人如何採取不同的抗爭模式來面對政府。遼寧和廣州的工人因為不同的工作環境和條件而採取不同的抗爭方式，不過他們同樣利用中央的法律來施壓地方政府，要求得到應有的社會福利。國家地方機構處理勞工申訴案件，卻利用各種細密的手段（例如申請費用）來阻止工人，這裡法律成為邊緣與中心的一個中介。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待，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和「社會」並不是僵硬不變的關係，而是一組流動及相互辯證的領域。最後，本文嘗試從「空間—社會」與階級的「中心—邊緣」是相互流動過程的概念出發，探討華人新村歷史性社會和空間形式的演變過程。

二·研究分析與寫作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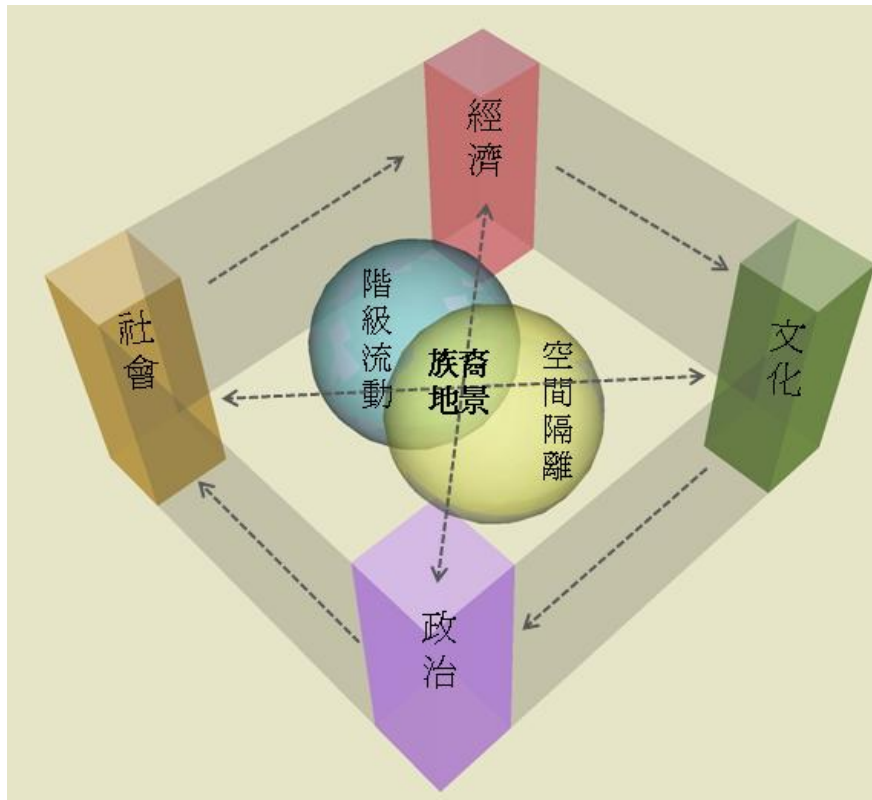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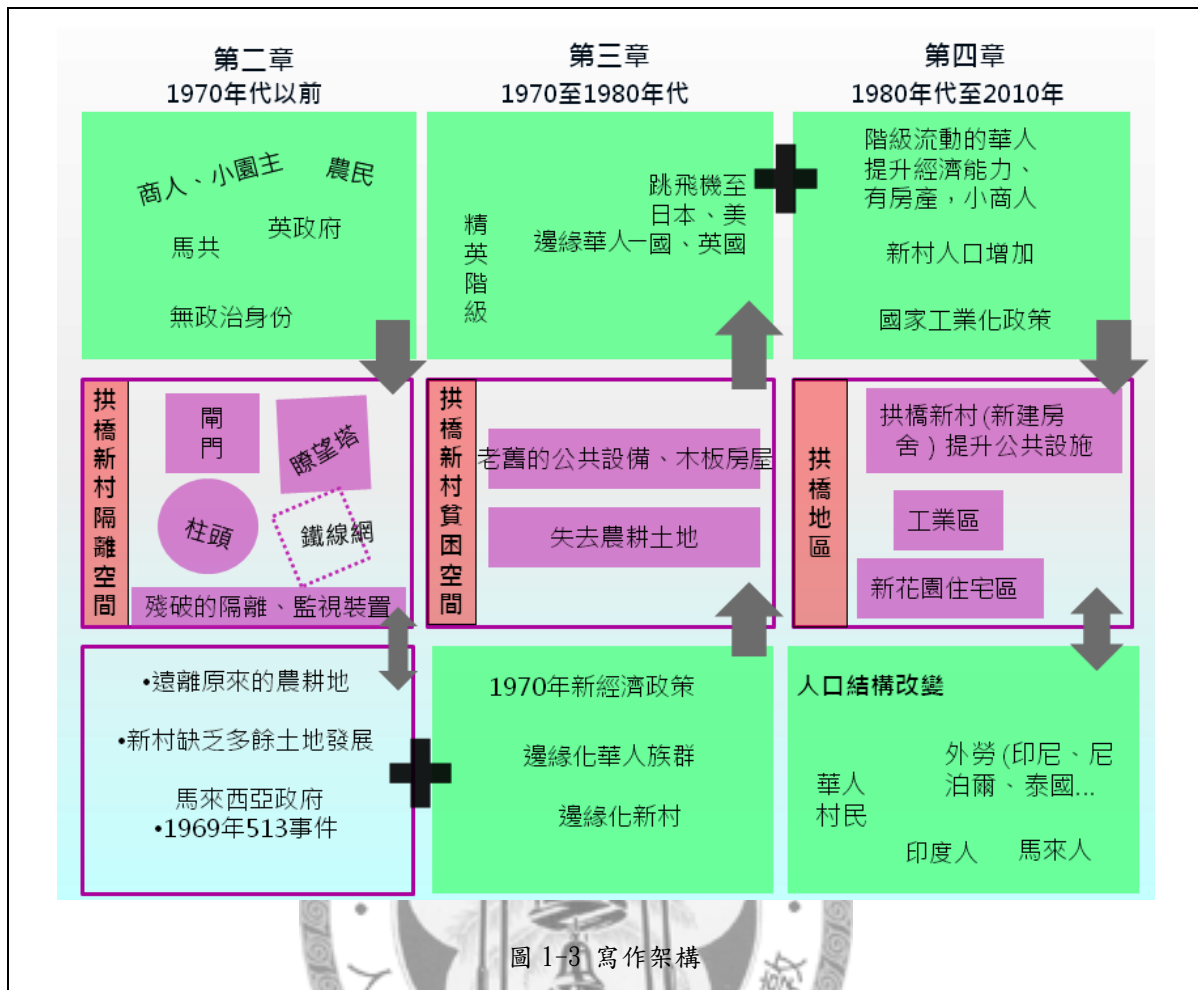


圖 1-2 研究分析

本研究架構視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空間是同時並存的事物，並且相互影響與流動。在這個社會與空間互構的過程中，存在許多不同及交錯面向的事件。在本研究中，階級流動與空間隔離展現此過程中其中一個邊緣化的面向，而族裔地景是兩者相互流動的具體空間表現。

本研究主要分成兩個部分，共五個章節。首要部分即第一章，包括釐清研究目的與發問、研究背景及理論分析。我也在第一章闡明研究方法與作者立場，以讓讀者明白研究背後的真實情況。第二部分，我會依照上述研究分析(圖 1-2)作為寫作架構的主軸(圖 1-3)，分析拱橋新村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空間互動過程中，造成的空間隔離與階級流動現象。與此同時，我也會探討「中國」因素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影响，從中分析華人社會和國家的關係，包括當中不同階層的華人。



從第二章開始，我們關注英殖民及馬來西亞獨立初期，政治權力包括中國因景，如何影響華人社會及形塑華人新村的空間隔離形式。第三章進入馬來西亞政府實行新經濟政策後，中下階級的華人及郊外地區新村遭遇何種經濟與社會邊緣化的困境，民間社會又是如何反動地回應國家，並且造成階級流動及空間變化的情況。在第四章，我將和讀者一同探索拱橋新村因為人口增加、國家工業化政策而改變的社會人口結構，族裔地景表現何種新的階級及空間關係。同時，我也會討論流行文化可以連結不同族群，形成跨文化公共空間的可能性。最後，我將分析外勞社群出現以致中下階層的華人族群社會地位上升，不過這個階級晉升背後掩蓋的是華人族群內部與國家的不同階級關係。在第五章結論時，除了總結研究內容外，我也將提出研究者與受訪者的再反省的重要性、研究限制與建議。

第五節 研究地點與方法

一． 研究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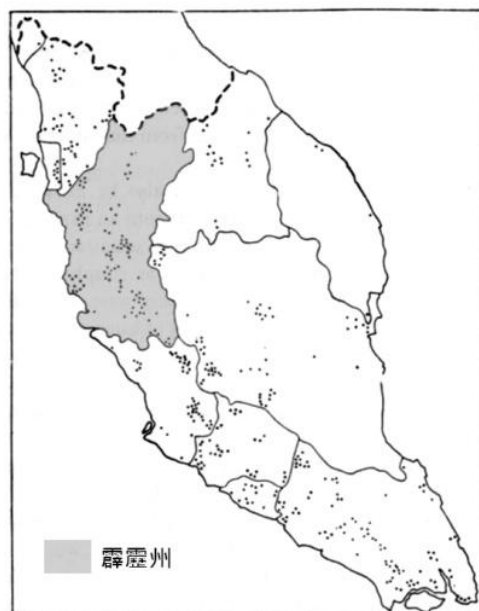


圖 1-4 西馬的華人新村分布圖⁶



圖 1-5 霹靂州拱橋新村位置圖⁵

霹靂州(Perak)曾經是世界錫礦市場的重要產地。大約在 1847 年霹靂的拉律地區及 1880 年近打地區發現豐富錫礦後，大量華人移居到霹靂的錫礦場工作謀生。霹靂州目前約有 60 多萬華人，是國內華人分佈的重要區域。馬來西亞共有 450 個華人新村，霹靂州(Perak)占了 134 個新村。本研究選擇個案研究方式，來探討社會與空間的互動關係。田野地點是霹靂州珠寶鎮的拱橋新村(Kampung Kanthan)、工廠及周圍的新興住宅區(包括寶地花園、龍鄉花園、輝煌花園)範圍，本文在稍後會稱此區域為「拱橋地區」。

拱橋新村是在 1948 年「緊急狀態」法令宣佈後開始建立。他位于霹靂州市中心怡保市與和豐鎮之間，是一個半城鎮周邊的新村，居民以河婆客家人為主。拱橋新村目前約有 600 戶人家居住。新村主要的活動區域是新村的「店仔」，也就是菜市場、雜貨店、茶餐室、籃球場一帶的區域。新村其他設備包括育群幼稚

⁵ 引用自Nyce, R(1973), Chinese new villages in Malaya: a community study.

⁶ 引用自林廷輝、宋婉瑩 (2002) 馬來西亞華人新村 50 年。

園、拱橋浮羅交怡計劃資料中心、警察局、華文小學、警衛團。同時，這裡也擁有數間廟宇，包括歷史悠久的關帝廟、在警察局前面的拿督公廟等。

拱橋新村的背景與全馬大多數華人新村相同，村民可以提供本研究需要的英殖民時期被迫搬遷、居住在隔離空間和出國跳飛機的生命經驗。最重要的是，拱橋新村附近地區在 1980 年代開始發展成「拱橋工業區」(Kawasan Perindustrian Kanthan)，許多外資工廠林立，引進許多不同國家的外勞前來打工，他們開始與新村及村民發生關係。同時，珠寶地區也被納入第 9 大馬計劃(2005-2010)下的「北部走廊經濟特區」(NCER)，未來將是霹靂州高科技工業中心(Perak Hi-Tech Park)的重點發展地區。這可以提供本研究視野去了解馬來西亞獨立後，在國家大型經濟發展計劃下，華人新村的空間形式變化。當出現不同的族群時，新村居民和空間表現又有何轉變。

二·研究方法與歷程

本研究目的是希望透過空間形式變遷，來辯證馬來西亞華人族群的社會地位。同時，近十幾年來，拱橋新村和附近地區湧現大量東南亞地區，如：泰國、越南、印尼、柬埔寨等外籍勞工，我希望透過田野觀察與深入訪談來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如何與新村及居民互動，從中理解非華裔群體與新村空間變遷之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對象包括拱橋新村居民(包括原來住在新村，後來搬至附近住宅區的村民)及外籍勞工，共訪談 32 位受訪者，包括 24 位拱橋村民及 8 位外勞。圖表 1 是受訪者的名單及基本資料，列出受訪者(村民)的教育程度和職業，目的是讓讀者粗略理解華人村民的社會地位。

本文研究範疇的時間軸線包含 1950 年新村成立至 2010 年為止。最初的研究設計是訪談經歷過建立新村，直到見證新村至今日發展的老年人。但我發現老年受訪者在長時間的訪談過程中疲憊的神態，讓我警覺到訪談村民有關他們生命中

長時間的生活經歷，對受訪者及研究者而言是一件很消耗體力的事。於是我修改訪談設計，企圖從不同年齡層的村民身上，訪談新村成立時戒嚴及隔離的生活(中、老年人)、村民出外跳飛機的工作經驗(中、青年)。同時，我還訪談所有受訪者關於他們對外勞的看法與日常生活接觸的點滴。最後，我試著重疊不同年齡層村民的生命經驗，來拼湊及描繪拱橋新村的社會及空間形式圖像。另一方面，我也訪談尼泊爾、緬甸及印尼外勞，以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與新村及居民的互動關係。

我的田野研究時間共分成兩個階段，首先是寒假的研究前期作業(2010年1月至2月)，主要是觀察及蒐集田野資料；第二階段是在同年7月至9月的暑假。我在7月6日至8月31日，主要是在觀察、記錄和分析田野、深入訪談拱橋村民。9月初到吉隆坡國家圖書館、華社研究中心蒐集資料。9月5日至30日，我就一直待在田野進行訪談和整理逐字稿。當中最大的挑戰就是在訪問外勞部分。我將簡略介紹田野研究方法與歷程，這是非常重要的說明，可以讓讀者進一步了解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個人的態度及他與受訪者的互動情況，有助讀者釐清閱讀方向與研究局限。

(一) 蒐集文史資料

我在田野的工作範圍包括蒐集各種相關的文獻，例如：政策報告、新聞報導、歷史圖片和空間平面圖等。馬來西亞公共行政與資訊管理系統並不像台灣一樣方便簡潔，以致在蒐集官方資料報告時出現許多困擾。例如我在馬來西亞霹靂州土地測量局付費申請拱橋新村的平面圖，可是新村處於4張大圖的角落，拼湊之下的效果差強人意。當我向有關單位要求電子檔時，卻被告知1張大圖必須支付基本費用150馬幣(約1500元新台幣)，4張圖加起來就必須花費6千元新台幣。在研究經費有限的情況下，我只好打消念頭，最後在google更新的資料中找到田野俯瞰圖。除外，馬來西亞國家圖書館內的資料檢索系統也不好，很難尋找相關的文獻資料。最後我在民辦的華社研究中心及網路資料庫，找到一些國家政策、

華人族群及新村的新聞和專題報導，對於理解整體華人新村情況有很大幫助。

華人族群及新村的文獻資料和個案研究，包括林廷輝、宋婉瑩《馬來西亞華人新村 50 年》、林廷輝、方天養《馬來西亞新村——邁向新旅程》、潘婉明《一個新村，一種華人？重建馬來(西)亞華人新村的集體回憶》、馬華公會新村事務局《新村成立 50 周年紀念特刊》等書籍，提供我很多華人族群及新村的歷史背景、基礎(新村數目、村民人口數)資料；個案研究也披露村民生活方式、庶民歷史記憶等。同時，本研究一直強調新村的空間特性，空間圖片就變得非常重要。早期新村人民生活貧困，並沒有多餘金錢和時間拍照，有的村民擔心被政府冠以馬共黨員的罪名，不敢收藏甚至銷毀早期的戰爭、馬共照片，以致本研究不易取得早期田野的景觀圖片。Mohd Hanif “The Malayan emergency revisited 1948-1960 : a pictorial history” 一書提供許多日本入侵、馬共與英政府對抗、新村戒嚴時期及獨立前後馬來(西)亞人民生活的照片。這本書豐富及珍貴的歷史照片，成為本研究非常重要的圖片來源，藉此得以引用來加強說明及表現空間特性。最後，新村居民提供我珠寶地區、拱橋新村河婆公會出版的民間刊物，讓我得以窺見拱橋新村早期的空間景觀和歷史發展概況。

(二) 參與觀察

田野參與觀察可以幫助我了解、發掘和發展議題。Blumer 提出人類社會是行動者(人)積極參與過程的集合，而人的行為是互動過程的結果。因此，意義的產生鑲嵌在互動的過程和情境脈絡中。人類社會的許多面向，特別是企圖回答文化情境脈絡(cultural context)問題時，或是希望了解一個環境的活動和互動，如何對某種行為和信仰賦予意義時，我們就可以選擇參與觀察法(嚴祥鸞 2005)。我在寒假前期研究中，以局外人身份初步觀察及記錄拱橋新村的環境情況。2010 年 7 月至 10 月期間，我以「觀察者—如參與者」(observer-as-participant)方式來接近田野，我以一名撰寫畢業論文的學生及新村居民親戚的身份出現在拱橋新村。

雖然外婆是拱橋新村的居民，不過我對拱橋其實很陌生，平常也只是到村子探望外婆，所以我對進入田野有些膽怯。雖然在二月時和村長有過短暫碰面，但村長工作非常忙碌，也無暇帶我進入田野。最後，我決定踏訪新村，調查村裡的人口和居住情況。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勘查活動不但幫助我了解拱橋新村的地形、人口分佈和空間形態，也讓我有機會和村民互相認識。

我除了向村民表達自己研究生的身分外，還參與拱橋新村的日常活動。我會在週末逛新村的夜市場、光顧新村的商店、參加村民舉辦的瑜伽課程。參加這些活動，讓我可以觀察到田野人們的生活樣貌，同時也為趁機尋找深入訪談的對象。在田野期間，遇上拱橋新村年度的關帝廟寶誕慶典，我選擇在不同時段出現在關帝廟，觀察及紀錄村民和外勞的互動情況，例如早上的酬神及舞獅儀式，晚上的粵劇表演或是歌舞活動。同時，我也參加拱橋新村舉行中秋節提燈遊行暨猜謎語活動，我和村民在新村大街一起遊行及觀賞歌舞表演。透過親身參與新村的活動，我從中觀察、接觸、認識與訪問村民，了解拱橋新村的環境背景脈絡、空間變化過程、村民和其他族群的互動關係。觀察記錄也成為論文內容中重要的一部分。

(三) 深入訪談

我在寒假前期研究中，以台灣大學研究生身份接觸及訪談村長，並且電訪一位在新加坡工作村民的生活情況。同年7月再次回到田野後，因為村長非常忙碌，我打消原先設定村長可以幫助我尋找受訪者的計劃。我過後拜訪新村一家商店的老闆娘，因為她和我的母親及外婆有交情，我希望透過老闆娘可以了解新村及接觸村民。老闆娘的商店位於新村大街，因為經商所以能夠接觸許多村民，掌握村中一些消息。當我詢問一些新村的資訊時，老闆娘和他的孩子都盡量幫助我，提供我一些基礎資料。我也透過老闆娘、外婆接觸到受訪者(華人村民)，自己也曾經向認識或不認識的村民自我介紹，希望可以訪談他們，過後再透過受訪者以滾雪球方式接觸其他村民。

除了拱橋村民外，另一重要的受訪對象是外勞群體。剛開始時，我計劃透過村民幫我引介外勞，但發現雖然村民和外勞居住在同個地區，不過雙方在日常生活很少互動，我無法透過村民接觸外勞受訪者。後來，我在外勞經常出現的地方，接觸女性外勞及道明自己的來意，終於初步認識到緬甸籍及尼泊爾籍外勞。很可惜馬來語不是對方的母語，我們溝通得很吃力，受訪者也表現的很緊張。實際上，外勞群體內部存有很多差異，當中包括不同的國籍、語言、宗教信仰、文化習俗等。我後來選擇訪談印尼外勞，因為印尼語和馬來語是相通的語言。我之前已經在田野中觀察到印尼外勞的住處，然後在星期天登門拜訪印尼勞工，終於順利進行外勞群體的訪談。

在訪談開始前，我會簡述研究目的，也向受訪者保證會保密他們的個人資料。這是一個採用「半結構式」的深入訪談法，我以文獻理論：**空間與社會關係的互動及與外勞/村民群體的互動經驗**作為訪談基礎，針對受訪者的生活經驗討論拱橋新村的空間變化。訪談過程並不是單向問答環節，當受訪者有一些新的想法或是意見時，我也嘗試和他們一起討論。這是一個研究者與受訪者在分享生活經驗的過程，也是雙方共同建構有意義的研究工作(Seidman 2006)。除了 4 位受訪者(包括 1 名外勞)是在沒有錄音情況下受訪外，其他 28 位訪談者的內容都製成逐字稿，所有受訪者都以化名處理，以保護他們的隱私。

不同出生年代的村民有不一樣的語言習慣，我和年邁村民談訪時，一般以客家話溝通，中生代村民則是廣東話為主，年輕一代是以中文交談。訪談的地點和人數視情況而定，有的受訪者是在住家，有的是在公開場所。當我在公共場所訪談時，有時會引起旁邊村民的興趣，如果加入討論的村民也有提到重要的內容，也將其計算入訪談人數。除了個別訪談外，也有團體訪談，包括一對夫婦及一群年輕村民。華人受訪者和我之間並沒有語言上的障礙，不過每個受訪者個性不同，

有者侃侃而談，有者內向不善言辭，往往相隔許久後才吐出一言半句。在訪談過程中，有些受訪者年事已高，偶爾會出現記憶重疊的問題，例如混沌了第一次戒嚴和第二次戒嚴的記憶。如果在訪談過程中發現不對勁的地方，我會技巧性提問其他問題，以作交叉對照。例如：發生這件事時，你的小孩幾歲了？從受訪者小孩的年齡來推敲事情發生的年份。村民對空間裝置也各有不同的名稱，如：瞭望塔也被稱為「望月樓」、「塔」、「望樓」等，在訪談時會我和受訪者討論裝置和內容，以確認他們口中的「名稱」。另外，逐字稿也是非常重要的「重構記憶」工具，透過閱讀和分析不同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可以讓研究者發掘議題，甚至發現受訪者矛盾的言詞，進而重新整理或是歸納訪談重點。



表 1：受訪者的名單及基礎資料

姓名	年齡	國籍	教育程度	職業	備注
珍妮	24	馬來西亞	大專	書記、協調員	電訪
馬伯	65	馬來西亞		商人	住家(沒有錄音)
石先生	55	馬來西亞		文員	辦公室(沒有錄音)
王伯	77	馬來西亞		退休農民、雜工	公共場所，團體訪談
齊叔		馬來西亞		餐飲業老闆	
溫先生		馬來西亞		農民	
六嬸	76	馬來西亞		退休農民、洗琉琅	
Maung 馬恩	31	緬甸		外籍勞工(工廠)	夜市場(沒有錄音)。住在商店二樓
唐叔	56	馬來西亞	國小	老闆	
丁嫂		馬來西亞		老闆娘	
軍隆	40	馬來西亞	大學	老闆	
康大姐		馬來西亞		小販	
Sabin 沙賓	42	尼泊爾		工廠員工	團體訪談。住在公司提供的商店宿舍
Babu 巴布	33	尼泊爾		工廠員工	
金和	41	馬來西亞	初中	耕種	團體訪談
蘭美	39	馬來西亞	初中	家庭主婦	
玉淇	41	馬來西亞	高中	家庭主婦	
家亨	40	馬來西亞	初中	準備到澳洲跳飛機	
志偉	26	馬來西亞	大學	待業中	團體訪談
珮珮	26	馬來西亞	大學	佳邦工廠文員	
鳳英	26	馬來西亞	高中	美妝人員	
陶先生	44	馬來西亞	研究所	教師	
江叔	58	馬來西亞	中學	農民、司機	
伍婆婆	76	馬來西亞	未受教育	割膠、種菜、養豬	
毛先生	43	馬來西亞	-	菜農	
屠先生	46	馬來西亞	中三	裁縫、理髮師	
Kuwat 辜瓦	22	印尼 (龍目島)		棕油廠員工	團體訪談
Budi 布迪	20				
Ahmad 亞莫	28				
Ali 亞里	35	印尼 (龍目島)		棕油廠員工	團體訪談
Geni 肯尼	28				
杜伯	79	馬來西亞			

三·田野的反身性思考

我開始在新村進行基礎調查時，引起許多村民的好奇，也讓我反省自己在田野的工作態度。我記得第三天在田野踏勘時，看見一群中年男性村民坐在茶室喝茶聊天，我趁機前去問路，希望認識村民(也讓他們認識我)。當中某位村民回應道：你都沒有告訴我你是誰？為什麼我要回答你的問題？當下，我覺得尷尬又慚愧，因為我犯了「自以為是」的毛病，總覺得自己問了，人家就應該回答，也不事先道明身份，實在失禮。自此之後，我都會向村民道明身份，也表示自己是新村某某人的孫女，他們對我的態度也變得比較友善。在村民和外勞群體中，我一直認為尋找外勞受訪者是最艱難的工作，因為他們是「難以接近」的一群。外勞在傍晚五點至七點後，一般以群體方式出現在新村。我經常觀察他們的行為，卻始終無法踏出第一步。我覺得一個人走前去介紹自己實在有點怪，而家人和朋友一直覺得我很「危險」(外勞被污名化為犯罪的一群)。我確實擔心安全問題，雖然我知道「很多外勞都不是好人」是刻板印象，可是當自己需要面對他們時，卻又顯得很乏力。另外一個原因是大多數外勞都是年輕男性，他們注視或打量的目光讓我覺得很緊張，不知道要如何和他們互動。直到後來，我經由兩位工廠女工介紹下，認識緬甸和尼泊爾外勞。

身為一位外國學生，我在台灣求學居住已經有五年多了。當我訪問外勞群體時，我才驚覺「出國」這件事對不同人而言，其實充滿不同的想像與機遇。我訪問兩位尼泊爾勞工時，其中一位外勞告訴我，他回國後會繼續耕田維生，在馬來西亞賺到的錢則是用作小孩教育費。他說如果以後有機會的話，他也要到台灣走走(pergi jalan)。在他們想像裡台灣(北)是一個先進都市、充滿娛樂節目及美食的天堂。而我這位從馬來西亞到台灣讀書的學生，則是幸運的出國人。對我而言，出國升學起始於馬來西亞整體的政治和教育環境，也隨著關係我未來的人生規劃。我們都是出國人，但是每位旅者的生活際遇卻是面向不同的人生出口，受訪者回

國後從事農耕工作，而我可能就投入中產階級的生活模式。這提醒我自己在訪談外勞群體時，必須意識到階級在生活經驗上的重要性。由於尼泊爾、緬甸等外勞不精通馬來語，實際很難做比較深入的訪談。最後，我在毫無辦法之下，只好硬著頭皮選擇在周末時，登門拜訪新村的印尼外勞。在團體訪談中，很多外勞表現很友善，唯一讓我不舒服的是一名年約 22 歲的外勞，在訪談過程中一直打黃腔，我心裡覺得很生氣又尷尬，不過還是隱忍至訪談結束。

在熟悉的地方做研究，較易尋找訪談對象及掌握田野資訊，不過也更易影響到研究者個人情緒。我在團體訪談兩位受訪者時，他們恰巧認識我的家人。當談及新村人口到日本跳飛機話題時，受訪者就談到我的父親，還透露曾經和我父親一同求醫治病的經過。那是一段我都不知道的故事，勾起我心中一些很難過的回憶，眼淚都想掉下來，忽然而至的情緒讓我覺得措手不及。我在心裡不停告訴自己「掉眼淚」不是一個好的處理方式，這不但嚇到受訪者及中斷訪談，也是一個「不專業」的表現。過後我嘗試移轉話題，最後也控制住自己的情緒。另外，在田野期間最大的收穫是我和外婆有更親近的關係，從外婆口中了解更多拱橋的故事外，還彷彿參與那些昔日的家族時光。

我在田野中常有自己是一位科學家的錯覺，努力就研究假設尋找證據，學習思考各種可能性。不過，我覺得社會科學家和實驗室科學家最大不同是，前者可以有血有肉，就算我們在田野依然有自己的情緒和感覺，不應強迫自己「理性」、「公正」，這也是讓我最痛苦和享受的研究過程。我從小在華人新村長大，有許多快樂或是難過的生活經驗。我必須承認自我成長過程中，烙印在身上的個人及族群記憶，確實影響研究者的工作態度及看待事情的角度，這是我無法否認的事實。我嘗試在田野研究中，時刻提醒「偏見」於研究的重要性，不過我也願意讓個人經驗與立場豐富我的研究，因為我相信新村研究是「人」的生命故事，如果

研究者捨棄一切喜怒哀樂，豈不顯得太過矯情？我願與讀者分享田野研究中個人心情轉折，希望枯燥的論文，可以成為我們分享社會真實生命故事的讀本。

第二章 政治權力塑造的華人新村 (1970 年以前)

Harvey(1990)指出客觀空間與時間的定義，深深糾結在社會再生產的過程中，例如藉著指派人群與活動到不同的地方與時間，有助於建構社會秩序。二戰後，英政府殖民期間，有英國與馬來亞共產黨兩個政治勢力。當時英政府為了對付馬共，頒布全國進入緊急法令，實行新村計劃及戒嚴行動，目的是隔絕共產黨和人民的聯繫。英政府成立的華人新村呈現隔離與監視的空間特色，而華人村民與低階警官成為英政府和馬共中間的「夾心人」。雖然兩個政治勢力握有軍事資源，不過底下階層的華人村民表現靈活的生存技巧來應付不同的政治勢力，當中表現出上層的政治結構與下層的市民社會並不是固定「強」與「弱」關係。當馬來亞取得獨立後不久，卻發生 513 族群流血事件，馬來亞政府重新啟動戒嚴行動，華人新村也牽涉進入第二次戒嚴行動裡。雖然國家再次監控村民的自由，村民在和國家機器互動中，依舊尋找到對應方法。在兩次的戒嚴事件裡，國家(英政府、馬共、馬來亞政府)與華人村民在互動過程中，呈現不同社會組織權力交織的圖像，掌握上層「政治權力」的組織深刻影響華人新村的空間形貌。

我在第一節會首先勾勒在英政府時期，華人族群與中國的關係與政治認同，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及其所形成的新村空間樣貌。接下來，我們分析本研究個案——**拱橋新村**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如何呈現英政府、馬共與華人村民的社會關係，包括隔離及監視設置、門禁時間、搜身檢查、糧食限制等。直到國家獨立及解除戒嚴後，許多華人村民也取得公民身份。當政府面對國內族群衝突事件時，仍然再次實行戒嚴行動。英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的兩次戒嚴事件中，不同的社會組織及政治權力貫穿華人新村，形塑特殊的歷史地理樣貌。與此同時，新村內部也呈現不同經濟階級的華人村民，顯示新村內部的異質組成。

第一節 華人移民的政治認同及新村空間特色

一．華人移民及政治認同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華人社會階級結構可分為商、士和工三大群。在英殖民至華人新村時期，許多華人只是普通的墾民，生活過的很貧困。英政府一般對華人約束較少，很少介入華人社會事務。華人移民可以自行結社，組織各種同鄉會館和宗親會館，以照顧同鄉和同宗利益為目的。也有跨方言群的公會、宗教和慈善團體相繼出現，造福對象包括全體華人(黃賢強 2005)。華人移民在 19 世紀初來到馬來半島時，大多數的移民寧願視自己為**旅居者**，而不是定居者，他們的精神世界基本上還是一個中國世界。他們在馬來半島時，適逢中國正遭遇列強瓜分和日本入侵困境，海外華人在政治上以中國存亡為核心思想，新馬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財力資助，占了同時期海外華僑捐款的三分之一；在文化上，新馬也跟隨中國發展，例如五四運動後，新馬各地華人同步把華文課改為白話文。簡而言之，馬來亞獨立建國前，華人是**以中國作為其國民身份認同對象**(何國忠 2002)。

黃賢強(2005)認為日治時期是華人移民身份認同轉變的關鍵時期。1941 年 12 月，日軍入侵馬來半島，新馬華人經歷 3 年多黑暗時期，日軍首先肅清反日份子，其中絕大部分是華人。許多住在邊緣地區的華人加入馬共，而馬共在稍後成為抗日軍，幫助英政府對付日本軍隊。二戰結束後，馬共要求建立社會主義新國家，英政府為了打擊採取武裝鬥爭的馬共，逐實行新村計劃，將原來散居在鄉區和園丘的人民(絕多數為華人)全部集中在新村居住。馬華公會(MCA)在 1949 年成立，最初目的是為了解決華人在緊急狀態下面臨遣送回中國、搬遷至新村所面對的生活困境。在 1952 年，馬華正式改組為政治團體，代表華人爭取政治權益。巫統(馬來人)、馬華公會和國大黨(印度人)組成聯盟，與英政府談判及爭取馬來亞獨立。馬華公會領導人積極爭取華人的公民權和政治地位，確保華人在獨立後可以享有居留和參政權。1957 年 8 月 31 日，馬來亞聯合邦宣佈成立，大部

分華人移民在政治上的身份認同也從「中國人」轉變為馬來亞(華)人。⁷ 何國忠(2007)指出馬華公會成立的歷史背景，標示華人本地政黨的誕生及華人有能力解決在地的政治問題。

二·緊急法令時期的新村空間形式

文平強(2002)指出馬來西亞在歷史發展時期，採用的主要發展政策，塑造成不同族群之間的空間隔離。在英殖民時期，英政府採取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管理手段，安排華人勞工居住在城鎮，從事礦場、種植業；馬來人在鄉村種稻捕魚；印度人則是橡膠園廉價勞工，意圖分化不同族群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在 1940 至 1950 年代，英政府建立數百個華人新村，重新分佈族群的居住範圍，更是加劇實質和社會空間的分化。華人在馬來亞獨立前，在社會上沒有公民權和居住權；在經濟上，華人移民一般是園丘、礦場、橡膠園工人。當英政府面對馬共武裝鬥爭時，處於社會地位低層(經濟和政治弱勢)的華人被迫遷入新村，開始過著隔離和被監視的生活，華人和國家的關係反映在空間表現形式上。

英政府在規劃新村時，他們選擇的區位原則是必需在地勢較高的地方，同時必須座落在主要的道路或是交通幹線上。目的是方便監視新村居民，不讓居民有機會和馬共合作(鄒雁慧 2008)。當時的新村被形容為「集中營」，房屋是規劃成一排排、一列列，有的屋地較寬、有的則鱗次櫛比，然後再用鐵線網團團圍住整個新村，四周設有碉堡式的哨站，進出口處有檢查站，高高堆起沙包，以防馬共偷襲(馬華公會新村事務局 1999)(圖 2-1)。新村基本設備包括警察局、診療所、小學、民眾會堂、籃球場、足球場、神廟、養豬場等。林廷輝、宋婉瑩(2000)歸納 1950 年代新村空間的特色和模式，包括 1)居民棲身之所都是木屋，屋頂或用棕櫚、樹葉、茅草、爛紙皮或舊白鋅蓋成、2)紅泥路、3)新村四周用鐵線網圍築

⁷必須說明的是華人在**傳統文化**上還是認同中國，更準確的應該是中華民族。黃賢強認為如果強硬同化華人的政治和文化認同，就如同將華人的人格雙重化。

起來，村子前後各有一個大門讓村民進出，方便當局進行檢查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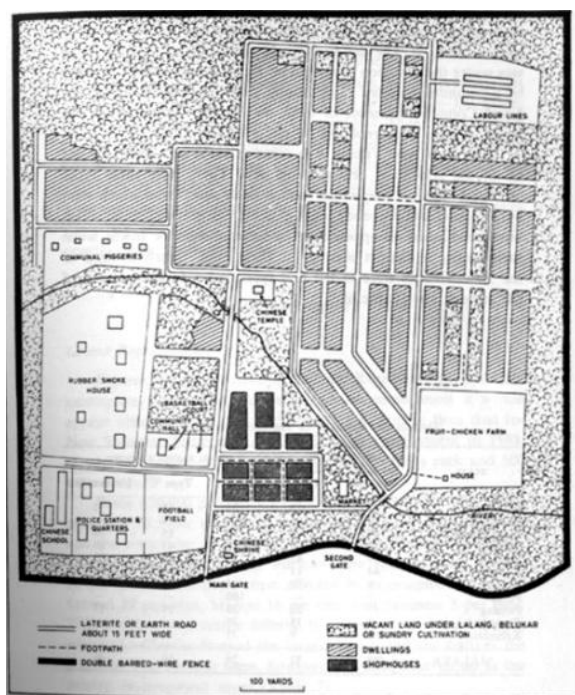


圖 2-1 華人新村空間規劃圖⁸

鋪一層「地網」，或以「雞爪網」斜線交織而下。同時，丹那依淡新村還設有 4 座瞭望塔，各別分佈在新村各個角落，每一座台都有派兵駐守，成年的男性村民也會被安排輪班守夜。瞭望塔上面還有燈照射四周的鐵線網，仿佛像是用火水¹⁰點燃的「聚光燈」(spot-light)。

第二節 英政府、馬共與拱橋村民權力互動過程

英殖民時期，國家（英政府）和邊緣地區的墾民是呈現「由上而下」的社會關係。在拱橋新村成立之前，許多華人村民都是來自邊緣地區的墾民。墾民除了面對經濟貧困問題外，還有政治身份不明的尷尬窘境。當國家宣佈緊急法令後，

⁸ 引用自 Nyce, R(1973), Chinese new villages in Malaya: a community study.

⁹ 共產黨活躍地區

¹⁰ 火水，又叫火油，學名煤油。

英政府強迫老拱橋地區的華人墾民搬遷到新成立的華人新村。政府設立空間設置和各種條規約束村民的人身自由，以便有效杜絕馬共取得民生物資、金錢等援助品。華人村民除了面對英政府，還要應付馬共的要求，成為兩者之間的「夾心人」。我認為華人村民在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或是馬共黨員的要求時，他們並不全然處於弱勢位置，而是靈活運用各種技巧生存下來。即使華人村民處於政治弱勢的地位，但新村內部也包含不同經濟階級的異質村民。

一·老拱橋地區華人的經濟和政治地位



圖 2-2 未搬遷前的老拱橋地區

許多村民在未遷入拱橋新村前，大多數都是居住在「老拱橋」(圖 2-2)。那時候的拱橋地區範圍計有干登、上干登、石山和馬來甘榜等農村。那是一個靠近火車橋底的地方，火車橋底下有三個拱門，中間大拱門是供車輛川行南北馬之要道，兩側小拱門是人行道，故取名「拱橋」。拱橋附近有火車站，英文名為 Kan Than，中文稱為「干登」。老拱橋的華人多數務農，他們每天早晨會

從耕地運送蔬菜給菜商收購 (劉祥勝 1990)。

1950 年以前，尚未建立的拱橋新村附近地區，例如山腳、石山、干登、火車背，都是大片的農用土地，華裔先賢在這裡開墾和種植農作物。毛先生的爺爺在馬來(西)亞獨立之前，就已經在山腳居住。他相信爺爺至他這一代，已經在拱橋新村對面的「山邊」地區生活超過百年了。他說當時人們的房子「這邊一間，

那邊遠遠又一間」，大家住的很分散。每戶家庭都佔有一大片土地，他們的農地和房子是相連，並且遍佈整個山腳地區，不像新村房子蓋得很密集。伍婆婆說以前「石山全部都是耕芭，種木薯、種紅薯、種沙葛」，而形成的市集就稱為「老拱橋」。當時的華人農民生活很貧困，他們許多都是沒有公民權的外來移民。六孀的父母遠從中國廣州市台山市赤溪鎮到石山開墾居住，生下六孀及其他兄弟姊妹，但是直到六孀 17 歲搬遷到拱橋新村的時候，她仍然沒有取得公民權。過後，她聽說「有公民權做什麼都好一點」，就跟著大家跑去申請。王伯也說當時「新村的都很少有人」取得公民權。

二·英政府強勢搬遷村民



圖 2-3 拱橋新村位置

英政府在建立新村過程中，面對的是沒有公民身份的邊緣地區墾民。他們除了運用政治權力搬遷村民外，也強制小園主賣土地給他們作為建村的基地。拱橋新村最初是大片的橡膠園地，根據當時園主女兒伍婆婆透露，橡膠園有三個園主，兩位華人，一位印度人。馬共時期，英政府向園主徵收土地作為新村用地，他們賠償 700 銀元給園主，園主「沒得講價」，但可以自由挑選新村的房地。伍婆婆說他的父親個

性老實，只向英政府取得一塊屋地，另一位華裔園主貳禮伯則是拿了四塊屋地，而印度裔園主拿到賠償後就搬離橡膠園。英政府取得橡膠園地後，開始出動軍警人員逐漸搬遷附近地區的農民過來居住。伍婆婆說英政府小當時一邊砍伐橡膠樹，一邊開闢屋地。她回憶道她當時還趁一些橡膠樹尚未被砍下前繼續割膠。王伯記

一邊開闢屋地。她回憶道她當時還趁一些橡膠樹尚未被砍下前繼續割膠。王伯記得當時政府下令村民搬家時，士兵開著軍車到每戶人家登記並發派 100 銀元，所有人都得搬遷，「一條拱門的人都要搬」，大家都不能反抗政府。

「那時候有共產黨…政府有緊急法令叫我們搬過來，一間屋補(貼)一百銀…那時候不搬不得，全部都要搬，有兵來載，同(跟)你們載東西。叫你搬去那裡就那裡，沒辦法。政府這樣做，有麥嘅(什麼)辦法，你同他都沒得好反抗。」(王伯，77歲)

從王伯的話，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人民，他們只獲得一百元的津貼，就要被迫搬遷到一個新的地方。相較強大的政府，無錢無政治身份的人民無法反抗，只好跟隨兵車到新的地方居住。有些村民為了多搬遷一些家當，還自己用腳踏車運送貨物。六孀就說她從舊居用腳踏車載茅草到新村時，鞋子都走到破損了。軍車載送村民到新住址後，村民在自助的情況下重建他們的家園。第一批搬進新村的六孀形容新村在初建時，滿地都是政府砍下來的橡膠樹，村民必須自己收拾樹木，還要挖出泥土下的樹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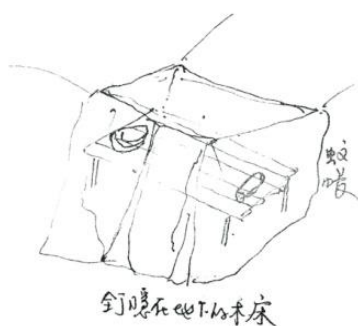


圖2-4 灶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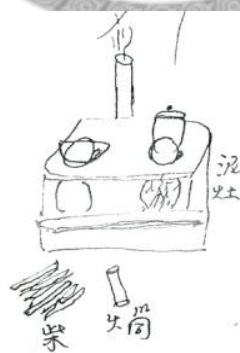


圖2-5 木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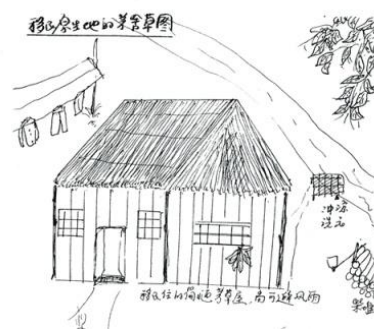



圖2-6 茅草或亞答木屋¹¹

¹¹本文引用新村戒嚴期間的照片來源，主要來自各種文獻。受訪村民都表示在貧窮的新村時期，他們沒有經濟能力拍照。受訪過程中，我和受訪者分享蒐集回來的舊照片，他們皆表示照片情景與新村當時的情況非常相似。圖 2-4, 2-5, 2-6 引用自劉一清(2007)珠寶百年拓荒開埠史。受訪者在過看圖片後證實當時拱橋新村許多村民都是住在類似的房屋。

王伯說村民經濟不好，倉促搬遷之際，他們只好「以前菜園屋那些柱頭、那些料，就自己拆下來」，作為新居處的房屋材料。王伯形容當時拱橋新村「一幫朋友，你幫他，他幫你，大家互相幫助，搭好就圍絲茅(草)」的互助情況下建起在新村的房子。雖然英政府宣稱他們會提供生活設施予新村，但新村的生活環境其實非常簡陋。王伯回憶到當時新村「全部都是泥路…那時候的泥漿不知道有幾多，好天有灰塵，不好天就泥漿走路都是『爛北北』(泥濘)…自己(警察)都不想走路」。政府並沒有提供建材給村民，貧窮村民都是使用簡便的材料蓋房舍。有些房子是茅草構成(圖2-6)，每逢遇上雨天時，雨水會從屋頂滲漏下來。六孀描述當時的居住情況，她說每次雨天時，她的肚子都會淋到雨水，從中可見當時貧困的生活環境。



即使如此，拱橋新村內部其實存有不同生活階層的村民，「有的窮，有的有錢嘅，不是全部都是窮，tapi(但是)多數都是窮的」。我們從村民的交通工具就可窺探他們的經濟情況。王伯說當時拱橋新村，有九成以上村民都是以腳踏車作為代步工具，有機車或汽車的村民通常是那些不需要墾殖的村民。「那時候，100%，有90%踩腳車，沒車沒motor(機車)。初初搬新村的時候，這個新村只有三、四架電車...是鋼線車，車輪是行鋼線，motor那樣，最舊款那個，就像現在的腳踏車。有車的不用耕芭...」(王伯，77歲)另外，杜伯也說當時新村的成年男丁都必須輪流和軍警駐守四座瞭望塔及巡邏新村，有時候是一個月一次，有些經濟狀況較好的村民不想巡邏，就會花錢請別的村民代替他們工作。

(一) 監控與隔離的空間形式

雖然英政府宣稱人民搬入新村即享有硬體設備和福利，然而從村民的訪談中可以發現，當時的新村都是黃泥路，破舊的房舍。英政府建造具體的硬體設施，

例如：瞭望塔、警察局，並不是要提供村民生活便利，而是為了方便監視村民及對付共產黨。六十年時間過去了，年邁村民對拱橋新村初建時的空間形式還是歷歷在目。伍婆婆還記得新村當時搭建了4座「望月樓」(瞭望塔)(圖 2-7)，每逢夜晚時，就有警察駐守在瞭望塔上，新村四周還有軍警巡邏。村民對瞭望塔各有不同的稱呼，杜伯稱其為「望樓」，他說當時新村的成年男丁「夠歲數全部都要巡邏及守望樓」，有時候是一個月一次。有些經濟狀況較好的村民不想巡邏，就會花錢請別的村民代替他們工作。除了瞭望塔，六孀還清楚記得新村的鐵線網是倒刺樣式(圖 2-8)，軍警用鐵線網層層圍繞新村。她形容這不是簡單的工作，因為就連靠近地面鐵線網都「穩穩」(緊密)圍住，目的是「不要給你們弓穩(竄逃)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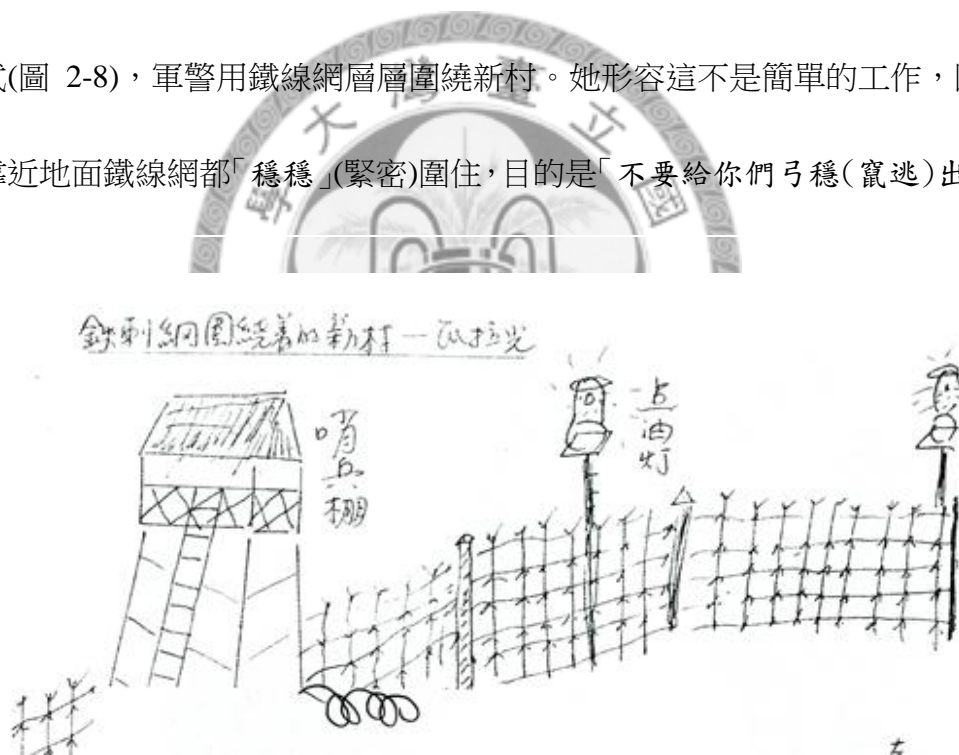


圖 2-7 瞭望塔

圖 2-8 帶刺鐵線網及油燈¹²

六孀說「馬打寮(警察局)有一隻大閘門，多數都是這裡出落入」。意思是新村警察局就設立在大閘門旁邊，警察會依據門禁時間開關閘門，村民不得違反時間。伍婆婆說當時四個「馬打」(警察)就守在大閘門兩邊，兩個負責檢查到和豐鎮方向的村民，另兩個則搜查欲到壩羅(怡保市)的人。她說每天凌晨四點左右，

¹²圖 2-7, 2-8 出自劉一清(2007)珠寶百年拓荒開埠史。圖中的瞭望塔和帶刺鐵線網是珠寶地區瓜拉光新村人民，手繪當時戒嚴情況的照片。



圖 2-9 新村大閘門¹³

許多村民已經在大閘門前排隊等候出去工作。而小閘門平常都是處於關閉狀態。除了村子出入口的大閘門(圖 2-9)、瞭望塔有警察監視村民外，街上還有軍警巡邏。如果遇到緊張情勢，警方會軟禁村民在屋子裡面數小時甚至「沒定著」(不確定)。「戒嚴不准出門口，

佢(他)是沒戒嚴的時候，你們咩可以出囉…戒嚴的時候，馬上全部都要轉(回)來…這樣有馬打(警察)走的…佢看到你們要買東西，問你們要買麥嘅(什麼)，你要買麥嘅，佢帶你們去的…兵古佬來帶你們去買，佢一下開門，你要買什麼就去買轉來…嚴到很辛苦…戒嚴真是艱難。」六孀就說不能外出的村民，只能困在家裡，遇上好心的警察，就會帶他們出外購買糧食。村民因為戒嚴失去自由，還必須獨自承擔經濟，六孀不禁感嘆「戒嚴真是艱難」。

(二) 嚴密的搜查行動及飢餓的村民



圖 2-10 軍警嚴格檢視汽車，確保村民沒有攜帶食物出去¹⁴

¹³ 引用自 Hanif, M. A. M. (2006). The Malayan emergency revisited 1948-1960 : a pictorial history.

¹⁴ 如上

村民每天出門時，都必須經過新村唯一的大閘門出口，還要接受警察搜身及檢查他們的隨身物品(圖 2-10)。伍婆婆說「我們早早晨出閘，都要看我們的東西」，警察會檢查他們運出去的鐵桶或是籃子，「你有載籃，有載桶，就要打開蓋來看，我們載膠水(膠汁)嘅桶，好大隻嘅，鐵嘅，打開蓋來看，瞄啊，看有東西沒，去摸佢(它)」，目的是提防村民運送食物出去給馬共。六孀則說女警負責搜查女性村民，就是「上上下下摸一下」，有時有些村民運氣不好，遇到個性很壞的警察時，「佢(他)拿個馬帶打人家…那些壞到死，佢想到佢是…政府派到佢來找(搜)就找啦」，還不幸被警察用皮帶抽打。



圖 2-11 軍警檢查村民的登記¹⁵

王伯說每次「早上出門，看登記(身份證明)又搜身」(圖 2-11)，不管男女都必須接受搜身體檢查。警察嚴厲禁止村民攜帶食物出去，如果警察捉到他們身上藏有食物就要「充公」(沒收)，他們只能帶「kopi o」(黑咖啡)出門。

警察嚴厲禁止村民攜帶食物出去，讓許多以勞力工作的村民生活過的苦不堪言。王伯在菜園工作，清晨六點就出門，必須工作到傍晚五點才能回家，他說「餓就吃紅薯木薯」充飢。六孀說「有時餓到腳軟啊…有時到檔仔(馬來人攤子)買公蕉吃，有的人賣東西嘅，有時就買餅吃，餓都沒東西吃。檔仔你買到要吃晒(完)，如果沒吃晒，他找到你又 salah(犯錯)…出邊(外面)買，出邊吃晒它…買少少囉，

¹⁵ 圖 2-11 引用自 Hanif, M. A. M. (2006). The Malayan emergency revisited 1948-1960 : a pictorial history.

有麥嘅(什麼)變啊。不然餓到你半死啊…餓下去真是頭暈眼花。」(六孀, 76 歲)。
六孀直言如今雙腳沒力氣, 就是當年戒嚴時, 時常吃「翁菜」(空心菜)種下的禍根。她說警察只允許村民攜帶白開水出門, 她在菜園工作時經常餓得腿軟, 有時到馬來攤子買些炸香蕉或餅乾充飢, 吃不完也不敢帶回新村, 擔心警方懷疑他們和共產黨接觸。一直到後來, 警察甚至不允許村民攜帶黑咖啡和白開水出門, 王伯說「連水都唔可以帶, 在芭場飲井水」, 生活過的很艱辛。

(三) 糧食管制

英政府為了杜絕白米流通到共產黨手上, 除了禁止村民攜帶食物出門外, 還在新村進行實行糧食管制行動。根據劉金線說法, 凡達 12 歲以上的新村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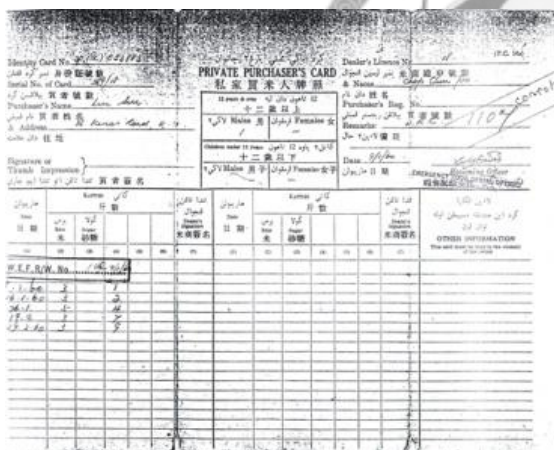


圖 2-12 米牌¹⁶

必須申請一張米糧證(米牌), 大人每週准白米三斤; 婦女兩斤半; 小童兩斤。村民每次購買白米時, 都要紀錄在米牌上(圖 2-12)。醬油、糖鹽、餅乾、罐頭食品都列入統制品, 不能超額買賣, 否則視為犯法。王伯受訪時說戒嚴的時候, 他們到雜貨店「買米就要 lesen (執照), 要有米牌。罐頭、米粉沒相干(關係)」。

1951 年, 為了進一步對付共產黨, 英政府下令拱橋新村進行戶口登記後, 接著就實行「大鑊飯」制度。

¹⁶圖 2-12 引用自劉一清(2007) 珠寶百年拓荒開埠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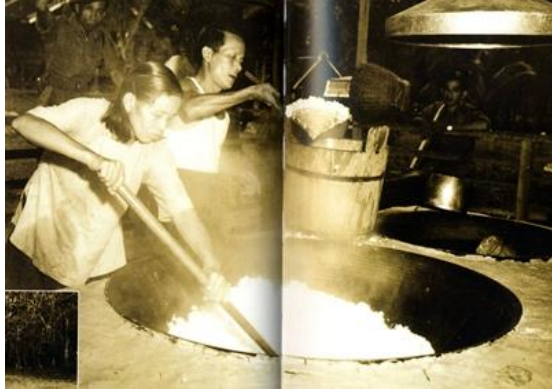


圖 2-13 工人正在煮大鑊飯



圖 2-14 村民在大鑊飯廚房外等待領取白飯¹⁷

江叔說「政府不給你們買米，佢(他)怕你們買到米給共產黨，給共產黨吃，所以佢米全部政府買到來煮好才給你們，等你哋(們)一點米都得不到」。政府在新村興建廚房和安排工人，由工人煮熟白飯後再分配給每戶人家。因此，拱橋新村除了瞭望塔、閘門、鐵線網外，還有較少人注意到的「大鑊飯廚房」(圖 2-13,2-14)。齊叔的父親當年就是負責煮飯的工人，齊叔還記得當時廚房就是現在位於河婆公會隔壁的位置，而煮飯用的大鍋子就像一個「大圓桌」，他說英政府是厲害角色，不給人民白米，而是按照每戶家庭的人數分配白飯。村民拿著鍋子或飯盒到廚房去領取白飯。

「我爸煮大鑊飯在那裡，就在河婆公會隔離(壁)，煮大鑊飯的鑊頭(鍋子)很大隻……我爸煮那個真是大大隻頭，好像一個大圓台(桌)。我爸煮大鑊飯好久了。你看政府多厲害，連米都不給你們，你們有登記有名，就拿個煲仔(鍋子)來，幾多個人就給你幾多飯。」(齊叔)

拱橋新村就設有數個專用的屋子，用來煮白飯。江叔還記得拱橋有好幾個地方「搭一間屋」都是用來煮大鑊飯。也有受訪者表示廚房其實是一個「棚仔」(簡易帳篷)。配飯時間是早上 5 時至 8 時，下午 5 時至 7 時，村民必須在特定的時

¹⁷ 圖 2-13,2-14 引用自 Hanif, M. A. M. (2006). The Malayan emergency revisited 1948-1960 : a pictorial history.

間，拿容器到廚房去領取白飯，工人會視每戶人家的數目而秤白飯給村民。每戶人家必須付錢後，才能領取米牌。齊叔說一定要付錢才能得到白飯，「是講(如果)沒 duit(錢)就沒得吃」，不過他已經不記得白飯實際的價格。雖然人民要付錢才能吃到白飯，還是有村民投訴白飯的品質非常的差。六嬸說「大鑊飯生嘅(不熟)好艱難吃」，她只好拿回家裡再重新煮一次，她說吃飯的人數眾多，煮飯工是無法煮的很好吃，她想起往事都覺得很悲慘。

三·秘密反抗的馬共黨員、軍警和村民

英政府派遣軍警日夜駐守新村，透過搜身檢查、限制糧食買賣，意圖阻止馬共黨員得到村民援助的民生物品。上層階段的政治權力看似壟斷拱橋新村的社會網絡與空間活動，實際上在新村內外伏擊的共產黨員、拱橋村民和部分軍警人員，則是稍稍進行不同層面的反抗行動。像是馬共穿過層層防範設施聯繫村民；認同共產黨的村民，悄悄運用不同方式救助馬共；一些被迫援助共產黨的夾心人也在英政府眼皮底下偷偷運送東西給共產黨員。

(一) 神秘的馬共

雖然英政嚴厲監控拱橋新村，但馬共還是有辦法聯絡上村民，並且招攬村民加入他們的武裝陣營。杜伯說他有些朋友加入馬共，而且曾經約他在山腳地區的芭場見面，他形容當時的形況是他「進去底背(裡面)就見到他，去芭場、菜園，我哋(們)去見他」。杜伯說他並不怕見面時會被英政府的警察發現，因為共產黨員「佢(他)有來放硝」。杜伯已經有兩、三次和馬共親身接觸的經驗，每次大約都會交談約一至兩個小時。

杜伯說馬共黨員邀請他加入馬共隊伍，馬共黨員「講你哋(們)講到你哋心服口服，你哋自己咪(上去)」。杜伯說他都會跟馬共表示「我不要上，是講不要上…

大家見面啦」。共產黨員也不會強迫他們一定要加入馬共。英政府設下嚴密的防制措施，但是馬共黨員依舊巧妙聯絡上村民，進行招攬黨員的活動。

(二) 馬共和自願救助的村民

雖然英政府執行戒嚴行動，有些村民在內心還是認同馬共。就像齊叔說的「馬共反政府，是政府做不對，他才有理。政府做對東西，對我們好來講，他不會怎麼」。即使村民不願加入共產黨，馬共也不會強迫他們。杜伯說馬共「不是壞人來嘅，只是親共嘛」。

王伯說許多馬共黨員，不管有沒有拿槍，都是「我們的村民，全部都是識得（認識）」，而且有許多人也曾經接濟馬共。江叔說拱橋新村曾經有一對夫婦加入共產黨，妻子過後不幸被開槍打死。丈夫抱小孩下山交給家人撫養。大家都假裝不知道這是共產黨員的小孩，家人則是在警察局冒認身份以領取小孩的報生紙。


「他拿(小孩)落來，叫人家抱落來給屋家人養…不要講他的，裝不知道，舊擺(以前)好容易做報生紙，假冒講他養的都可以。以前有錢報就得了，跟下(現在)不得，舊擺有錢去馬打寮報誰有兩個小孩子，寫到報生紙…」(江叔，58歲)

(三) 英政府和馬共之間的夾心人

馬共和英政府對峙的過程中，一部分軍警人員成為兩方政治勢力之間的「夾心人」。英政府要求軍警對付馬共黨員，凡是看到可疑人物皆可開槍射擊。另一方面，馬共又會對付不合作的警察和村民。杜伯說當他和警察共同看守瞭望塔時，即使他們看到馬共黨員也「不敢開槍打他，馬打(警察)都不開槍」。杜伯說「望月樓做樣而已」，他解釋道警察也擔心他下班後會被共產黨員對付，甚至被開槍打死。駐守新村的警察為了在英政府命令下履行任務，只好「做樣」(假裝)看守

瞭望塔；為了在馬共面前可以「保命」，他們也不會讓村民胡亂開槍射擊。

除了新村的軍警人員，拱橋村民是英政府和馬共之間最為難的夾心人。英政府明令禁止村民提供任何援助給共產黨員；但共產黨又會聯絡村民想要取得幫助。齊叔說「我們有時是夾心人，不接濟不得，接濟又不得。接濟，這裡政府不得嘛，不接濟，上面的人要你接濟他。不是說有槍沒槍，他們沒得吃，就是要你們接濟他。」江叔說「好像馬共叫你買麥嘅(什麼)東西，你不拉(幫)他買，你去芭場做，看他要不要打你」。他說即使你不到芭場工作以避開共產黨員，但你的生計又會陷入困境。伍婆婆說「有些河婆人在山腳耕芭，成日(經常)運糧食俾(給)山頂佬(馬共)」。



江叔透露他聽村中的長輩告訴他，為了不得罪馬共，又要遵守英政府的嚴厲規則，拱橋村民嘗試各種方法偷運食物出去，好像在屎桶中安置暗格。拱橋村民也在暗中和馬共黨員交易。「佢(馬共)就叫你們做好做好響(在)那邊放，給咗錢你，暗晚夜佢來搬上山頂去…總之佢暗晚夜才落來，咁(這樣)你紅薯你藏響那裡…你留給我，我補轉錢給你…第二日去，佢咪全部撈你夜晚時搬晒上山頂。」(江叔，58歲)。江叔意思是說馬共黨員會告訴村民他們需要什麼糧食，例如紅薯、木薯，並且會付款給村民。而村民收工回家時，就會把糧食藏在菜園裡面。等到晚上天黑了，馬共會自己運送食物回到山上，第二天村民到菜園時已經見不到糧食。

第三節 第二次戒嚴行動與村民挪用空間

上一節提到英政府時期的華人村民沒有公民身份，在面對緊急法令和戒嚴行動時，導致拱橋村民過著集中營式的生活。直到馬來亞宣佈獨立及在 1960 年解除緊急法令，華人村民的移民身份也轉變至公民身份。雖然華人族群提升了政治

地位，脫離外來移民的尷尬身份，但是國家依然忌諱馬共組織帶來的威脅，同時，國家內部也面對其他不同族群爭奪資源的情況。這時候，國家政治權力凌駕弱勢村民的公民權利，選擇性照顧特定的階級及族群。尤其是當國家面對社會安全事件(513 事件)時，政治權力變得更具影響力，可以頒布政策控制人民的行動自由，深刻影響 1960 年代的新村空間表現。與此同時，華人村民在與國家互動過程，不盡然是弱勢群體，他們取得某些空隙時，也在模糊空間的邊界和使用權。

一·華人政治身份的轉變及新村概況

二戰後，國際形成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及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兩大陣營展開意識形態上的鬥爭。馬來亞作為英國的殖民地，在沒有經過戰爭的情況下，從英國殖民政府手上獲得獨立，在政治和經濟上繼承了一大筆殖民遺產，與宗主國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繫。反共是馬來亞的基本政策之一，同時也是聯盟從英國人手中接管政權的重要前提。因此，馬來亞在獨立後，聯盟政府繼承英政府的政策，視馬共為破壞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堅決要打擊消滅。1957 年召開的聯合國代表大會上，馬來亞代表反對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並表示不會改變對中國的強硬立場（周聿峨、胡春艷 2010）。

1958 年，馬來西亞獨立後 1 年，華人仍然居住在鐵線網內的新村，及面對緊急法令的控制與公民權問題。在同年 11 月，華人政黨——馬華公會發動全國性申請公民權運動，積極爭取放寬公民權限制。1 年時間內，超過 100 萬華人，其中包括數十萬名新村華人成為馬來亞公民。王伯說他過來新村時，只有 IC(身份證)，但是沒有公民權，直到「那時候是馬華搞到來，有州證明」後才獲得公民權。六孀說她跟著大伙跑去「考」公民權，她記得當時「要去講馬來話，他有問你在那裡出生，他有問嘅。我就答他，他問我做什麼工，我話做菜園」，接受官員問話後就成功拿到公民權。

1960年7月31日，馬來亞首任最高元首宣佈結束為期12年的緊急狀態，全國華人新村步入歷史新階段。馬來西亞宣布獨立後，華人新村並沒有獲得國家重視，反而浮現各種社會問題。政府對新村撥款微不足道，官方解釋是英政府花費超過1億令吉(馬幣)成立新村和搬遷村民，又為新村設置水供系統、造橋築路等，但傳統馬來甘榜¹⁸卻受到忽略，是導致獨立後政府推行鄉村發展計劃時，優先照顧馬來甘榜的後果(馬華公會新村事務局 1999)。潘婉明(2004)在其著作中指出許多文獻都提及各種遷入新村後即享用的設備與便利，包括警察局、學校、醫療、民眾會堂、菜市場、水電供應等，他披露上述大部分新村設備都是後來增設，並且是逐樣增添，目前仍有少數新村的基本建設是遠遠落後在基礎水平之下。潘婉明(2009)進一步指出1960年代的華人新村，居民面對缺乏土地、就業機會、醫藥及其他社會服務的困難。

二·記憶模糊的第二次戒嚴行動

雖然最高元首在1960年宣佈解除戒嚴，但政府並沒有拆除拱橋新村的鐵線網、柱頭等隔離裝置。1969年全國大選，馬華公會慘敗，聯盟¹⁹所得議席大減。反對黨在獲得突破性成績後遊行慶祝，聯盟成員黨巫統內部大為不滿，在吉隆坡市區發動反示威。就在5月13日，兩派人馬發生衝突，也就是馬來西亞史上有名的513事件。513事件造成文良港地區發生馬來人、華人及印度人衝突流血事件，造成196個人死亡，439人受傷和9143人被捕。當天，敦拉薩以內政部長身份宣佈首都進入24小時戒嚴狀態(東方日報 27/1/2005)。5月15日，最高元首頒布緊急狀態，大部分西海岸城市(包括各地華人新村)都實施戒嚴，警方和軍隊控制國家。國會解散後，成立由敦拉薩領導的國家行動理事會(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 NOC)，負責恢復國家法律和次序。

¹⁸ 甘榜，馬來語為 **Kampung**，意即村落

¹⁹ 聯盟早期的成員黨為馬來人代表的巫統(UMNO)、華人代表馬華公會(MCA)和印度人代表國大黨(MIC)。513事件後，聯盟逐漸擴大成員黨範圍，並在1970年9月，由當時首相敦拉薩改為「國家陣線」(Barisan Nasional)，簡稱「國陣」

根據當年 6 月 7 日《星洲日報》報導，主幹公路的新村、甘榜、橡膠園、礦場都實施戒嚴，受影響地區的戒嚴時間由每日晚上九時至翌日早晨六時。新聞部促請民眾遵守戒嚴令，在戒嚴時間不得在戶外遊蕩，否則會被保安人員逮捕，甚至被開槍射擊。政府還把這次戒嚴事件聯想至共產黨，所有防範措施的目的是要確保無共產黨滲透。當時政府重新啟動新村的隔離和監視行動，從中窺見華人新村當時仍保留鐵線網、閘門和瞭望塔，而拱橋新村也不例外地列入戒嚴名單中。

我發現經歷過第一次戒嚴的年邁村民，和只經歷第二次戒嚴的村民，兩者對於 1969 年戒嚴情況的記憶有所不同。我嘗試整理年齡介於 40 歲至 79 歲的受訪者談話內容，從而模擬一個隔離和監視空間的情況。伍婆婆記得第二次戒嚴時，當時只有警察駐守在警察局，街上並沒有軍警巡邏，警察「一日放一個鐘頭你們出去買東西，去巴剎(菜市場)…你們出去買了就轉(回)來，全部都要關門」。伍婆婆記得當時新村四周還有鐵線網和閘門，警察還下令如果誰開門或開窗將會被槍打死，而警察並不算觸犯法律。

唐叔和伍婆婆和對軍警及巡邏各有不同記憶，當時唐叔約莫 15 歲，他記得自己有看過瞭望塔和鐵線網，他對「戒嚴有印象，當時情形怎麼樣就不記得。那時 15 歲咁上下(大約)…那情況好多兵出來巡街場」。當年 16 歲的江叔，每天都要騎腳踏車經過新村到市鎮上學，他清楚記得拱橋新村在 1969 年還有三個閘門，大閘門位於警察局旁，村子靠近大馬路旁及村尾有兩個小閘門。他說「出出入入都要查過你東西，看你有拿東西出去給共產黨吃」。新村每條巷子還有一位「頭人」(領導人)，如果有親戚到到你家過夜，村民必須和頭人報備領取證明文件，「不是萬一他(軍警)來查到你屋家多兩個人，當你是山頂佬(馬共)」，沒有報備的親戚可能會被當成共產黨員而被逮捕。

513 事件後，全國解除戒嚴的時間並不盡同，拱橋村民對新村何時獲得自由的時間各有說法，伍婆婆並不肯定第二次戒嚴時間的長短，她說「戒嚴都沒一隻(個)月，好似…不知十日還是兩個禮拜」。唐叔的家人當時是經營雜貨店，他記得當時警察會給兩至三個小時出來街上購買食品。他記得拱橋新村只維持戒嚴行動「大約有一個星期…好像慢慢就改善…我記得大約一個星期…agar(大約)有點印象」。村民對第二次戒嚴的時間和細節，明顯比第一次戒嚴時顯得有些混淆。從他們對二次戒嚴期間的回憶中，大致可以確定在二次戒嚴期間，新村仍然保持鐵線網、閘門的空間特色；政府也實行警察巡邏、登記戶口的管控行動。

三·華人村民挪用與再詮釋空間

當訪問老村民關於他們被迫搬遷到拱橋新村，以及後來必須忍受猶如集中營式的生活點滴時，印象深刻的是常聽到他們在講「有麥嘅(什麼)變啊」、「不係(然)可以點樣?」。這些話語背後顯示是底下階層無權無勢人民，在面對強大國家機器時，無奈何的艱困處境。雖然如此，村民在強權空間中，一旦取得反動的機會，他們還是會採取行動改善處境，江叔就說第二次戒嚴時，有些村民也「偷走出去…爬出去」，他說村民偷偷「剪爛」鐵線網，晚上偷走出去後再從「穿洞」的鐵線網「隆隱落」(爬進來)新村。我也觀察到村民甚至把原來隔離的空間設置，變成日常生活中「可用」之物。



圖 2-15 圍鐵線網的柱頭



圖 2-16 拱橋新村大路旁還能看見一些殘留柱頭

第二次戒嚴行動結束後，馬來西亞政府派軍警到新村拆除瞭望塔、鐵線網和閘門。許多村民已經不記得新村是什麼時候不見了鐵線網或是柱頭，這段時間新村呈現一個軍警力量與村民生活自主的模糊邊界。原來是用來隔離村民的鐵線網及柱頭，逐漸演變成居民日常生活使用到的部分。金和說他對鐵線網和柱頭印象深刻，是因為他的母親綁了一個罐子「穿」在柱頭裡（每根柱子都有十幾個洞，透過洞口串連鐵線網來圍住新村）（圖 2-15），每天都會有孟加拉的老板放新鮮的牛奶到罐子裡。現在的拱橋新村大路旁，還可以看見一些殘留的柱頭（圖 2-16）

「因為我成日(每天)有用到那個籬笆，我媽拿一個麥角(罐子)綁落去，那時幫個孟加尼買那個牛奶，買生牛奶給我飲，那孟加尼朝朝(天天)早(上)放落去，放去個麥角那邊」（金和，41歲）



圖 2-17 戒嚴柱頭



圖 2-18 居民再利用柱頭搭成小棚子



圖 2-19 柱頭的其它用處

有些生活貧窮的居民趁軍警還沒到來拆除鐵線網、閘門或柱頭，他們就主動撿下鐵線網、柱頭等修補住家。就像江叔說的有些村民住在新村的鐵線網附近，他們就撿起柱頭和鐵線網，用來圍住自己的居家。「閘門全部被人家，好似附近人要，就全部拆晒(完)。鐵網，柱頭全部要晒…他要的嘛，好像近的人，他就要…住邊緣的人要咗…鐵線網，那些柱頭…拿來有點用，拿來圍自己的屋家。」（江叔，58歲）


我也在田野調查過程中，看到一戶人家利用戒嚴時期的柱頭，配搭一些建築材料，建成一座簡易的小棚子，用來做編織竹籬及籃子的工地(圖2-17,2-18,2-19)。我訪問棚子的主人，他們也證實這些柱頭都是在解除戒嚴後，他們到火車路旁撿回來的東西。有些村民認為柱頭妨礙他們使用地方，他們就自己動手移除柱頭，重新規劃及使用空間。伍婆婆住家位於馬路旁，她的門前就有鐵線網和柱頭。當政府拆除鐵線網後，她和女兒也動手挖出柱頭，她說柱頭是深埋在地下，還灌注「紅毛灰」(洋灰)而顯得異常牢固，她和幾個女兒費盡力氣又搖又鋤，才挖走柱頭，挪出空地來種花。

小結：強與弱的權力交織及空間之主動性

從村民受訪的談話內容中，我們可以發現村民在未遷入拱橋新村前，大部分都是外來移民，他們散居在山邊進行農耕活動，沒有合法的公民權，經濟並不富裕。大部分拱橋村民並沒有政治權利、經濟能力，一般屬於社會邊緣的社群，當英政府面對共產黨威脅時，推行建立華人新村計劃，強迫村民搬遷到新圈定的住址，利用權力和軍隊塑造出一個隔離空間，以利監視及控制村民的日常生活，隔絕他們與外界／馬共的聯繫。軍警在拱橋新村設置瞭望塔、警察局、帶刺鐵線網、大閘門等，日常生活實行嚴厲的門禁和搜身行動，令村民生活苦不堪言。許多貧困的村民依靠農耕活動維生，為了對付共產黨，他們有時候被軍警強迫軟禁在住家，無法出門工作。除了白白蒙受經濟損失外，還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在這個邊緣的新村生活裡，也同時並存一些處於中心位置的村民，他們是少數可以買汽車、聘請別人代勞巡邏及看守瞭望塔的有錢人。

英政府的權力看似強大如瞭望塔、鐵線網，同時又細緻地監視與控管華人村民，但在這些全日監控的情況下，其他的權力組織依然可以游離在邊緣，並且在適當時候採取反擊，像是村民剪破鐵線網偷走出去。新村在經歷 1969 年 513 事

件後，政府和村民逐漸拆除閘門、柱頭等設置。村民移除這些原來是禁錮他們的建築材料，再利用來搭建木棚子，或是圍住自己的住家。這個情況反映一件非常有趣及值得思考的事情。首先是鐵線網和柱頭原來是一個隔離的工具，卻在後來成為村民日常生活的「用具」，例如，綁牛奶罐，或是圍繞及保護村民家裡的鐵線網，或是變成用作編織竹籬場地的棚子支柱。村民在和國家關係中，原來處於弱勢的地位，但是當他們有機會「接近」及「移動」柱頭及鐵線網時，他們又發揮創造力及「反客為主」的策略，在軍警不注意時移走材料，來加強自己房子的架構或是增建新的使用空間。我們看到「國家」和「村民」不是「強」與「弱」的線性發展關係，兩者隨時在不同的詮釋及使用空間。



在國家(英政府)強勢介入下，村民在 1950 年被迫搬遷到拱橋新村居住，過著被監視和隔離的生活。這種惶恐、擔驚受怕的心情，讓第一代及第二代的村民對新村戒嚴期間的生活和空間設置感到印象深刻。雖然有些受訪者有記憶重疊的情況，不過他們基本上都能清楚描繪閘門、鐵線網、柱頭的細節。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受訪村民皆對殘留的隔離裝置存有印象，只是大伙不是很清楚鐵線網、柱頭是什麼時候不見，這與村民獲得自由後的心情有所關聯，誠如六孀所說「自由了，安樂了，誰會記得這些事情」。從田野勘查中發現拱橋新村靠近大路旁，還殘留一些柱頭，村民和受訪者已經忘記這些曾經扮演隔離角色的柱頭，直到我問起他們時，他們才重新發現柱頭的存在。村民金和過後才發覺原來自己每日經過的馬路竟然還殘留下柱頭，讓他覺得很驚喜，他還說要回家帶孩子過來看看以前戒嚴時期留下來的柱頭。村民從無奈被隔離至如今驚喜發現新村還殘留一些戒嚴時期的柱頭，當中情緒轉折過程也值得我們探討個中原因。

監視的空間設計及軍警控制村民日常行動的權力，除了反映新村華人社會當時處於政治和經濟弱勢的情況外，**空間**也同時影響著華人村民的社會關係。拱橋

村民原來散居在山邊、老拱橋一帶，就近他們的農地。當英政府搬遷他們到新建的拱橋新村時，村民被迫遠離原來居住的地方及農耕地，每天必須騎腳踏車到菜園工作或是割橡膠。與此同時，新建立的新村名義上是作為居住用途，實際上是監視與隔離的空間，因而新村缺乏其他類型用途的土地，例如：農耕地。居民遠離原來的土地，在新村又缺乏其他土地使用；他們也因為馬共原因而生活在監控空間裡，承受「污名化」壓力，無疑進一步降低他們當時在國家的社會地位。在這個**空間又影響社會**的概念下，我們將在下一章繼續討論**土地限制**(例如缺乏耕地)加上新經濟政策帶來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如何形塑拱橋新村居民和國家及空間之表現。



第三章 邊緣化政策與逆流向上的村民 (1970 至 1980 年代)

當我們檢視空間結構時，將能觀察到國家(政策)是如何分配資源予不同的社會階層，造成支配與屈從的社會關係。換言之，國家政策中某些排除意涵，包括無法接近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領域，也將確切反映空間的邊陲或中心。上一章，我們看到英殖民和獨立初期，「交織的政治權力」貫穿社會和空間相互運作的過程。英政府運用政治權力建立華人新村，並且實行嚴密的監控行動；馬來西亞面對 513 族群衝突事件時，政府再利用既有的空間隔離設置控制社會局勢。

本章將聚焦於一個新興獨立國家進到新發展階段，政府由上而下推行的政策，如何影響社會不同階層的人民，特別是華人新村。與此同時，社會空間(和時間)的支配性與霸權的界定，永遠都會遭受挑戰，因而總是有改變的可能。遭到國家邊緣化的華人新村及村民，他們表現一種逆流而上的生活態度，藉由「跳飛機」提升社會和經濟地位，開啟民間社會塑造與影響空間形式的可能性。在第一節，我會先簡略馬來西亞政策與華人族群的關係，首先是從馬來西亞與中國的外交情況，分析華人族群的社會地位；並且從新經濟政策的內容，當中包括政策的具體目標及如何邊緣化不同社會階層。在這個環境背景下，華人村民如何採取「跳飛機」策略來回應國家由上而下的政策。我在第二節會聚焦於田野個案，接續討論新經濟政策如何影響拱橋新村居民，造成什麼效果，而村民採取跳飛機策略來回應國家政策。同時，我也會分析村民跳飛機帶來的社會階級及空間變化。

第一節 從國家政策看政府與華人族群的關係

一· 中國與馬來西亞的外交關係

馬來西亞於 1974 年 5 月 31 日與中國建交，是東南亞第一個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雖然兩國採取建交關係，但是馬來西亞政府依然防範中國和華人族群。例如：禁止年輕華人到中國旅遊或訪問，規定必須達 60 歲以上的年老

華人才能到大陸探親旅遊。或是華人到中國經商者亦須預先獲批准。周聿峨與胡春艷(2010)認為馬來西亞政府限制國民的舉動其實是害怕馬來公民(主要針對華人)到中國後可能受到共產黨影響，返回馬來西亞後會同情並支持當地的共產黨活動；二是擔憂他們回到母國後會激起強烈的文化情感，從而強化華族的社群主義。馬來西亞第四任首相馬哈迪於 1981 年上台，在他執政初期，兩國人民依然不能互訪，只是保持著之前中國與馬來西亞之間的貿易、人民探親及尋醫聯繫(何國忠 2007)。

從這段時期裡面，我們看到馬來西亞政府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中，政府對已經具有國民身份的華人族群，仍然抱持懷疑及不信任的態度。為了確保華人不會支持共產黨，政府提出到訪中國的限制。與此同時，馬來西亞國家內部發生 513 族群流血事件後，政府隨之推行的新經濟政策，更是邊緣化中下階層華人族群的生活權利。

二·新經濟政策的邊緣化效應

馬來西亞在 1969 年發生的 513 族群流血事件，是國內族群政治發展的重要分水嶺。官方認為這場暴亂事件真正原因，在於不同族群之間存在明顯經濟鴻溝。為了消除貧窮及重組社會經濟，幫助弱勢族群(馬來人)取得經濟地位，馬來西亞政府在 1970 年推出**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具體內容體現在第一個願景規劃及第二至第五大馬計劃(1971-1990)中。政府希望藉由新經濟政策消除族群之間的經濟差異，達至全民團結目標。新經濟政策和第 2 大馬計劃(1971-1975)同時進行，其內容主要是政府製訂具體的政策，來分配國家的經濟和教育資源。例如：教育機關採用馬來人與土著優先的「固打制」(quota system)，即大學名額是依族群固打制而非採取績效制。政府希望這項政策最後可以具體達到馬來人，至少佔有全馬 30% 經濟領域地位的目標。513 事件後，政府也在 1971 年宣佈「國家文化政策」，主要內容是國家應以土著文化為核心及回教是國家文

化的重要部分。其他文化中如有適當的內容，也可成為國家文化的一部分。

(一) 不幸遭到邊緣化的華人社會及新村

新經濟政策對馬來西亞社會發展影響深遠，政府關注扶持馬來人發展，華人社會包括新村，成為國家邊緣化的一環。新經濟政策的兩項具體目標是消除貧窮及重組社會經濟。在消除貧窮方面，政府大力發展落後的農村地區，降低貧困戶的比例。從 1970 年至 1990 之間，政府成功降低整體貧窮率，從 49.3% 降低至 19.0%，其中土著(馬來人為主)比例從 65.0% 降到 20.8% (侯政宏 2002)。雖然如此，一直到 1983 年，100 萬新村人口中仍然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下。在新經濟政策期間，享受到政府土地安置計劃好處的農民和佃農，馬來人占了 96%。馬華公會領導人也指新經濟政策正逐步剝奪農村地區非馬來族群，獲得合法土地的權利。從中可見新村長期被排除在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計劃之外(林勇 2008)。

華人新村困境大部份可以歸咎到缺乏耕地所致，當年在森林邊緣墾耕的「墾民」被集中到新村後，他們失去家園和農地。雖然政府在建立新村時，部分村民獲得 1 至 2 公頃的土地分配，但隨著家庭人口增加，土地不足以應付人力需求。更不幸是有些新村完全沒有分配到農業地，例如：硝山新村(林廷輝、宋婉瑩 2004)。馬來西亞理科學教授羅國華(2000)指出根據調查，霹靂州珠寶區瓜拉光新村 56% 居民從事農耕業，但有一半以上農民沒有屬於自己的土地，42% 擁有者的土地少於 1.2 公頃。1970 年代實行新經濟政策，政府土地安置計劃受惠者 96% 是馬來人，華人新村居民從中未得到太多實質利益。

羅國華也明確表示 1970 年代的華人新村面對五大問題，1) 缺乏農耕地、2) 低收入、3) 缺乏公平教育的機會、4) 房屋不足，人口過度稠密、5) 缺乏社會與硬體建設(Loh 2000)。除了上述問題外，華人新村最大的隱憂就是村民無法擁有房屋地契。當時政府建立新村是用來對付馬共，然而馬來西亞宣佈獨立後，中央政

府並沒有拆除華人新村，而是繼續允許新村存在。雖然如此，華人新村卻沒有獲得政府發出的永久地契。許多新村房屋或是持有 25 年租屋權(leasehold)，或是僅持有臨時地契(Temporary Occupation Licence, TOL)，需要每年到政府部門更新地契。更新地契是一個緩慢和不確定過程，造成新多華人新村居民對土地所有權感到焦慮與挫敗。直到 1983 年，只有 60% 的新村房屋確定其土地所有權(land titles)。1986 年 8 月全國選舉期間，華人新村土地權問題成為備受關注的政治議題，政府在選舉前迅速宣佈所有新村房屋，都能更新地契並延長地契至 60 年期限(Wang 1988)。

即使正在城市化的華人新村，仍然面對許多基礎設施與發展問題。全國最大的華人新村——增江新村發展協調委員會主席葉天保受訪時表示，1960 年代村民集資建成新村綜合大禮堂，可是輾轉交到吉隆坡市政局接管後，村民失去僅有的活動場所。如果村民要使用禮堂設施，還必須經過繁文縟節的申請程序。增江新村發展委員會秘書王啟強指出，增江新村範圍廣大，可是每年的撥款卻與其他的新村一樣。村委會缺乏經費，導致無法全面提昇村裡的基本設施(章菁燕 2010)。蒲種 14 英里新村村長黨民表示，該新村四周已被花園住宅區的排屋所包圍，不過地區卻面對缺乏休閒公園和兒童遊樂場等設施。雖然新村內有一個空地可用來興建遊樂場，不過該地段是塊沼澤地，需要逾 100 萬令吉進行填土。基於撥款與經費問題，導致計劃遲遲未獲得落實(星洲日報／大都會 2009)。

(二)新經濟政策下受惠的精英階級

當我們看到上述如何剖析政府在邊緣化華人及新村的需求時，我們彷彿聽到邊緣新村的華人，他們在國家政策偏差下掙扎求存的聲音。新經濟政策固然剝削非馬來人在國家公平競爭的權利，但我們必須警醒切勿以「馬來人」與「非馬來人」作簡單區分。詹運豪(1997)指出雖然華人為新經濟政策付出教育、經濟、文化的代價，但是華人商業精英在此政策下，卻是沒有受到多大打擊。他以研究報

告指出，華人企業在新經濟政策期間也持續擴大商業發展。這些華人公司取得特別軌道後，與有實力的馬來人組成聯營企業。他認為和巫統領導人一同爭取獨立的華人商業精英，例如被譽為「頭家政黨」的馬華公會，在新經濟政策期間變的更具實力。在「馬來人」與「非馬來人」的新經濟政策下，其實還掩蓋了「華人」族群內部不同階級與權力關係。當華人上層階級獲得與馬來商業精英合作的同時，中下階層的華人(包括新村居民)卻在為教育、地契和經濟機會而愁眉不展。

馬來西亞華人教育問題一直是華社核心捍衛的權利。以巫統為首的國家教育機關一直希望實行單一源流教育政策，目的是團結國民。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教總)是為爭取華文教育以至華裔公民的平等地位而成立，是華社權益的其中重要發言人。教總認為華裔是建國功臣之一，他們有權利和其他族群(馬來人)一樣接受母語教育。同時，教總也認為母語是最自然、直接、有效的教學媒介語。因此，華社想法是：接受母語教育是基本人權，華文教育必須納入國家教育主流。當政府設法在資源分配上邊緣化華人教育，例如：錄取大學生固打制、隱性執行「只許倒閉、不許增建」的華小策略，華社捍衛母語教育的反彈也越來越大。包括 1975 年董教總舉辦全國華文獨中統一考試、1977 年申請創辦獨立大學不果後於 1980 年入稟高等法院，創下民間組織為了申辦大學而狀告政府的歷史舉動。

一方面，華裔母語教育權利、華語納入國家主流領域，成為華裔社會中非常重要的課題。另一方面，華社內部也因為各自對華文教育的詮釋而出現「中心」與「邊緣」現象。時事評論人兼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曾慶豹在 1996 年曾經批評領導機構——董、教總只是在扮演技術官僚的工作，無法提升華教運動的層次。當時這番言論引起社會注意。曾慶豹(2011)表示上述文章刊出後，華教有關當局曾私下組織討論會，目的是為了「捍衛華教」，不容「局外人」惹事生非；由於害怕引來更多爭論，所以基本採取冷處理態度，也就是不回應，不作為。曾慶豹指自己的文章早已被視為華教的「異端學說」，甚至有人把他歸類為「漢奸

走狗」之類。從這個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在受邊緣化的教育課題上，仍然持續出現「中心」與「邊緣」位置互動的現象，與主流組織（董、教總）持不同想法的異議者，一般被邊緣化為華教圈子裡「搗亂」、「不合作」的人士。

國家實行新經濟政策後，外界經常以「馬來人=中心」與「非馬來人=邊緣」來看待馬來西亞的族群政策。以上簡略分析指出，巫統為首的國陣政府實施這項政策時，受惠者是華人與馬來社會的精英階級，財富的增長主要集中在上層階級手上，即是與政黨關係密切的商家手中。華文教育議題則是揭露華社組織在面對強大國家機關時，遭遇「邊緣化」困境；與此同時，華社組織內部出現異議和批評時，他們又顯得那麼「中心」，可以選擇不聽或是回應有關異議。

華社內部有許多不同階層的華人，位居上層階級的華人精英，他們可以在邊緣化的政策中脫困而出。至於社會低層的農民、工人，他們即無法改變空間限制（農耕及新村土地），又無力應變國家政策，被迫在華人新村裡，擔憂工作機會、農耕地契、教育資源被剝削等問題。當華人新村一些居民面對邊緣化族群政策，而無法進入國家主流領域時，一些村民採取「跳飛機」的對應策略，回應上層階級的政策，他們利用自己最大的本錢——身體，投入國際藍領勞工行列，企圖許願自己一個更美好將來。

三· 邊緣新村華人的「跳飛機」對應策略

林廷輝和宋婉瑩(2004)指出華人新村缺乏土地和就業機會，導致許多鄉區的華人村民遷移到他處尋找生計。1985年至1995年間，新村人口除了外流至大都市外，一部分也流入新加坡或外國「跳飛機」，成為非法工人。國人在外國以遊客身份留下來，逾期逗留並非法工作一般稱作「跳飛機」。雖然馬來西亞經濟在1988年起飛，但並沒有中斷華人到外國工作的潮流。非法到國外工作的華人數目難以估計，最大因素是國外高工資。馬華公共服務及投訴部主任拿督張天賜指

出，到日本跳飛機的國人當中，北馬人數佔了 90%。其中又以霹靂州和檳城最多，接著是吉打州。反而南馬一帶如柔佛等較少，也許南馬靠近新加坡，當地人選擇到新加坡工作(星洲日報 2008/06/15)。霹靂是國內最多華人新村的州屬，也是華人族群分佈重要地區。蔡浩銘(1992/09/17)曾經形容霹靂州子民每天呼吸空氣中，其中一個因子就叫跳飛機。1991 年政府為了抑制國民跳飛機風潮，實行暫時扣留返國淘金客護照制度，根據內政部 1995 年 7 月紀錄，霹靂州是全國最多護照被扣留的州屬，數目高達 7645 本(星洲日報 1995/10/09)。張天賜透露國人跳飛機最高潮是在 1993 年，逾期逗留日本的非法勞工高達 4 萬 2000 人，最低潮則是在 2002 年(8000 人)。近年來跳飛機人數又恢復增加，2007 年數據顯示有 1 萬 2000 位國人逾期逗留日本。另外，移民局資料顯示有 3 萬名國人在英國「失蹤」，華人逾期留英者就佔了 2 萬名(謝仲洋 2010)。

新村華人紛紛出國跳飛機，其實與政府多年來忽略和邊緣化新村發展有關。新村困境大部份可以歸咎到缺乏耕地所致。同時，政府透過固打制(quota system)干預教育領域和商業市場，也讓許多華人(包括新村居民)減少進入大學或是公部門的機會。另一個原因是新村建立後，村民人口持續增加但新村的房屋和土地格式不變，導致人口密度提高，1995 年全國每家戶平均人口是 5 人，新村則是此數目的兩倍，在吉隆坡平均住戶更高達 16 人。人口密度增長帶動新興房屋需求，許多出國跳飛機的村民皆希望賺錢回家鄉買房子或是興建新房屋，以滿足居住需求。華人新村居民出國跳飛機是非常普遍的景象，跳機客從國外匯回馬來西亞的款項，在 1995 年就每月保守估計就有 1500 萬令吉，單單是霹靂州金寶區一個小地方就每月收到 500 萬元的匯款(蔡鳳莉 1995)。中國報新聞指出霹靂州房屋發展商就透露，大部分購買顧客，都是靠在外國跳飛機的家人匯款回來才能購買房子(蔡浩銘 1992/09/19)。村民沒有土地，新村附近又缺乏就業機會，出國跳飛機成為很多村民的生存策略，以便賺錢後可以買房子或是做小生意，甚至賺取教育費以讓小孩進入私人大學就讀。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華人村民出國跳飛機蔚為風潮，這群華人勞工出國賺取金錢，深遠影響華人新村的空間與社會關係，我將在下一節仔細探討新經濟政策如何影響底下階層的拱橋村民，拱橋村民跳飛機的冒險過程如何幫助他們「另謀出路」及跳飛機帶來後續的空間與社會變化。

第二節 離鄉謀出路的拱橋村民

政府利用新經濟政策扶植馬來人在工商領域的發展，希望提高馬來人的經濟地位，達到馬來人可以佔有 70% 經濟市場的同時，也抑制非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及其他少數族群)在社會、經濟、文化與教育領域的發展。拱橋新村的老年、中年或是青壯年村民在受訪時，或是隱晦或是明言表達他們不滿意政府長期以來忽略華人新村的發展，更準確說應該是不滿意國陣政府推行「親馬來人」政策。陶先生受詢政府是否對華人新村關注不足問題時，就一針見血指出政府「不是漠視華人新村，而是漠視整個華人族群」。他認為在國家政策下的華人族群就是被邊緣的主體，不管是在城市或鄉村的華人，都共同面對被邊緣化窘境。本節我將從農耕地契(土地權)、華文教育權利與公部門工作機會，論述拱橋華人新村遭遇邊緣化的社會情況。

一· 拱橋新村社會邊緣化的情況

(一) 農耕地契

馬來西亞獨立後，政府重視發展馬來保留地。1970 年推行的新經濟政策，更是特別關注馬來農民的土地問題。1976 年聯邦土地發展局的報告指出，參與聯邦土地墾殖計劃者，馬來人占了高達 96.2%，華人 2.1%，印度人則是 1.6%，其他 0.1%。由此得知，華人有機會參與政府土地墾殖計劃者是非常少。許多拱橋村民在搬遷前，都是附近地區的墾民。他們被迫搬到拱橋新村居住後，依然回

到原來的農地進行耕作，但是他們多數卻沒有獲得政府分配任何農耕地。陶先生指出拱橋村民的耕地都是屬於政府地，當政府要發展時就會收回土地，他們也不會賠償給村民，或是僅有得到人道賠償。


「耕地是屬於政府地的，他們完全沒有任何，臨時地契都沒有，TOL (Temporary Occupation License)，temporary都沒有，所以他只是政府地，政府沒有發展，他沒有理你，你去耕咯。政府有一天要發展，他就可以，其實是不需要賠償你，因為我的地，我這麼久沒有跟你收租都好了，你就要走了……我們只有人道的賠償，像拱橋，Tanah Hitam(丹那依淡新村)，有些政府的地賣給發展商要建屋子，就賴著不走，講我們世代在這裡，但是最後你去法庭，你是輸的，因為那個地已經給人買去了，是他的，是有業主，所以人道賠償。」(陶先生，44歲)

除了馬來保留地和政府土地發展外，私人發展的錫礦場也「吞併」不少拱橋村民的土地。從前江叔也是在拱橋新村對面的「山邊」地區耕種，後來政府和發展商徵收他的土地來開採錫礦，農民「沒牙欄(地契)，他(政府與發展商)咪當你們非法，他要趕你就趕你」，被趕走的村民也得不到政府和發展商的賠償。即使是村民有意願申請地契，但往往無功而返。陶先生透露一個有關華人農民申請地契的荒謬事件。珠寶區瓜拉光華人新村農民，在聽取別人勸告後就請專業測繪師測量一直以來由他們耕作的農地，希望可以向政府申請到地契。結果他們不但沒有申請到土地，還被人領走他們做的測繪圖。對方(非華裔)使出「偷龍轉鳳」招數，呈報他們的測繪圖至政府部門。後來那個人成功申請到土地後，還向原來一直在那裡耕種的村民徵收地租。

Q：好像多數是華人面對申請不到地契的問題？

A：是，因為你一直申請不到…他(政府)不給你。(陶先生，44歲)

「我聽到是瓜拉光(新村)，他們去申請，人家說既然是政府的，你們去申請啦，希望他給你。好啦好啦，大家就出錢去請人來畫那個地，那裡是河流怎樣，誰現在在那裡耕，多大的地，請人來量、畫，畫了好幾千元…你知道後果是什麼嗎？……到後來不久呈上去石沉大海，但是過了不知多久，有一天，有人來說，這個地是我的，我已經申請到，然後他就拿出一張圖給你看，這個是我的。一看，那張圖竟然是他們自己當初 summit 上去，……州政府沒有用，他不會理你，他講現在呈上去之後，唉唷，有地，別人拿去申請拿到，而且不用出錢畫圖，你畫好好給他。我也是聽他們講，我沒有看到，他們就講說，他們發現到那張圖是他們畫的……他講竟然為人作嫁衣…他來結果他現在收租……是我的地嘛，現在我證明是我的地，我現在還沒有發展，他拿到了就收租，100 塊，200 塊都好。」(陶先生，44 歲)



政府徵收土地造成新村農民面對經濟發展困難的問題。1970 至 1980 年代，拱橋新村還是有非常高的農業產量，尤其以木薯為生產之最。根據《霹靂河婆同鄉會會訊創刊》記載，當時拱橋木薯廠林立，計有廣益利、李水(後為天定)、廣南興、曾榮豐、新民、榮發等。因為農業發達，也製造副業的工作機會。新村在全盛時期有 7 至 8 間的織蘿廠，有的村民帶回家中織蘿，村裡許多老少都曾有這個工作經驗。軍隆說當時新村很多人都是耕芭，種木薯，他說「你看做戲(戲台)，有幾間都是薯粉廠…廣益利、廣南興、南榮的名字。70、80 年，那時候很出名，有錢的都是他們這些人」。隨著耕地被徵收和泰國廉價木薯產品進軍馬來西亞，拱橋新村的木薯行業漸漸沒落。根據劉金線(2005)說法，拱橋新村的木薯業者無法保持競爭力，紛紛改種其他的農作物，如：蕃薯、玉米、蔬菜。有些人甚至就改行另謀他業。拱橋新村耕地被徵收、政府沒有給予農民補助也是導致木薯行業沒落的原因。

(二) 華文教育權利

新經濟政策的目標是重組社會，政治影響力還擴張到教育、文化領域。政府實行固打制來分配教育資源，積極改善與提昇馬來文學校設施及提升馬來大學生人數，忽略華文教育的需求和發展。家亨認為政府不公平對待各個族群，尤其在教育政策上，政府沒有全額補助華文源流的中小學，例如：三德中學，導致華校必須向社會募款維持校務運作。他說政府支持的馬來源流學校和回教堂就不需要出外募款。

「因為你唐人，唐人一定反你政府，第一你做野(事)不公平，華校好像咁樣私人，你根本上都沒幫佢(他)，唐人的學堂全部都是捐錢，育才、三德全部都是出來捐錢，你有睇馬來學堂捐 duit(錢)沒？變咗(成)有政府支持佢，回教堂什麼都是政府 support 俾(給)佢。」(家亨，40 歲)

華社為了維護傳統民族文化和母語教育權利而興辦華文獨立中學，課程設計是以華文為主要教學語。馬來西亞政府機構不承認獨中教育文憑，許多獨中畢業生在高中畢業後，選擇出國留學，例如：台灣、中國、歐美國家等，或是到私人界工作。就像志偉說「我了解台灣憲法，可是我不了解 Malaysia 憲法，因為我們沒有唸過嘛？為什麼？因為我們是獨中，沒有唸國中，我對整個 Malaysia 很陌生」。國家教育系統邊緣化華人族群接受母語教育的權利，一些華人父母想要孩子接受母語教育，只好送孩子進入華文獨中。有些學生高中畢業後就出國升學，這也間接讓孩子對馬來西亞的生活環境感到陌生。

(三) 公部門工作機會

馬來西亞公務員採用申請制度，當政府單位出現職缺時，就會透過網絡和平面媒體發佈廣告，有意者可以寄出履歷表，等待面試或是聘用。一般上，政府單位都是通過馬來報章發佈職缺消息，華人或是印度人族群很少從各自的語言報章

獲得資訊。華總會長丹斯裡方天興指出，大馬有 129 萬公務員，占有全國四分之一人口的華裔，在公務員領域僅有 6% (7 萬 9600 人)，而當中有 5 萬 3900 人是教師(2010/09/07)。當華總與公共服務委員會合作舉辦招聘華裔公務員時，一場活動就吸引 500 多人參與及申請，從中可見(新村)華人非常缺乏有關國家行政職務的資訊。方天興認為外界一般認為華人不愛當公務員，但這些公開招聘活動得到熱烈支持，證明華人不是不想當公務員，而是因為公共服務領域宣傳不足，或是華裔子弟不懂得申請的管道 (藍冰冰等 2010)。

曾經在台灣留學的志偉在受訪時義憤填膺說道，「因為對這裡(馬來西亞)很陌生，對周遭環境都不了解...和台灣差很多。撇開語言上的問題，好像華人新村，你從來沒有聽過這麼好康的東西(公職消息)!為什麼我們完全沒有這種 information，然後與世隔絕。現在是解嚴，我們還是維持那種「自治區」的感覺...政府有沒有發佈這些 information，然後掌握怎麼樣的這種消息，搞不好很多人都不會跑去新加坡。因為 information 很重要。」志偉認為馬來西亞政府忽略新村及華人的發展需求，「就是說沒有 link 到我們這裡的村民」，他形容新村「感覺就是自然被淘汰的一種新村，養老，就是養老」的地方。

志偉對馬來西亞感到陌生的情況，和他是一名獨中生²⁰及海外留學生有密切關係。相較之下，從華文小學畢業後升上政府國中的村民則是比較了解國家社會的情況。鳳英說「他(志偉)讀獨中，然後一畢業他就跑去台灣，所以他可能會這樣子想(缺乏資訊)，但是我們覺得...我們沒有什麼問題」。珮珮也同意鳳英的話，她隨即補充道「因為可能他(志偉)是獨中的關係...我們蠻了解，可能我們知道的是 50%，不會是 100%，可能他是真的...比如說他講他不知道做公務員有這樣的福利，我們是知道，但到底是怎樣的福利，制度是怎樣，我們是不知道」。即使珮珮是政府高中畢業的學生，但是其實對國家政策，例如：公務員招考制度也僅

²⁰ 獨中生，意指在民辦的中文學校受教育者。

僅一知半解。華人社會，特別是華人新村缺乏各種重要公共領域的行政資訊，導致華人村民失去應徵公務員的機會。另一方面，國家機關錄取及升遷公務員的「固打制」，也是限制華人進入公共領域的原因。

二·外闖謀生的拱橋村民

拱橋居民在建立新村初期是以「洗琉琅」(錫礦)及農耕種植為主。1970 至 1980 年代，則是以種植木薯而盛名，當時的拱橋新村更被稱為「木薯之鄉」。拱橋新村的主要經濟形態深受國際經濟局勢發展影響。80 年代，全球錫礦市場沒落及橡膠市場需求緩和的情況下，依賴錫礦及橡膠產業經濟的霹靂州，其經濟發展也停頓下來。與此同時，泰國木薯貨源進入馬來西亞市場，拱橋村民因為政府徵收農地及華人農民較難獲得農業補助的原因，無法與泰國進口的木薯競爭下，以致木薯種植及加工也成為沒落行業。拱橋新村居民在大環境結構下，無力改變經濟形態，加上新經濟政策邊緣化底層的華人族群，是導致村民紛紛出國跳飛機的原因。接下來，我將讓拱橋村民親身敘述他們出國跳飛機的原因，及他們在國外謀生的過程。

(一) 新村人·飛機客——底下階層村民的出路

家亨受詢時說「一路來霹靂的人，都係全部出去做工」，因為「霹靂州越來越差，很難搵食」。他感嘆道「霹靂州你知啦，以前有飛機場都變咗沒飛機場」。根據官方數據和新聞報導，霹靂州是全國最多人跳飛機的州屬，當中以華人新村的居民為多數，例如：太平、和豐、昆侖喇叭、瓜拉光新村等。玉淇曾經在 1990 年代到日本跳飛機工作，她剛開始時是在住家幫傭，後來轉做食品工廠。她說看到在日本打工的人是「新村的人多，太平啊，霹靂州最多。太平，也南、和豐、拱橋、瓜拉光、Tanah Hitam(丹那依淡新村)...太平好多，甘文丁，古萊那些好多，牛拉...」。家亨表示他在日本工作的朋友當中，全部都是華人地區的新村人，「我去朋友個度(那邊)都有 10 幾個人，昆侖喇叭人，拱橋人，全部都有 13, 14 個，

住宿舍，全部都係怡保區的人，昆侖喇叭，拱橋，瓜拉光，係這些區的人」。

政府推行的政策有利於保護馬來土地，或是早期私人企業及官方開採錫礦，導致拱橋新村的華裔菜農逐漸失去耕種的土地。村民失去賴以維生的土地，只好選擇出國工作賺取生計。陶先生就表示「所以你可以講說，為什麼那些人要往外面跑，其中一個因素也是他們這些農地，都是政府地來的」。家亨曾經到日本跳過4年飛機，也曾到過台灣合法工作半年，目前準備再到澳洲跳飛機。他說政府收回耕地興建工業區，導致成村民失去土地和工作，他也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工作。家亨又說自己只有國中二年級的教育程度，成績不好無法繼續升學，家中經濟又不允許其負擔私人學校(教育問題)，例如育才獨中或是工藝學院的學費，跳飛機成為改善家計的方法。即使後來拱橋新村附近興建了工業區，不過許多年輕人還是選擇出去城市打工。只不過出國跳飛機的趨勢轉變成在新加坡持合法工作簽證。值得注意的是陶先生所說「沒有受到很高深教育的都出去」這件事，因為這和馬來西亞政府對待華人族群的教育政策息息相關。

「政府收番(回)地，變咗佢哋沒地沒得耕，變開你要做什麼工？我都係讀朱毛(珠寶區)，讀到中二，邊度(那裡)可以去育才(獨中)，搭巴士車你都要 duit(錢)，買書 duit，…變咗我哋沒這滴資格，事關(因為)我哋不是很 pandai(聰明)讀書，變咗我讀完出來，我同我老豆講我要讀工藝學院，我老豆講不得啦…因為是私人(學校)嘅，要錢。」(家亨，40歲)

Q：拱橋對面有這樣多工廠，為什麼這樣多人離開？

A：外面的機會，跟那些公司，比這裡高，加上大部分年輕人，你會看到那些，尤其是沒有受到很高深教育的都出去新加坡…反而那些有唸到書的就不一定，有的在吉隆坡那裡，他就比較沒有說往新加坡去。早可能十多，二十年前就有一批人，就是去跟其他新村一樣，就是去外國淘金，所謂的跳飛機，去日本，很多去

日本，一些去英國、加拿大，但是這種現在已經少了…現在比較少聽到人跳飛機…
(陶先生，44歲)

(二) 村民的出國方法——新村內部網絡與外部秘密組織

唐叔說 1970-80 年代，新村很少工作機會，村民都選擇出國跳飛機。出國的村民又相繼介紹親戚朋友也一起出去打工，形成一個飛機客的人脈網絡。拱橋新村跳飛機風氣之旺盛，是不同時代的共同記憶。玉淇說她的同學和鄰居，幾乎每個人或是親戚朋友都曾經有過跳飛機的經驗。他的左右和對面鄰居都相繼到外國跳飛機。

「沒麥嘅(什麼)東西好做，就一個兩個跳飛機。一個兩個又跟著去…這樣是有一個去：這裡做好工錢，又介紹他朋友，他朋友又出去介紹，一個介紹一個，全部跟著出。」(唐叔，56歲)

「點解(為什麼)不多拱橋人跳飛機?日本都不知道幾多人去。拱橋都不知幾多人去咗日本。你睇(看)我哋這家去日本，隔離那家去美國，再隔離那家又是去美國，他兩個女去美國，再隔壁又去美國。」(玉淇，41歲)

根據受訪村民表示，開始時有些村民因為新村缺乏工作機會，於是有人率先出國跳飛機。最早時期出國的村民成為後來者很重要人際網絡，協助村民尋找工作或是住宿的地方。玉淇是 1991 年持旅遊簽證到日本，過後逾期逗留在日本打工。她說自己「有朋友親戚在度(那裡)嘛」，她表示「那時候我們沒咁嚴」，意思是日本政府沒有嚴厲過濾馬來西亞旅客，所以她和一位朋友「買機票，買幾件衫…那時候沒 visa(簽證)，不駛(用)visa」，就這樣到了日本開始打工。玉淇剛開始是早上在一個台灣家庭做女傭，下午就在電子工廠上班，後來就乾脆全職當工廠女工。玉淇在日本時也換了幾份工作，包括蛋糕工廠。

村民除了自己買機票到日本外，他們也會採取「跟團」的方式到外國跳飛機。家亨分享他出日本跳飛機的經驗，所謂旅行團的方式是「香港玩一天，去中國玩兩天，日本玩兩天」，接下來到日本後，如果某位團員要逾期留在日本工作，就是他們個人的事，與旅行團無關。他說「同團去旅行，去到日本你自己入，佢(旅行團)沒包你。進到去如果係有問話，你自己來嘅，你講你自己去香港玩一天，跟住來這度，你咪(不要)講團，你講團全部不進得。佢教咗你，全部教晒開(完)你」。家亨的意思是他是跟隨旅行團到了中國和香港遊玩後，接著他們就到日本。旅行團的人教他在經過日本海關時，必須要說自己是一個人來旅行，如果家亨說跟團，就會導致所有團友都無法進入日本了。旅行團方式比個人出國更為花錢，許多經濟情況不好的村民，都是向親戚朋友借錢作為資金，等到出國工作賺到錢後才能償還貸款。家亨就向家人和親戚借了 6000 元馬幣²¹出國跳飛機，他在日本工作賺錢後，第一件做的事就是還錢給家人和親戚。

「跟團」出國跳飛機是旅行社和飛機客一項心照不宣的事情，甚至涉及國家行政單位貪污的醜聞。有許多出國跳飛機的國民，他們的護照都有該國家逾期逗留的印證，這會影響他們以後出國旅行或是再跳飛機的機會。有些飛機客就會報失護照，以獲得一本全新護照。由於現在步入電子行政系統年代，即使申請一本全新護照，也很難清洗之前曾經有過跳飛機的紀錄，因此有人就會「俾人地搞緊」（請人處理）。有位匿名受訪者告訴我，他現在打算出國到澳洲跳飛機，計劃跟一個 8000 元馬幣²²的團出發。他對這個話題顯得很緊張和顧忌，當說到是什麼旅行團時就停頓下來。他只跟我透露現在旅行團「包」他，意思是提供他飛機票、安排各種有利的資料身份及負責帶他進入澳洲。如果不幸遇到海關「問話」，旅行團的人就會和「大家夾埋(對口供)，說要開會，要 meeting」。當他成功進到

²¹ 約 6 萬元新台幣

²² 約 8 萬元新台幣

澳洲時，受訪者就必須支付 8000 元馬幣給旅行團；如果無法進到澳洲，旅行團則會退費給他。受訪者覺得這個「包」的方式非常值得，因為即使進不到澳洲，他也不需要支付飛機票的費用。

(三) 跳跳跳·向上跳——跳飛機到先進國家

馬來西亞中下階層的邊緣人民在選擇跳飛機的國家時，都比較傾向選擇西方已發展國家作為對象。拱橋村民選擇跳飛機來改善家中經濟情況，他們在不同年代的跳飛機對象也有所不同。在 197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拱橋新村居民跳飛機的對象都是西方先進發展國，例如：美國、英國、日本。齊叔說他的生活經驗得知，「我們的年代，最先的時候…出外國，西方國家過(比較)久，美國那裡」，隨後就是日本。唐叔說外國薪水在兌換成馬幣後就比較高，所以村民在 1980 年代選擇到美國、英國和日本工作，他強調說村民在國外工作必須要節省才能存到錢。

「有的日本，有的英國，有的美國…我看都是八十零年的時候…他們出國做，圍(計算)到他的薪水好過這裡，他們咩出去…好過這裡…要博(拚)，在出面也要省。」(唐叔，55歲)。隨著全球經濟形勢演變，也影響村民選出跳飛機的對象。軍隆說1980年代時有朋友跳飛機到台灣，直到1980年代末，很多人開始跳去新加坡、台灣和日本。近10年來，新村人跳飛機的國家轉成澳洲、紐西蘭，甚至是村民以前沒有聽過的國家，例如：杜拜。

「那個年代很多都跳台灣，後來八十幾年頭，很多都是去新加坡、台灣，跟著再落來(接著)就是去日本…現在有些人就去中東那帶，杜拜，又或者是去澳洲、紐西蘭這些地方…杜拜，總之是以前沒乜野(什麼)聽過的名字…沙地阿拉伯那帶很多。」(軍隆，40歲)

三．一段階級與空間流動的冒險過程

1980 至 1990 年代，馬來西亞主流媒體在報導「跳飛機」現象時，不管是國家機關、政客、民間社會都充斥著刻板印象。民間主流聲音認為「華人有奶便是娘」²³，出國跳飛機可以「賺快錢」，何樂而不為？跳機客要求政府不要扣留護照，應該體諒他們想要賺錢改善生活的苦衷。內政部宣稱飛機客逾期逗留是「罔顧法律，損害國譽」²⁴。這些言論只是觸及表面看到的跳飛機現象，實際上飛機客出國冒險賺錢的事情，隱含著複雜的空間與社會關係(階級)變動。

曾經出國跳飛機的村民告訴我出國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玉淇在 21 歲時就和朋友結伴到日本跳飛機，她受詢選擇跳飛機原因時，就直言不諱說：「要 duit(錢)囉，那時候好鍾意 duit」。她說其他人告訴她出國工作的錢，再兌換成馬幣後，可以賺得比較多的錢。村民出國工作賺取外幣，無疑是改善家計最直接的方法。另一方面，即使是不曾出國的村民也觀察到跳飛機回來的鄰居朋友，明顯生活過的比之前舒服。金和說「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咁樣」，意思是說他看到村民跳飛機後生活都過的比較好。他說有的人後來結婚了，妻子也不需要出外工作，生活過的比較輕鬆。

「有些返來娶老婆，在這裡打工，娶咗老婆都無需要出去打工。」(金和，40歲)

陶先生說拱橋新村的人到外國工作後，經濟能力無疑是變好了。他舉證說珠寶地區的大眾銀行「裡面的人講的，嘩，很龐大…又一筆錢進來」，意思是珠寶地區(包括拱橋新村)每逢佳節，在外跳飛機的村民(包括鄰近的華人新村)，都會匯大筆金額回到家鄉，用以改善家中的經濟。

²³ 蔡浩銘(1992/09/27)，《中國報》

²⁴ 蔡浩銘(1992/10/04)，《中國報》

「應該是說因為有到外國去之後，就**經濟能力就好了一點**。(跳飛機)或者是到外面工作，那個錢有帶回來，你看啊，每一次過年的時候，假如去珠寶，只有一間銀行，大眾銀行爆滿，那些人拿錢回來要進銀行，或者來update他的戶頭什麼，那種定期存款的，所以珠寶Public Bank只有收錢，很少出錢...過年前那幾天，嘩，大眾銀行滿到，年年如此...」(陶先生，44歲)

(一)經濟再思考——向上流動的有產階級

金和、玉淇或是陶先生不約而同提到跳飛機，是直接改善家中經濟的方法。這是確切的事實，當我們仔細探詢村民出國賺取金錢的目的後，我們會發現跳飛機是中低階層華人向社會上層的**經濟、工作形態和教育流動**的其中一個途徑。首先，拱橋新村在建立二十餘年後，新村的房屋及土地不足以應付日益增加的人口，往往一間房子住了幾戶同姓兄弟。有些村民為了脫離原來大家庭模式，擁有屬於自己的房產，於是出國跳飛機的首要目標就是買房子，這也是**提升社會地位**的方法。

「做順(利)開咪有 duit(錢)寄...一個月寄3,4000元(馬幣)返來...咪存到 duit，咁樣咪買屋，叫我媽買，我未返來都買咗。」(家亨，40歲)。家亨和父母及姐姐共住在拱橋新村的祖屋，屋子還有其他叔伯兄弟。十幾年前，家亨在日本工作時就寄錢回家，他說在日本工作久了就可以開始存錢，他存到錢後，首先攤還和別人借貸到日本的資金，過後再寄錢回家鄉給父母。他的父母在他還沒回到家鄉時，就先用他寄回家的錢，購買拱橋新村附近的單層住宅。

金和說有些村民「跳咗飛機咗，做幾年返來，搭咗屋買車」。村民除了購買新房子或是修繕擴建新村的房舍外，也晉升至中產階級裡的「有車一族」。蘭美補充道，跳飛機回來的村民除了「舊屋變新屋」或是購買新房和車子外，村民還「投資什麼或者是買鋪頭(店舖)…做點小本生意」。從金和與蘭美的談話裡，我

們可以觀察到跳飛機除了讓村民擁有房子和車子外，也提供他們一個改變社會結構位置的機會。原來是工人或是農民的邊緣村民，他們跳飛機賺到的錢用來買店舖做生意，而經商是現今資本社會中提升社會地位的快速途徑。

出國跳飛機除了幫助村民擁有**產業**，提升生活經濟水平外，另外一個隱藏原因是華裔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隨著時代價值觀的變化，普羅大眾一般視農業為落後、退步或是沒有前／錢途的行業。很多父母不想孩子步他們後塵成為農民，反而希望孩子到城市或是出國(最常選擇新加坡)，從事辦公室工作，從**藍領階級**變成**白領階級**。就像陶先生所說，年輕人到外地工作，他們的情況比在新村非法農耕來得穩定；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耕種是很辛苦的工作，家長也不願意讓小孩接手農業。

「一方面也是這樣，比較穩定，一方面，也是年輕的人說，耕種很苦，曬太陽很辛苦，所以就不要那麼辛苦的工。有時候，連當父母的也不想孩子還要做牛。」(陶先生，44歲)

華裔社會一般視**教育**是貧窮家庭向上流動的重要機會，當馬來西亞公共教育不停壓縮華裔進入國立大學的機會時，國內私人教育機構和出國留學成為華人家庭的替代方案。非國立教育機構的費用一般比較高，跳飛機賺到的金錢成為孩子主要教育經費來源。拱橋附近的和豐市鎮也有許多村民出國跳飛機，劉四賀接受報章訪問時表示，「家裡兩個孩子都在唸中學，畢業後可能要唸私人學院」，於是他的太太為了孩子而到美國跳飛機賺錢²⁵。家亨在訪談中坦承他出國跳飛機，也是為了家中兩個「豆計」(小孩)將來的教育問題。他說「唐人細佬個(小孩子)讀書是好重要，但是你搵不到食是重要問題」

²⁵ 蔡浩銘(1992/09/14)，《中國報》

(二)不同於華人新村的生活經驗

藍佩嘉(2008)提到人們經常把勞動力的跨國遷移，視為一種推拉力量下的交互作用，一邊是貧窮國輸出國的推力，另一邊是富裕輸入國透過高薪形成的拉力。不過，她指出薪資落差只是形塑出國決定的一項必要條件(necessary)，而非充分條件(sufficient)。其他中介因素包括母國社會成就，全球化脈絡下形塑的現代性想像。許多邊緣村民採用「跳飛機」策略，改善家中經濟，並且在社會階層裡「向上流動」。除此之外，出國村民也在跳飛機的冒險過程中，體驗到不同於馬來西亞華人新村的社會和文化經驗，豐富他們個人的生命經歷。

屠先生在新加坡工作超過20年了，剛開始時他是以旅遊簽證進去工作，做滿兩個月後就回到拱橋新村工作一個月，幾年後拿到正式工作簽證後才安穩下來。他說新加坡除了薪水比較高外，另一個出去的原因是可以「去見世面，現在新加坡那些東西先進」。鳳英透露說一些在英國、紐西蘭跳飛機工作的朋友，他們「第一他們想要賺錢，自己想要買屋子，沒有可能是要靠家人，第二去見識一下。我聽我朋友是這樣子講，他們賺錢不是只是要買車子買房子而已，他們不是講真的很窮，窮到真的是要跳飛機那種，他們不是這樣子」。

家亨第一次出國是在日本非法跳飛機，過後曾經持工作證在台灣合法工作半年。他談到以往在日本工作經驗時，顯得很開心，因為他和一班馬來西亞朋友趁假日時，到日本橫濱旅行滑雪，他還拿出照片和我分享當中點滴。玉淇也說他和朋友結伴到迪斯尼樂園遊玩，他有些朋友甚至搭飛機到日本其他城市旅行。

「這度（裡）成班都是霹靂人，我們去橫濱玩，約埋（了）一起去玩，我地有連休...這個標誌就是 Yokohama 的風車...我有滑雪。有租那地架撐（工具），不過不識（會）滑，不識，不知點樣滑。」（家亨，40歲）

「有些人還周圍去旅行添(呢)，我們在disney land附近，人家有點(些)去大版玩，坐飛機添。」(玉淇，41歲)

大馬新村的勞工在國外除了趁假日時，到旅遊勝地遊玩外，他們日常生活模式和新村生活有所不同。家亨說他在日本千葉縣工作時，經常和朋友到海邊燒烤，或是到卡拉 OK 唱歌，或是去東京花園賞櫻。玉淇也說她在日本時，經常和大馬同鄉聚會唱歌和吃飯，尤其是有馬來西亞特色的食物。

Q：你們有同鄉聚會？

A：有嘅，拜六、禮拜。

Q：那時候聚會是怎樣？

A：聚會啊？就是去吃囉，吃喝玩樂，沒麼野(什麼)好做...不是就去卡拉OK，不是就去那滴星馬...那些馬來西亞人嫁日本，他們好pandai(聰明)，做那些唐人餐，nasi lemak, tonyam, carry(馬來西亞食物)。(玉淇，41歲)

在新加坡持有工作簽證的珍妮說，新幣兌換馬幣可以賺取較多金錢，新幣有一定市場競爭力，這是吸引她出國工作的原因。但他補充說明新加坡的工作環境比較好，如果有公司要幫他申請PR(居留證)，他願意留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

「最重要是匯率(兌換率)，畢竟新加坡錢換馬幣有兩點多，令吉(馬幣)將來一定會更低價，新幣多低都有不低。新加坡越來越繁榮，管制很不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不同的管制，新加坡政府雖然很嚴，是為了人民好，他們預先幫人民存錢，這是我老闆和我說的，新加坡政府要人民交錢作公積金，政府預先幫他們存錢，老了都不擔心，生活比較有保障。」(珍妮，24歲)

當華人社會和拱橋新村裡中下階層村民，在國家政策下受到邊緣化對待時，

他們利用跳飛機來改善家中經濟情況，提升教育和經濟地位，並且透過賺取金錢購買房子和汽車，晉升有產階級的社會。他們跳飛機打工的經驗，也讓他們有機會體驗不同於華人新村的生活方式。拱橋村民出國的冒險過程，注意：我稱這是一段「冒險」的過程，是因為不是所有出國跳飛機的人民都能衣錦還鄉，賺到足夠的金錢或是成功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還有許多因為跳飛機而死亡、失蹤、傷殘、被騙的社會案件經常成為報章的焦點新聞。拱橋村民跨國流動的冒險過程，讓我們充分理解到底層人民如何透過自身能動性，尋求日常生活的轉機。我將在下一節，討論拱橋村民因為跳飛機帶來新的社會關係，如何影響新村空間形式的改變。

第一節 拱橋新村內／外部的空間變化

一．新村內部：建造新式房屋及提升基礎建設

當拱橋村民被迫搬入新村後，失去原來的農耕地及新村土地只限於居住用途(隔離、監視)，導致村民進一步降低社會地位。隨之而來政府推行新經濟政策，又邊緣化非馬來人在國家經濟、教育、文化等領域的地位。在空間發展限制與國家政策皆不利中下階層的族群時，拱橋新村空間也呈現一個**貧窮及缺乏基礎設施**的形貌。

「以前這排全部是板屋…七十幾年的時候，就慢慢搭這些磚屋…一家一家慢慢搭過去。因為以前板屋那些是入新村到現在。」(唐叔，56歲)。唐叔說1970年代的木板屋特色，正是村民搬遷進新村時候蓋的房子，70年代後才逐漸改搭磚屋。當時新村最明顯的空間特色就是木板屋，還有周圍老舊的硬體建設及不方便的排污系統。軍隆說「1971，1976年以前這裡很多是**板屋**，或者是**半磚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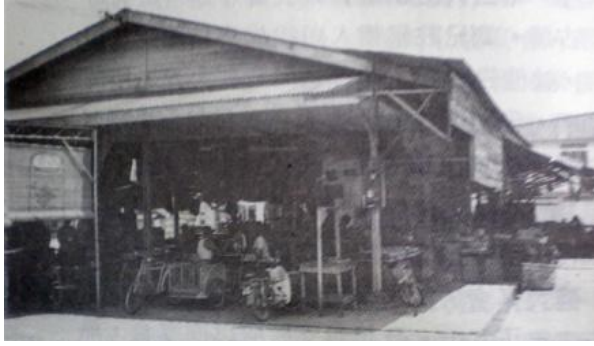


圖 3-1 巴剎(菜市場)



圖 3-2 籃球場²⁶

根據村民提供的照片，當時拱橋新村公共設施空間並不多，巴剎(菜市場)(圖 3-1)是木棚構造的矮小建物。唐叔也說當年的籃球場(圖 3-2)是露天設計，直到「舊(去)年才搭一個有棚，下水(雨)天都可以去打籃球」，他說新村這些年來的發展就是「改下這裡，改下那裡」。此外，拱橋新村也沒有便利的排污系統，每戶人家的排泄物都是隔夜放在路邊，讓工人處理。金和還記得小時候，他家就住在大路旁，他笑稱其是總部，他說每天都會看到一桶桶的夜香放在屋子斜對面，每次聞到那味道時就覺得很噁心。

「那時我們住那度(裡)就很長(噁心)，因為感覺到很邋遢(骯髒)，倒夜香那陣時，我媽的屋企(子)在路邊那度，夜香全部一桶桶，全部放在路邊…在屋企斜對面…那時那些夜香全部放在那度，那度是總部，那時我屋企門口成日聞到這些咁夜香味。」(金和，41歲)

雖然第二次戒嚴後，拱橋新村逐漸撤除隔離與監視裝置，但空間形式未必全然表現於大環境的物質特色(鐵線網、瞭望塔)，但從較小的公共空間仍然窺探到空間與社會關係的互動，例如老舊的菜市場、籃球場、馬路、木板屋(圖3-3)、新村入口牌樓(圖3-4)等等，皆呈現郊區華人新村遭到國家邊緣化的困境。

²⁶ 圖 3-1 及 3-2 引用自《霹靂州河婆同鄉互助會廿十年銀禧紀念特刊》



圖 3-3 新村木板屋



圖 3-4 新村入口牌樓²⁷



圖 3-5 新村的新建房屋



圖 3-6 新式洋房

隨著華人村民出國跳飛機，賺取金錢回到拱橋新村後，他們很多都會選擇重新擴建與修繕家裡的祖屋。新村很多原來是木板或是白鋅的房屋，逐漸改建成現代式洋房(圖 3-5，圖 3-6)。金和形容新村「就是一年一年不同，就是以前老那趟（老人那輩）全部都是板屋，現在到年輕的，全部慢慢穩(找)到吃咗，咁就（這樣）全部都搭過…現在都很少見到有板屋」。

陶先生說新村最大空間的變化是，原有的舊房子都修繕或重建成比較牢固的房子。「最大的分別就是房子，房子大部分都已經是**重建**過。因為最早期的全部都是板屋，最好的都只是半磚屋，即使是雙層都是板的，所以你現在看到的大部

²⁷圖 3-4 引用自《霹靂州河婆同鄉互助會廿十年銀禧紀念特刊》

分都是重建過，你可以看到…沒有重建的不會很多…。」（陶先生，44歲）



圖 3-7 拱橋新村關帝廟



圖 3-8 關帝廟多元禮堂外觀

根據劉一清(2007)說法，拱橋新村的關廟歷史悠久，當年村民被迫搬遷入拱橋新村時，有識之士陳瑪利、老興(真實姓名不詳)率先在現今的位址，合力鑿石板印「關帝聖神位」，簡陋的豎立了一把雨傘為蓋，供鄉民膜拜。直到 1971 年，王贊、陳菊輝和當時的村長鍾榮添等人齊心籌備重建關帝廟，在村民和善信的捐款下，終於興建了關帝廟(圖 3-7)和多元禮堂(圖 3-8)。隨著居民改善經濟情況，新村開始逐漸提升公共空間的設備，主要是表現在關帝廟及新村入口處的牌樓。唐叔說他小時候，關帝廟只是一間小小的屋子，直到近 20 幾年才翻新重建。唐叔在訪談中非常自豪村民可以自發籌款，搭建新的關帝廟及多元禮堂。

Q：有去關帝廟拜神嗎？你小時候就有關帝廟？

A：有，**先先有一間小小間的屋仔**…現在這間二十幾年前才搭。

Q：大家一起出錢搭？

A：阿公(新村所有人)嘅，阿公做的…籌款有，那時候我們還小。(唐叔，56歲)

二·新村外部：新興住宅區



圖 3-9 單層房屋住宅區



圖 3-10 雙層樓花園住宅區²⁸

林廷輝、方天養(2005)指出新村和周圍地區的人口增加，連帶衝擊新村外圍地區的房屋發展計劃，帶動附近住宅區林立。全國新村中，就有 66%的新村在外圍地區擁有房屋發展計劃。拱橋新村因為人口和居住密度增長，附近地區也出現新型花園住宅區，像是單層排屋(圖 3-9)或是雙層排屋(圖 3-10)。我想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出國跳飛機回來的村民，他們有能力購買新的房子，也促進拱橋新村附近的房地產發展。屠先生說拱橋新村「舊擺(以前)新村都沒得(有)花園，沒花園屋，才四百間屋這裡」。志偉在訪談中明確指出拱橋新村正在擴張他們的版圖，他說「往北擴張」意指新的花園住宅區，如：寶地花園、龍鄉花園、新拱橋花園、輝煌花園等等。

「我們的版圖在擴張，舊的新村是一樣，我們的版圖往北擴張。」(志偉，26 歲) (圖 3-11)

「房子也不會變很多…它是擴大了，就是講有拱橋新村，有那個寶地花園，然後新拱橋，然後他們會越起越多。其實舊的拱橋都是一樣的…它的房子都是一樣，沒有怎樣變…就是有起新的房子。」(鳳英，26 歲)

²⁸圖 3-9, 3-10 為古文聰所攝



圖 3-11 新興住宅區位置圖



圖 3-12 拱橋輝煌花園²⁹

「我有搬啦，從下面搬去上面而已…搬去輝煌花園，最新的花園。」

Q：是不是拱橋到寶地，後到新拱橋才到輝煌。你祖屋在拱橋？

A：對。（志偉，26 歲）

拱橋新村的居民覺得新的花園住宅仍然是屬於「拱橋」，不管曾經搬出去新村或是重新搬回新村的居民，都自稱他們為「拱橋人」。鳳英是新村第三代的村民，她在國小時，從拱橋新村搬到新的花園居住，又在國中時搬回拱橋新村。在他的記憶裡新村是「舊拱橋」，新的地區包括新建的花園住宅區，如：寶地花園。志偉原來也是拱橋新村居民，他後來搬到輝煌花園(圖 3-12)居住，在他的想法裡輝煌花園也是拱橋新村一部分，所以他才說「從下面搬去上面」。

小結：低層村民的主動性及拱橋新村擴張地域範圍

1970 年到 80 年代，馬來西亞政府與中國保持有限度的外交關係，顯示政府對已經具有國民身份的華人族群，抱持不信任的態度，擔心華人與共產黨聯繫。與此同時，1969 年 513 事件後，馬來西亞政府在 1970 年推行新經濟政策，主要

²⁹圖 3-11 為古文聰所攝

是扶助馬來人族群在經濟和教育領域的發展。這項政策下受惠的是不分族群的精英階層，而中下階層族群的資源卻面臨壓縮的情況，包括郊區或半城鎮邊緣的華人新村。雖然新村在稍後逐漸撤除隔離與監視裝置，但從較小的公共空間仍然窺探空間與社會關係的互動，例如老舊的菜市場、籃球場、馬路、木板屋等皆呈現郊區華人新村遭到國家邊緣化的困境。

70 年代末，邊緣的拱橋村民面對農耕地徵收、缺少工作機會和教育資源等問題，一些村民選擇「跳飛機」作國際(藍領)勞工來改善生活環境。村民透過內部人脈及外部的秘密組織出國打工，表現低層社會積極對應國家不利政策的主動性力量。成功的村民通過跳飛機帶來的經濟收入，可以改善家中的經濟情況。有些村民利用跳飛機賺取到的金錢，購買房屋或是店鋪作小商人，成為有產階級。也有父母以此幫小孩儲蓄教育基金，讓小孩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透過教育來提高社會地位。村民改善經濟情況也間接改變新村的空間形貌，例如：新村的木板屋改建成新式洋房、村民自發籌款興建關帝廟和多元禮堂、牌樓等。

隨著新村人口和居住密度增加，原有居住空間無法滿足村民需求，進而催生附近地區興建新的住宅區。當跳飛機或至城市工作的村民，改善他們的經濟情況後，也有能力購買新住宅區的房子。80 年代，拱橋新村逐漸擴大地理範圍，從原來單一的華人新村逐漸發展包含附近住宅區，例如：寶地花園、龍鄉花園、輝煌花園、新拱橋花園等；同時，政府徵收拱橋村新村對面的「山邊」農耕地發展成工業區，吸引東南亞各國的勞工前來工作。拱橋新村在經濟、社會歷史演變過程中，逐漸擴展成一個更大區域，本文稱此地理範圍為「**拱橋地區**」。我將在下一章，深入探討當拱橋地區出現人口與地理環境變化時，新的族裔地景如何呈現新的階級流動與空間隔離形式。

第四章 翻轉中心與邊緣的多元社會與空間 (80年代-2010年)

拱橋新村是昔日英政府藉由政治權力而形塑的隔離空間，到了馬來西亞政府因為推行新經濟政策又造成社會邊緣化現象及貧困的空間形式。中下階層的華人村民積極應變，透過出國跳飛機等方式改變自身的位置。上一章，我們看到拱橋新村在 70 年代末，開始出現村民出國跳飛機的情況。隨之新村附近地區也因應人口增長而興建新的花園住宅區。在歷史過程中，邊緣其實是一個流動的過程，而不是僵固不變的位置。當拱橋新村面臨地理範圍擴張，而出現不同的階級和族群時，又形成不同的族裔地景及新的階級流動關係。

本章第一節會透過中國與馬來西亞的外交關係，馬來西亞的社會環境、國家政策的變化，分析國家與華人族群的關係演變。第二節會闡述因應社會改變而出現的拱橋地區——拱橋新村從原來以華人為主的新村，逐漸演變成結合不同性質(居住、工業、商業)的空間結構——其社會人口的變化。接下來，我會在第三節分析當不同的族群身處同一個地區時，不同的族裔地景(主要是公共空間)如何表現空間隔離與階級流動的關係。最後，第四節將會分析在適當時機，處於不同活動空間的多元族群，他們是有可能藉由流行文化，創造一個跨文化的空間平台。

第一節 馬來西亞國家政策的轉變

一· 中國與馬來西亞的關係進展

顧長永(2006)指出冷戰結束後，馬來西亞開始改變對中國的觀感。主要是在 1989 年 12 月 2 日，馬來西亞共產黨領袖陳平分別與泰國及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協議，表明解除武裝游擊隊。另外是中國在同年通過公民權法案，不再承認雙重公民的權利，公開表明中國政府切斷海外華人及海外共產黨的關係。這兩個原因開啟馬來西亞與中國政府新一頁的外交關係。自此，兩國展開一系列的高層官員互動，進而提升雙方的政治關係。馬來西亞政府在 1989 年宣佈國民可以自由進出中國。自 1990 年代起，馬中關係快速轉變。兩國除了進行高層官員的互訪之外，雙方亦大幅加強經濟關係。

張應龍認為馬中經濟關係發展主要體現在 1)貿易總量不停增長，1975 年只有 7 億 6 千萬馬幣，到 2000 年突破 380 億馬幣。截至 2005 年為止，中國是馬來西亞第四大貿易出口和進口國，兩國領導人決心要在 2010 年讓兩國貿易總額達到 500 億美元；2) 不斷增加互相投資，在 2004 年底，馬來西亞是中國第 15 大投資國，總投資額達到 91 億馬幣；3)合作領域越來越寬廣，從一般貿易擴大至投資、勞務、旅遊，未來合作領域包括能源、通訊、傳媒、生物醫藥、高科技產業等；4)人民往來日益密切，除了到雙方國家旅遊的國民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兩國留學生。至於與中國語言文化相通的華人族群，他們和中國經濟合作的方式主要是參加馬來西亞政府組織的訪問團、華人社團組織的考察團、中國政府的招商會或是個人開拓市場。

二· 1990 年代後的國家政策

顏清滄 (2007)指出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經過 70 和 80 年代，爭取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平等對待運動，例如：獨中復興運動、文化復興運動(全國文化節)等，

90 年代迎來較為平穩的政治與經濟地位。這主要是 80 年代末，代表馬來人權益的巫統內部發生政治鬥爭，分化馬來人的選票。由馬哈迪代表的新巫統為了爭取非馬來人的選票鞏固政治地位，對華人採取較開明和容忍的態度。另外是中國在同時期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帶給馬來西亞經濟契機，為了應付商業交往的需要，華文和華語的商業用途變的重要。1991 年，馬哈迪政府宣佈實行「國家發展政策」(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NDP)，取代影響深遠的新經濟政策。

國家發展政策(NDP) 主要內容體現在第二個願景規劃(1991-2000)、第六至第七大馬計劃(1991-2000)。這項政策重申馬哈迪此前所倡導的政策改革，尤其是 80 年代中期以後採取的經濟自由化、私有化和其他放鬆政府管制，減少公部門投資，促進私營企業發展的有關政策措施。國家發展政策的核心任務是通過快速工業化、促進經濟增長和現代化進程，目的是在 2020 年打造馬來西亞成為先進國(發達國家)，此政策與「再分配」為核心的新經濟政策有所不同。新經濟政策著重強調通過族群經濟平等(特別是華人與馬來人)來改善族群關係，而國家發展政策則是提出先進國目標，強調經濟增長。雖然如此，林勇(2008.1)認為國家發展政策本質上還是和新經濟政策一樣，政府在表面上鞏固 80 年代中期的自由化、工業化、私有化政策，但新經濟政策中強調按照族群來重組財富的基本思想，仍然存在國家發展政策之中。

馬來西亞政府在 2001 年公佈第三個願景規劃(2001-2010)及第八大馬計劃，這兩項計劃構成馬來西亞國家宏願政策(National Vision Policy, NVP)的主要內容。宏願政策融合新經濟政策與國家發展政策的基本特點和內容，依然以團結國民、消除貧困、經濟增長為目標，並且在這基礎上強調建設一個「公平社會」。值得注意的是這項政策不僅重提馬來人 30% 分配目標，還明確規定實現的具體時限(林勇 2008.1)。馬哈迪下台後，2003 年新任首相阿都拉上台後，繼續執行這項政策。

第二節 工業化後的拱橋地區與新的社會結構



圖 4-1 拱橋地區

政府在 1991 年宣佈國家發展政策，其核心任務是國家通過工業化、提高經濟增長及邁向現代化進程，最終目的是達成 2020 年國家宏願，成為發達的先進國家。順應國家發展趨勢，霹靂州政府也在 80 年代開始發展工業，在州內設立不同性質的工業區，例如傢俱工業區。在第九大馬計劃下，珠寶地區包括拱橋也被納入北馬走廊經濟特區計劃(NCER)的高科技工業中心。自從霹靂州政府在 80 年代設立「拱橋工業區」(Kawasan Perindustrian Kanthan)後，吸引許多外資前來設立工廠，並且引進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外勞，例如：泰國、菲律賓、緬甸等。拱橋新村也從原來的華人新村及新興住宅區，擴充至工業區，本文稱這三個地區範圍為**拱橋地區**(圖 4-1)。

特別是近 10 餘年來，外勞人口數明顯增加，受訪居民也覺得拱橋新村最大變化是激增的外勞人口。陶先生說工業區起步時，「開始時沒有這樣多外勞，還是有本地人做的，慢慢應該是，本地人不能夠接受這個薪水，因為物價膨漲，不能夠接受，只好慢慢就走走走，外勞就進來取代」。珮珮說她小時候的記憶裡：「我曾經記得我們小學的時候有去參觀過工廠，所以那個時候應該是很久，不過那時外勞的還沒有這樣多」。隨著外勞人數持續增加，拱橋村民與外勞也多了互動的機會。本節將敘述拱橋新村因為社會人口演變，村民和外勞對彼此的看法和互動情況。同時，不同國籍、族群和經濟階層的人群為什麼及如何邊緣化對方。

一·華人村民 vs. 外勞社群

(一) 可怕的外來者——村民對外勞的印象與評價

一般上，村民受訪有關外勞事件時，或多或少都表現出不友善的態度，鳳英就明言表示外勞是「烏煙瘴氣」的一群。大部分受訪的新村居民，他們對新來的外勞社群持有負面印象。志偉的家和隔壁鄰居都曾經遭遇搶匪上門打劫事件，他說「有很多外勞。**很可怕**，每天都在擔心說可能有人進來。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以前那有這些事情，根本不太可能啦」。志偉覺得拱橋新村及鄰近地區的治安一向良好，但自從外勞出現後，他居住的輝煌花園就屢次遭遇上門搶劫事件，他認為外勞是治安肇事者。鳳英覺得自從外勞出現後，他和鄰居的家就進賊了，她表示「以前我家隔壁就是搬來印尼人，他們來這裡做工，就是那個時候，我們家裡才進賊，不止我們一家，還有我們家後面那些，連那個人的狗都給他毒死掉」。

蘭美和丈夫從前居住在拱橋新村，在10年前才搬到鄰近新批准的土地興建房子，該區也是屬於拱橋新村的範圍。她說以前在家裡時，她不用鎖大門，平常和鄰居都會在門口聊天。現在隔壁家住了兩、三戶外勞，外勞經常半夜在外面的街道走動，「現在你要放那個囡(女兒)在門口踩下腳車，你是不是要在出面守著她，又怕，擔心她不知拐去，拉去那度(邊)，擔心這些問題」，讓她覺得很不安心。蘭美說大約在1994年，外勞開始進入拱橋新村範圍，她暗示部分外勞女性在新村進行「不道德的交易」，有的還趁機纏上村中男性，或是藉由懷孕嫁到村裡，進而成為馬來西亞公民；心腸不好的男性外勞則是打劫，導致社會不安寧。

「女仔就在這度或者進到來這度(邊)，名義上是話來這度做工，但是都有做**不道德的交易**。跟住(著)有些人來到這度打工，其中有識到這度的男仔，都嫁來新村。開頭(始)是話來做工，做做下就變咗馬來西亞新抱(媳婦)，男人又走去撩(挑逗)她哋(們)，咩野(什麼)不是，跟住有咗身孕，或者又怎樣，又話做開馬來西亞人。有的就好像講男人來講，就在這度做工，有的**不好心腸**，就在這度打家

劫舍，什麼都有。我哋社會都不是很安寧那隻。」(蘭美，39歲)

志偉去年剛從國外大學畢業回到拱橋新村，他說在 2006 年開始，發現新村有很多外勞走來走去，他覺得「真的很害怕，因為我出去這麼多年，就是差不多過後回來的時候，06 年開始就有很多這種人在街上走，很囂張那種，手牽手喔！村尾村頭都看到這種…看到他們，村民那些都怕怕，因為發生這樣多事情，你又沒有保障，就是說演變到這種地步，其實更可怕」。有一位年輕婦女也說她家隔壁的外勞「很吵，常常吵到我們…我們和他們沒講話，之前住唐人時就有講，之前鄰居就有講話，都是認識很多年」。³⁰

(二) 華人與外勞移工的階層化關係

東合及馬來西亞國際策略研究所發表的一項統計及亞太洋國家移民政策的研究報告指出，馬來西亞不只是勞工出口國，同時也是勞工進口國。馬來西亞華人多數到日本、台灣和新加坡工作³¹。同時，馬來西亞又大量輸入印尼、孟加拉、菲律賓和泰國勞工，在園丘、建築工地等工作(侯雅倫 1995)。截至 2010 年官方數據，馬來西亞共有 180 萬 3260 名合法外勞³²。馬來西亞外勞人數超過一半是印尼外勞(50.9%)，其餘是孟加拉(17.4%)、尼泊爾(9.7%)、緬甸(7.8%)、印度(6.3%)及越南(4.2%)。外勞從事的工作領域以製造業為主(39%)、其次是建築(19%)、園丘(14%)、女傭(12%)、服務業(10%)及農業(9%)。³³

「我哋(們)本地的就出國，他哋又來我哋這國。我哋出英國、美國、日本、台灣、澳洲那些，他哋就來我哋這裡，那些印尼仔、泰國仔、越南仔」。伍婆婆描述的正是一個不同國家勞工，跨國移動打工的動態過程。80 年代拱橋新村中

³⁰ 田野觀察及訪談紀錄 (20100721)

³¹ 1992 年，有 1 萬 8534 馬來西亞人在台灣非法工作，日本逾期逗留者高達 3 萬 4296 人。

³² 馬華總會長蔡細歷估計合法外勞及非法外勞數目高達 300 萬人。《星洲日報》(2010/05/09)

³³ 《星洲日報》(2010/04/14)

下階層的村民，面臨國家邊緣化的政策，選擇出國跳飛機改變生活困境。一般上，他們跳到西方先進國，如：美國、英國、日本、台灣尋找工作機會。在同個時代背景下，馬來西亞作為東南亞地區內，經濟體較為活絡的國家，又引進來自印尼、泰國、緬甸、孟加拉、尼泊爾等外勞前來工作。霹靂州的拱橋工業區也因為發展工業，而引進前述國家的勞工，他們一般從事廠工，有部分是農耕地工人、建築工友或是家庭女傭。

拱橋地區浮現新的社會結構，除了地理領域擴張外，也出現更多元的人口樣貌(華人、印度人、馬來人、不同國籍的外勞)。雖然拱橋地區的華人新村有過不少出國跳飛機的村民，或是其家人曾經有跳飛機的經驗，但是當拱橋地區出現其他東南亞國家跨國勞工時，多數受訪村民對外勞社群抱持負面看法，把地區治安問題歸咎到外勞身上。雖然村民和外勞處於同一經濟階層(勞工身份)，卻又以政治(公民)和族群(華人 vs. 印尼、泰國等)的優劣性來邊緣化對方。原來處於邊緣位置的華人村民，搖身成為地區裡的「上層階級」。

二．「害羞」不敢接觸村民的外勞社群

除了一名來自緬甸的外勞在拱橋工業區只工作了半年，其餘受訪外勞住在新村或是附近的店屋、花園住宅至少有一年以上的時間，但他們都表示並不熟悉拱橋新村，也沒有認識到村民朋友。巴布(尼泊爾籍)已經在拱橋附近的店屋居住 8 年，每日必須經過新村到工業區上班，但是他並沒有認識到一位村民朋友。馬恩(緬甸籍)同樣居住在拱橋新村附近的店屋，他在這裡工作半年，但很少去拱橋新村，平常只是「上班及回工廠宿舍。每天都是如此，沒有認識拱橋的朋友」。

即使住在拱橋新村的外勞，他們和華人村民毗鄰而居，日常生活卻是很少，甚至沒有交集。布迪(印尼籍)說每逢過年的時候，他們宿舍附近尼姑庵的師姐會送他們一些柑，不過平常雙方很少互動。布迪也說自己沒有村民朋友。碰巧隔壁

的鄰居回家，我接著問鄰居是否有送柑給他們，布迪說「那裡會有」。亞里(印尼籍)住在拱橋新村已經有 2 年了。他說外勞住在新村裡，但是很難認識到華人村民的朋友。外勞對村民的印象並不深刻，日常生活也甚少有交流，彼此過著「互不侵犯」的生活。亞莫(印尼籍)表示「我們不騷擾(kacau) 他，他們也不會騷擾我們，我們對他好，他也會對我好」。亞里表示同意，他說「在馬來西亞重要的事，我的想法是不要騷擾(kacau)別人。如果我們騷擾別人，他們一定也會騷擾我們，這是相互的事」。

我認為外勞與村民互不「交涉」的另一潛在原因是，外勞本身也陷入「被污名化」與「刻板印象」的桎梏。亞里表示鄰居都是華人，他覺得很「尷尬」或「害羞」，所以沒有交結到相熟的鄰居，他也透露擔心鄰居覺得他們是小偷。

Q: 你住在這裡有認識到鄰居嗎?

A: 沒有，這裡也很難認識，這裡**100%都是華人**。

Q: 華人也會說馬來文/印尼話。

A: 他們會，但有時候我們**害羞(malu)**，**尷尬(segan)**，我們都不認識，那裡可以？

他們可能會覺得我們是小偷...我們也覺得害羞³⁴，不是害羞...是尷尬，我們都不認識。(亞里，35歲，印尼)

我在探勘田野時，曾經有位村民告訴我「丟空的房間不租給印度人，他們成日(常常)不交租金。如果租給外勞，他們老闆會幫他們交錢。外勞沒有「摻」(加入)我們，自己關在家裡。」³⁵ 從田野觀察記錄及兩位村民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發現住在新村的外勞經常待(關)在家裡，很少和鄰居互動交流。鄰居也不會主動和他們說話。雖然他們身處在一個空間裡，但彷彿有一道無形的牆分開外勞

³⁴ Malu，除了是「害羞」，也可譯為「羞恥」

³⁵ 田野觀察及訪談紀錄 (20100714)

和華人村民。

三·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群再相互邊緣化

(一) 華人/外勞 vs. 印度人/馬來人

雖然多數受訪村民對外勞社群抱有負面看法，認為外勞是造成地區治安不靖的原因。吊詭的是，當我於訪談過程中，在適當時機和受訪者分享我親身訪談的一位尼泊爾籍外勞，也曾在新村裡被搶劫並且流血受傷的遭遇。很多原本對外勞抱有敵意或是負面印象的受訪者，又會在言語中體諒外勞處境。剛開始時，蘭美覺得外勞進入新村及附近住宅區，破壞村裡向來平穩安寧的生活。當她聽說外勞也成為搶匪的對象時，她又想起婆婆家門口也曾經有好幾宗外勞被搶劫及受傷事件，而聯想到本地人出國工作也可能被雇主虐待，進而轉向同情離鄉工作的外勞。

「我家婆門口都有過幾擺(次)，印度人打搶外勞。走著過，夜晚成十點左右，幾次開，打到他們流到成攤血在那度(邊)。很慘，就好像我哋唐人在外國跳飛機咁是同一個情形，不要講乜野(什麼)，出到去被那度的事頭(老闆)虐待你哋都不知，不通你敢返來講怎樣怎樣，這度方面的人都會擔心，報喜不報憂。(外勞)有的好，有的不好，都要防，因為現在的社會不是好像以前咁安靜…」(蘭美，39歲)

鳳英在訪談過程中數次提到自己、鄰居和親戚都曾經被人打劫，她認為外勞進到拱橋地區，是造成地區罪案飆高的主要原因。當她聽到外勞也被人打劫時，鳳英轉而舉例印度人也是主要的犯罪者。「其實我們也不是講什麼…一定是他們(外勞)，但是我們聽說治安是比較不好，聽我媽講很多那種auntie被人打搶…我家裡幾對鞋子都被偷走了，我不懂是印度人做還是怎樣，我們附近那裡有一家印度人，他們就比較窮的那種，不確定是不是他們，他們偷的那種是女裝比較好看

那種，然後偷我弟弟那種做工的鞋子」。軍隆指新村的人「不是提防外勞，是人與人戒心高點…不一定是外勞，因為很多時候…都是印度人和馬來人多」。在旁聽到的康大姐也附和道，她說親戚家隔壁的外勞也曾被打劫過兩次，「我們馬來西亞人做，那裡關外勞事，外勞都不知幾慘，我們這裡的外勞，都被人家打劫」，她甚至說了解內情的村民都知道搶劫並不是外勞所為。

伍婆婆認為外勞並不是犯案者，反而是受害者。她與一位印度裔外勞相識交好，後者常常經過他家門口時都會打招呼，她舉例說明那名外勞曾經被人打劫，搶去金錢和原來要進銀行的支票，眼睛還「被人家打到，腫到看都看不到，非常冤枉」。陶先生也非常同情外勞的處境，他還透露說執法機構也向非法外勞收取保護費。一般而言，拱橋新村居民的耕地是屬於無照耕種，所以雇主無法以合法途徑申請外勞前來工作。因此許多在耕地工作的外勞都沒有合法身份，導致外勞和雇主必須面對警方、移民廳和警衛團的要脅。由次涉及敏感的官方收賄問題，陶先生在訪談中顯得避忌說出「錢」的字眼，多次做出「金錢」手勢來示意。印尼籍勞工亞里也說警方會向非法外勞收取金錢，他說行賄「這是很普通的事」。

「外勞還要交保護費給警方…警方也會收這個(錢)…這裡很多那些耕種的有請一些外勞…非法的，晚上要躲起來。他們外面三個方面來阻，要逮捕他們，然後要這個(錢)，第一警方，第二移民廳，第三警衛團，因為警衛團也有這個權力，政府給警衛團幫忙捉外勞的，非法外勞。」(陶先生，44歲)

拱橋村民在聽到外勞也遭到搶劫的故事後，他們醒覺到外勞也可能是治安敗壞下的受害者。這時候，村民在同理心(大家都有一樣國外工作的經驗、被搶劫的遭遇)下，他們置放外勞於同一階層(治安受害者)，轉而視馬來或是印度族群為「加害者」。

(二) 印尼外勞 vs. 其他外勞

拱橋地區的外勞並不是同質的社群，他們內部也是由不同國籍、語言、文化的成員所組成。當一般拱橋華人村民視外勞為低下階層，無公民身份的勞工時，我在訪談中又發現華人村民在社會層級裡，又以不同外勞群體的經濟和語言能力來作更細緻的區分，顯示另一層面的中心與邊緣關係。軍隆說外勞社群當中「唯一比較大方的外勞是印尼仔」。他解釋說外勞一般是建築工地工人，以工作天數計算酬勞，比起其他在工廠打工的外勞賺取較多錢，是屬於消費能力較高的外勞。印尼外勞比較愛乾淨，也捨得花錢購買有牌子的民生用品。

「印尼仔他們比較捨得吃，通常其他外勞來到都是做廠工多，他們的收入低點。印尼仔來到這裡，可能他們有合法或者不合法，通常他們可能從事這些…屬於是段工（一天一工酬）的，工錢會高點，建築或者是…他們很少做散工，他們工錢會高點。跟著他們的民族性，他們比較喜歡，他們比較「企利」（愛乾淨）點，他們對美容那些野（東西），他們捨得花…洗頭水（洗髮乳）你話三、四塊，他不買，便（宜）的洗頭水他們不買，印尼仔他們使用一定是Fair and Lovely, Pond這些牌子。」（軍隆，40歲）

在外勞群體中，孟加拉、尼泊爾的工人，因為語言能力如不會講馬來語，導致他們成為邊緣外勞團體中的「邊緣人」。康大姐說他們根本無法和非印尼外勞溝通，「根本溝通不到，那些人…馬來話都不識講，印尼仔還話溝通得到」。吊詭的是，即使印尼外勞是可以溝通的群體，但村民又覺得印尼人生性較兇狠，「殺人不眨眼」，反而不會講馬來話的尼泊爾外勞比較安靜溫馴，「我覺得他們印尼仔，殺人犯，成日打人不眨眼，真是！他們（尼泊爾）比較diam（安靜）點」。

華人和外勞、華人與馬來人及印度人、外勞與馬來人及印度人及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勞，在層層疊疊的社會關係圖像下，拱橋地區於 80 年代開始出現複雜多

樣的空間形貌。特別是近十幾年來，外勞人數明顯上升，衝擊著拱橋地區的社會關係與空間景觀。下一節，我們將討論因為族群、經濟、政治身份的不同，拱橋地區包括拱橋新村、新住宅區及商業街道，特別是在公共空間——族裔地景——，如何表現新的空間隔離與階級流動。

第三節 拱橋地區不同族裔空間之排斥性

隨著馬來西亞政府著重發展工業，霹靂州政府設立拱橋工業區，並且引進東南亞不同國家的外勞前來工作。華人與不同國籍外勞因為對彼此的刻板印象或是偏見，導致拱橋地區的空間出現排斥現象。拱橋新村及附近住宅區的華人村民，他們一般對外勞都有刻板印象，覺得外勞是犯罪者，造成地區罪案飆升。雖然有些華人村民醒覺到外勞未必是犯罪者，但在受訪過程中，依然隱約提到外勞的「危險性」，並且認為外勞「入侵」他們生活環境，造成不安全的空間。志偉覺得自從拱橋地區多了外勞後，「很可怕，真的，就是治安不好，…因為他們闖入我們的空間，然後又發生這種事情(罪案)…真的很可怕…」。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新村住家過往門戶開放的情況，演變成居民要鎖起家門或是設置圍籬。軍隆說小時候，他要到朋友家玩耍時，都可以直接穿越鄰居家到達朋友家門口。現在新村現在多了外勞、馬來人和印度人，新村最大的不同是每間屋子都設有圍籬。

「以前就…很少話(說)，以前唐人多，很少話印度人、馬來人，現在就多了外勞這些。屋，現在的新一些，但是間間屋都有圍籬……以前好像我們去朋友屋企(子)玩，全部都可以這裡走過去就可以，全部行上行落(走上走下)都可以…穿來穿去，現在不行，你一定要走出門口，去到人家的門口再進過(去)。」(軍隆，40歲)

蘭美說自從拱橋地區多了外勞後，她「出出入入都要鎖門，我因(女兒)出去走下公園都要守著，你沒時間你都不敢放她出去…以前那些人都是你兩對面打開門都是可以，現在你不關下門邊度(那裡)敢。因為現在什麼人都有」。根據我的田野調查，拱橋新村約莫有50餘間空置房屋，不過大部分受訪村民表示他們寧願空置房屋，也不想租房子給外勞。陶先生說「有些人他是不要租給外勞，怕他弄壞」房子。當我深入探索村民寧願空置房屋，也不出租給外勞的真正原因，其實充斥著刻板的印象。丁嫂說「有的人不要租，怕弄到好邋雜(骯髒)」，有些村民不租房子給外勞，是因為怕他們弄骯髒房子。丁嫂舉例說隔壁鄰居也是租房子給外勞，外勞沒有妥善處理廚餘，導致衛生環境不好。志偉說外勞會把房子搞的「很亂」，村民選擇空置房子也不願意出租給外勞。除非村民已經決定搬離新村，不再回到家鄉生活才會出租給外勞。

「因為他們那種人(外勞)住，會搞的很亂...就是說房子又髒...華人能夠忍受得了？如果是很老舊，OK，任他放給他爛，就讓他住。搞不好你不要住，搞不好我要搬出去怎麼樣，就租給外勞。像這一排，好多年這一排...他們是可能不要回家的。」(志偉，26歲)

當拱橋地區(新村、附近住宅區)的華人村民在日常生活上，有意無意排斥外勞時，我發現曾經是隔離空間的拱橋新村，因為社會人口的演變過程而出現排斥性的公共空間。必須注意的是，這種排斥性不同於戒嚴時期的空間隔離，而是一種隱藏於開放空間的排他行為。我會在下一部分依據田野觀察記錄、訪談內容來分析新村的公共空間即是夜市場及籃球場，呈現何種空間排斥性的情況。

一· 拱橋新村公共空間的排斥性表現



圖 4-2 拱橋新村的公共空間

拱橋新村原來是為了隔離與監視的目的而建立，新村缺乏居住功能外的使用空間。新村的公共空間意味著是少數村民可以集體聚會與共同使用的地方，包括籃球場、夜市場、關帝廟(圖 4-2)等。當華村民和外勞身處新村的公共空間時，我卻發現即使沒有實質的隔離裝置，但實際上華人村民和外勞在互動過程中，確實表現出空間排斥性的情況。接下來，我會先描述及分析拱橋新村的夜市場空間，我認為夜市場是新村裡最為開放的空間，因為夜市場並不是實體建築，沒有門戶磚牆的隔離問題。

任何人只要願意就可以進入裡面逛攤子、買東西或是品嚐小吃。我們可以從觀察拱橋夜市場的情況來分析空間排斥性的情況。

(一) 拱橋夜市場



圖 4-3 拱橋新村夜市場



圖 4-4 外勞在衣飾攤前

拱橋新村夜市場(圖 4-3)位於主要大街上，每個星期天傍晚六時左右，夜市

場的小販就開始在擺攤位，攤位種類包括衣服、玩具、銀飾(兼賣包包和指甲油等)、錢包、翻版 VCD、日常雜貨(電池、廚房用具、衣架…)、鞋子、電風扇、各式小吃如：炸雪糕、包子、麵包、珍珠奶茶、馬來辣飯、麵包、炒麵、水果、「碌碌」³⁶等。外勞通常以群體方式出現，或是最少都有兩個人以上在逛夜市，很少看到有外勞獨自一人逛夜市的情況。大多數外勞都是年輕男性，膚色較深，他們通常都穿上 T-恤短褲，或是牛仔褲出現在夜市。他們成群結隊沿著大街開始逛攤子，最受歡迎的攤位是衣服(圖 4-4)，特別是 10 元馬幣³⁷的廉價衣服及褲子、日常雜貨、小的皮包攤、電風扇和水果，反而很少光顧小吃攤。他們喜歡和同伴挑選貨品，也會和小販討價還價。

外勞除了逛攤子外，他們也經常聚集在位於大街尾端的永豐洋貨店，他們會坐在雜貨店門前的長板凳上，或是散落站在黑暗的樹下談天。晚上7時45分，永豐對面的華興雜貨店發售馬幣20仙的「馬票紙」³⁸，除了許多村民來買馬票紙外，也有許多外勞買了馬票紙後，回到永豐那裡研究討論。也有一些外勞到華興洋貨店複印文件，購買零食餅乾和洗衣粉，但他們與洋貨店老闆並無交談。軍隆在新村經營小商店，他說雖然外勞也是消費者，不過他覺得外勞很麻煩，他們來店裡買少少的東西，後面卻跟著一群朋友。在旁的康大姐就說一群外勞進來「還有什麼，博亂」，意即「趁火打劫」或「混水摸魚」。軍隆回答道「咁樣就沒什麼有」。

「外勞對我們來講是有點煩，不是話什麼…因為我們做生意的人來講，他們很煩，來到這裡…我們不是super market，他們這樣滴滴答答，一大堆人來，買個兩仙³⁹野(東西)，一大棚人來…好像印兩張紙，七、八個人跟著進來，他們是

³⁶ 「碌碌」是滾水泵燙的發音。「碌碌」其實就是馬來西亞路邊或夜市的街邊餐車，食材與火鍋料理相似，如：魚丸、蛤蜊、青菜、豆腐等。

³⁷ 約 100 元新台幣

³⁸ 「馬票紙」意即投注博弈的開彩成績，一般必須等到明天早上看報紙才會知道開彩成績。有些店家在第一時間得到成績後，就大量複製成單張賣給客人。

³⁹ 「仙」是馬幣，約新台幣 2 元。



圖 4-5 外勞在樹下談天

這樣。」(軍隆, 40歲)

外勞在拱橋新村的夜市場空間裡，彷彿是隔岸的外來者，與新村商家或是村民甚少互動交談，商家覺得他們只買些小物品，卻是很多人跟著一起進商店，讓他覺得很麻煩，連旁人也覺得外勞會趁機佔便宜。拱橋新村夜市場沒有欄杆和

圍籬，不過外勞在這個開放的空間顯得很拘謹，他們多數聚集在永豐洋貨店前，或是站在光線不足的樹下(圖 4-5)，並未融入現場的環境氛圍。我們也發覺到新村空間雖然沒有明顯圍住籬笆或欄杆，但是小商家或村民卻在有意無意間畫出一道無形的界線分隔自己和外勞社群。

(二) 新村籃球場



圖 4-6 拱橋新村籃球場



圖 4-7 中華小學草場

拱橋新村可以提供村民運動的公共空間並不多，新村的籃球場(圖 4-6)在近兩年重新翻修後，變成有加蓋籃球場及周邊也設置圍籬。村裡許多年輕人都喜歡放學後，或是假日在那裡打籃球。經過田野觀察，我發現村裡只有華裔村民使用

籃球場，即使住在新村裡面的外勞都不會到籃球場打球。受訪外勞表示他們對籃球並沒有興趣，比較喜歡打英式籃球或踢足球。辜瓦(印尼籍)說他「沒有興趣(minat)」因為「那是華人的興趣...不是所有人的興趣」。辜瓦認為籃球是華人喜歡的運動，印尼人比較喜歡足球。肯尼(印尼籍)也說印尼人對籃球運動比較沒有興趣。

亞里(印尼籍)說他覺得在拱橋新村會「尷尬」(segan)，因為他覺得在拱橋新村居住「100%都是華人，在這裡要問東西也很困難」。他說「如果我們和馬來人在一起，就可以走街談天」，亞里認為如果他們是和相同語言及文化的馬來人一起生活，他會覺得比較自在，也可以和同伴逛街或是在新村裡談天。因此亞里從來沒有使用過新村的籃球場，他說「我們在這裡害羞(malu)，有時候我們想要跟著，進去，也覺得不好」。亞里因為害羞不敢使用新村的籃球場，也不會想要和村民一起運動。

印尼外勞皆表示沒有興趣打籃球，但是他們非常喜歡踢足球，亞里說他「喜歡足球」。肯尼提到新村的中華小學有一個草場(圖 4-7)，非常適合用來踢足球，但是亞里和肯尼一致認為「華人不給」，他們覺得村民不會允許他們使用草場。亞莫則表示他常在下午四點以後到「在下面的地方玩...玩英式籃球」，或是和朋友談天，他們習慣稱拱橋新村附近的休閒花園為「下面的地方」。亞里也告訴我，他們覺得休閒公園「華人沒有玩的」，所以「全部印尼人在那裡玩」。

雖然外勞一直表示他們對籃球運動沒有興趣，所以沒有使用新村的籃球場空間。但是仔細研究訪談內容，我發現外勞其實有意避開以華人活動為主的空間，他們在沒有探聽任何村民的意見下，就認定拱橋村民必定不會答應商借中華小學的草場給他們踢足球。相反地，外勞非常喜歡到距離新村比較遠，位於新村邊緣的休閒小公園踢足球、打英式籃球或是聚集談天。儘管那個小公園並不是運動的

最佳場地，不過他們喜歡在那裡活動，原因是比較少或是沒有華人出現在那個地方。由此可發現新村的籃球場空間是屬於華人活動的中心，而邊緣群體的外勞則選擇聚集在距離拱橋新村較遠的休閒公園，因為那是一個相對比較自在的空間。

二·外勞消費與休閒族裔地景的邊界



圖 4-8 外勞住的拱橋新村木板屋



圖 4-9 其中一條通往新村與花園住宅區的路



圖 4-10 閒置店屋成為外勞住所

自從拱橋地區興建工業區及吸引大批外勞後，原來以華人為主要居住人口的社會結構也隨著改變。拱橋新村經歷 60 年的時光後，新村面對人口外流的情況，目前新村大約有 50 多間閒置房屋；多數村民寧願選擇空置房屋，也不願出租給外勞。在訪問及田野調查中，發現新村有三間房屋住了約 40 多位印尼勞工，因為他們的老闆是新村的居民，是三間房屋的主人，

所以他們才可以住在新村裡面。住在新村裡的外勞，一般都是住在情況比較不好的房屋，例如：木板屋(圖 4-8)。同時，拱橋新村附近有許多花園住宅區，我觀察到這些花園住宅區和拱橋新村彼此道路互通(圖 4-9)，來往非常頻密。在這些新式的住宅區，其實住了更多的工廠外勞。

外勞除了住在單層的花園住宅，他們也租用店屋二樓的空間。一般上，從屋子的外觀和擺設，大致可以確定那是否為外勞的住所，如：屋外掛的都是深顏色，看起來比較「破爛」的衣服；房子非常破爛，但門口有許多鞋子及堆了很多雜物。在傍晚時分，我們可以看到外勞在這個區域活動。陶先生是住在拱橋地區的輝煌花園，他說外勞通常住在閒置的店屋(圖 4-10)。拱橋村民馬伯指出「外勞都租店屋，那些落後沒有人租的地方，沒有人要的店屋，沒發展的地方。新村屋是很少租給他們，有些人要回來渡假」。



圖 4-11 外勞夜市場與休閒公園位置圖

我們可以看到昔日是隔離和邊緣的拱橋新村，在其他外勞群體住進來及與村民互動後，拱橋新村的公共空間隱約出現排斥性情況，像是外勞隱藏在拱橋夜市場的幽暗角落。我們看見不管是設置了圍籬的籃球場，或是開放空間的夜市場都是華人的活動地區，而外勞社群是被村民排除或「自我放逐」在這些空間之外。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當弱勢族群面對主流團體(host population)的排斥時，他們會傾向保持團體內部的活動與互動 (Barth 1969)，並且發展成他們活動的中心。我在田野中發現，外勞群體創造了屬於他們自己的活動空間，形成族裔的消費與休閒地景。

我在拱橋地區的寶地花園夜市場，主要商業大街及休閒公園(圖 4-11)，也發現外勞社群創造屬於他們自己的消費與休閒族裔地景，並且成為他們和拱橋村民另一個空間的邊界。接下來，我會利用田野觀察記錄，描述、分析及比較村民和

外勞在拱橋夜市場及寶地花園夜市場中，不同的活動形式和互動關係。同時，我會描述及分析外勞在寶地花園的主要商業大街及休閒公園的活動及空間表現。

(一) 外勞的夜市場



圖 4-12 外勞挑選食材



圖 4-13 女性勞工正在買熟食作晚餐

從觀察發現，外勞通常走路或是騎腳踏車到寶地花園夜市場，一般也是結伴同行，有些同性（男性）外勞會牽手逛街。他們光顧的攤子主要是蔬菜、水果、乾貨（馬鈴薯、洋蔥）（圖 4-12），有些外勞還在肩上扛了一包白米。此外，他們也會到附近的迷你市場或雜貨店買食材（白米、洋蔥）等。比起拱橋夜市，外勞較多光顧這個夜市的小吃攤。在這條大街上，估計至少有五間通訊店及幾間「嘛嘛檔」⁴⁰，外勞喜歡站在商店前面，或是坐在商店屋簷下談天。也有的外勞會坐在嘛嘛檔吃東西喝茶。有的勞工就會購買熟食回家作晚餐（圖 4-13）。

當白天沒有擺設夜市場時，外勞族群在下班後，也會聚集在寶地花園這條大街上談天。這和在拱橋新村是完全不同的情景。在拱橋新村內部，外勞就是「經過」的群體，鮮少會停駐在空間裡進行活動。我們看過兩個不同的夜市場空間，第一是拱橋新村的夜市空間，外勞在那裡的活動就是和同伴逛街，或是坐在永豐洋貨店的門口，或是站在樹下或屋簷的黑暗處談天。外勞在新村的生活圈子，看似和新村商家或前來擺攤的小販有所交集，但實際上除了商品買賣外，雙方並沒

⁴⁰ 嘛嘛檔(mamak)是指印裔回教徒經營的飲食店，食物售價一般比較實惠。

有太多互動的機會。外勞不像本村居民和商家，除了買賣貨品外，還會談天或交換不同的情報。不同的是，在寶地花園的夜市裡，我們可以從整體環境氛圍，發現到外勞在寶地花園夜市顯得比較自在，他們會聚集在比較明亮的地方，言語之間也顯得比較活絡。

兩個性質相似的夜市場，卻出現不同族群的不同使用行為與環境氣氛，就像拱橋村民珍妮告訴我說寶地花園(大路旁)的夜市才是外勞會去的地方。「星期天晚上拱橋有夜市，那去的都是華人。星期一在新拱橋大路旁就有一些印度人和馬來人擺攤，那些外勞就會去那裡」（珍妮，24歲）。另外一個吸引外勞聚集的原因，根據我的觀察可能是寶地花園的夜市場有賣蔬菜、肉類、魚產，外勞在工廠下班後，可以在夜市場購買食材回到宿舍烹調。巴布和沙賓(尼泊爾籍)說他們的宿舍住了尼泊爾勞工，大家都是晚上9時才吃飯。沙賓說「很多人住，就遲吃飯，遲睡覺」。寶地花園夜市場買賣各種食材和營業時間，剛好就能趕上外勞的煮飯和用餐時間，也許就是另一個受外勞歡迎的原因。

(二) 寶地花園商店街



圖 4-14 通訊店



圖 4-15 坐在大路旁的外勞⁴¹

拱橋地區外勞人數眾多，他們鮮少在拱橋新村購買日常生活用品，主要是聚集在寶地花園靠近大馬路的商店街，形成非常熱絡的商業街道。在這條街道上，

⁴¹圖 4-15 為古文聰拍攝

估計至少有 5 間通訊店(圖 4-14)、幾間「嘛嘛檔」、3 間華人餐館、電器店、雜貨店或迷你市場、廉價服飾店等。在上班時間，這裡的環境比較安靜，當工廠下班後或是假日，就會變的非常熱鬧。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外籍勞工成群結隊出來。他們有些會坐在大路旁邊談天(圖 4-15)。有的到迷你市場或雜貨店購買食材，例如：白米、洋蔥。也有許多外勞喜歡站在商店前面，或是站在大街上聚集談天(圖 4-16)。



圖 4-16 在馬路聚集談天的外勞



圖 4-17 Shagorika 雜貨店

拱橋村民軍隆在訪談中透露，寶地花園有一間雜貨店“Perniagaan Shagorika”(圖 4-17)，只在傍晚時才開始營業，偶爾還會閉門做生意。「還有一個很明顯的…現在咁樣，現在這裡很多就是掛羊頭，就是講本地人的 licence，但是外勞做生意，那些其實是外勞賣野(東西)，他們關完門賣，那些外勞放工才開門」。軍隆的意思是說雖然該雜貨店的註冊人是馬來西亞公民，但大家都知道背後真正的經營者是外勞。康大姐說拱橋新村的店家不願意賒賬給外勞，反之她覺得寶地花園有些雜貨店，可以賒帳給外勞，所以他們會選擇到那裡去消費。

Q：本地新村會賒數給外勞嗎？

A：很少，絕對不會。(軍隆，40歲)

A：簡直是不敢賒，那幾角錢嘅野(東西)，邊個(誰)賒，我都不賒，幾角錢的人看不到數。(康大姐)

A：不會，上面的(雜貨店)應該是有，他們那些自己人應該有…。(軍隆，40歲)

印尼外勞亞里說他會在寶地花園購買日常用品，並不是那裡的東西或食物賣的比較便宜，而是因為老闆願意賒帳給他們，「有時候我們可以賒帳…我們可以賒帳，一個月還一次」。巴布則是指出當他下班後，拱橋新村許多商店都打烊了，他的工廠就在寶地花園對面的馬路，那裡的商店比較晚關門，他比較方便買日常用品，「沒有時間，你看，我們早上出來，晚上回去，這裡(寶地)的店比較方便(senang)，拱橋的關門了」。離開在外工作的外勞對電話卡有很高的需求量，受訪的外勞告訴我他們花費相當多的金錢購買電話卡，以便聯絡家人。雖然拱橋新村沒有通訊店，但是洋貨店或是雜貨店也有販賣電話卡，不過外勞通常選擇在寶地花園買電話卡。沙賓說他每月花費 100 元馬幣購買電話增值卡，因為他很想念家人，他還補充說現在電話費變得比較便宜。亞里則是 CELCOM 的通訊用戶，他一般都是在寶地花園的電話店買增值卡，偶爾才會光顧新村的商店。

(三) 休閒公園



圖 4-18 平常公園一景



圖 4-19 外勞在公園談天

最靠近拱橋新村的寶地花園有一個小公園(圖 4-18)，住在新村的外勞反而繞過拱橋新村，選擇在這個公園活動。他們會在這裡踢足球或是玩英式籃球(bola jaring)，有的則是和同伴在樹下的椅子或是溝渠旁談天(圖 4-19)。同時，我觀察

到當外勞在這個公園活動時，周邊居民反而在自己住家前談天，並沒有和外勞一同使用休閒公園。雖然外勞沒有參與新村籃球場的運動，卻在新村邊緣打造一個屬於他們的運動場地。布迪說印尼人、尼泊爾人、孟加拉人都會到休閒公園玩耍。



圖 4-20 外勞正在玩英式籃球

Q：有什麼人會到下面的公園去？

A：印尼人、尼泊爾人也有，孟加拉人都有。(布迪，20 歲，印尼)

在田野觀察中，我看到外勞會

聚集在休閒公園踢足球、舉行英式籃球比賽(圖 4-20)，或是三三兩兩

坐在大樹下談天，氣氛非常熱絡。亞莫說他每天放工後，「每天下午 4 時，放工後，4 時或 5 時，英式籃球。我也喜歡到公園踢足球或是和朋友聊天」。亞里說「全部印尼人都會到那裡(休閒公園)去玩」。寶地花園的休閒公園位於拱橋新村與新興住宅區的中間地區，不同國籍的勞工在下班後或假日時，在這個小公園運動、聚會或是談天，反而在周圍的拱橋村民或是住宅區的華人居民，在公園外邊的場地活動。

當華人有意無意間排斥外勞進入拱橋新村的公共空間時，東南亞外勞也在流動的社會關係與空間中，找到自己相對位置。他們在新的花園住宅區消費電話卡、夜市場閒逛、在可以賒帳的雜貨店購買食品及日用品、在小小的休閒公園玩英式籃球、踢足球、聚會談天，形成一個消費及休閒的族裔地景。同時，新地景也表現空間排斥與階級流動的關係。即使外勞創造一個內部活動空間，不過這個空間也在不自覺中接排斥華人村民，及外勞社群內部更為弱勢的人。例如：印尼外勞排斥不諳馬來文的尼泊爾或是緬甸外勞，鮮少在空間中加入他們一起活動。

第四節 實踐跨文化空間的可能性

Barth(1969)在其主編的《族群與邊界》導論中表示，人們過去對族群的定義是「種族(race)/文化/語言與社會/被拒絕或是歧視的群體」。他認為這種假設只能指出邊界的維持，無法解釋邊界裡出現不同族群、文化、語言、社會隔離的現象。Barth 指出當不同族群身處在同一空間時，如果他們彼此缺乏認識，持有不同的價值標準，並且日常很少交集互動時，就會把對方二分(dichotomization)為陌生人或是他族成員。然而就像 Sanderlock (2003)在「混雜的城市」(Mongrel Cities)中提到，現今人們已經生活在一個集結著文化與經濟的全球城市，不再由單一族群或是城市控制。他認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並且重構城市和區域。

Welsch(1999)認為現今的文化形式已經超越傳統的單一文化論或是多元文化論，不再有絕對二分的本地／外來文化，而是走向混種複雜的跨文化(Transculturality)情境。人們的生活形式不再局限於疆界，而是跨越疆界並互相關連。在全球勞工不停流動的今天，拱橋新村出現除了原來占多數的華人村民、馬來人與印度人外，還有大量的外勞人口。華人與外勞在日常生活中各據不同的活動空間，並且出現排斥其他族群共用空間的情況。然而，當不同族群和文化共處同一個社會時，還是有實踐跨文化空間的可能性。我在田野中發現拱橋新村的關帝廟在特定的節慶氣氛下，確實出現跨文化空間的情況。我將在下一部分簡介關帝廟及它的重要性，並且分析跨文化空間現象。

一· 拱橋新村關帝廟

拱橋關帝廟及多元禮堂是新村裡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及活動空間。在剛剛建立拱橋新村時，幾位熱心村民合力建設簡陋的「關帝聖神位」供大家膜拜。直到70年代，全體村民自發籌款興建新的關帝廟及多元禮堂。關帝廟除了是信仰的空間外，多元禮堂也是村裡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間，村民會在這裡舉行各項公共活

動，例如：慶祝中秋節暨遊行活動(圖 4-21)、中元節祭祀慶典或是共同聚餐(圖 4-22)，也有村民租用禮堂作婚禮宴客之用。



圖 4-21 關帝廟舉行中秋節舞獅儀式



圖 4-22 多元禮堂共同聚餐活動

每年農曆七月，關帝廟委員會都會募款來舉行傳統戲劇、歌舞表演及卡拉 OK 等酬神節目。農曆七月是素來平靜的新村最為熱鬧的月份，在國家經濟表現亮眼時，新村甚至會連續舉行一個月的酬神節目。十幾年前，演大戲是很重要的活動，在關帝廟門口的街上會擺上小吃攤，如：清補涼⁴²、碌碌，大人會帶小孩來掃街⁴³。華嫂說「現在村子里有很多小吃攤，不用出來找吃，所以做大戲時越來越少攤位」。唐叔也說「那時候好多東西吃，那時候很熱鬧，好多人，那些小孩子就出來看戲，阿爸阿媽帶出來看」。近年來經濟不景氣，才改為舉行 15 至 20 天的慶祝活動。

二·關帝廟的空間活動

(一) 傳統潮州及粵劇、文藝表演

2010 年 7 月 27 月至 8 月 17 日是拱橋關帝廟慶祝關帝聖君寶誕。多元禮堂除了在 8 月 13 日至 17 日舉行文藝匯演、歌舞團表演及卡拉 OK 比賽外，其他時間皆演出潮州劇和粵劇。根據田野觀察，關帝廟禮堂在前面 17 天演出潮州和粵劇時段，並沒有吸引很多觀眾，通常都是一些婦人帶著小孩，或是父母攜帶孩子

⁴² 傳統甜湯

⁴³ 逛街

來看戲(圖 4-23)。也有一些村民騎著機車來到關帝廟戲台前面，索性坐在機車上



圖 4-23 傳統戲劇較不能吸引村民



圖 4-24 拱橋中華小學文藝匯演吸引眾多村民

看戲。同時，也零落有些村民到戲台對面的廟裡拜神。除了少數新村居民外，並沒有看見外勞的蹤影。傳統的潮州劇和粵劇並不是現代流行的娛樂活動，許多人都表示看不明白傳統戲劇的內容。傳統粵劇或潮州劇不能吸引村民或外勞參與活動，反而最後幾天的文藝匯演及歌舞團表演，明顯吸引許多村民踴躍出席。尤其是 8 月 13 日的拱橋中華小學文藝匯演，吸引各個年齡層的民眾前來幫小朋友打氣，是整個月份裡最為熱鬧一天(圖 4-24)。

(二) 跨文化的流行歌舞表演

8 月 15 日是歌舞樂團表演，這場流行歌舞本身就是一場精彩的跨文化表演方式。首先掀開活動序幕的是幾名女舞蹈員，他們身穿傳統文化喜愛的紅色服裝，服裝是性感的設計款式。接下來，舞蹈員與女歌手開始載歌載舞，女歌手開場時就祈求關帝聖君保佑大家「闔家平安、生意興隆」，跟著就用潮州話唱改編的歌曲歌頌關帝聖君。慶祝關帝寶誕原來是華人的傳統信仰，隨著流行歌舞表演納入酬神節目後，樂團也順應傳統的文化習俗與在地的語言，融入潮州話及吉祥的祝福語，來呈現開場的表演活動。表演團隊也設有現場點唱環節，觀眾通常點唱老歌，而且也獲得比較多的掌聲，顯示現場是中年以上的觀眾占多數。



圖 4-25 關帝廟空間示意圖



圖 4-26 外勞在欄杆外撐雨傘看表演



圖 4-27 外勞坐在禮堂邊緣的椅子

流行的歌舞表演活動，包括舞蹈員穿著清涼，又跳又唱，除了吸引華人村民出席外，外勞也開始出現在這個活動空間。根據當晚的田野觀察，我製成一張簡單的關帝廟空間示意圖(圖 4-25)，讓讀者可以看出當晚歌舞表演時，華人村民和外勞在關帝廟的空間位置。當天晚上 8 時 40 分，我陸續看見外勞的蹤影出現在關帝廟附近。包括有兩名外勞站在關帝廟門外觀看舞女歌手在台上表演。後來也看到兩位外勞坐在邊緣的觀眾席上，有兩名男女外勞則是撐著雨傘站在旁邊看表演。過了不久，約有六、七名外勞(只有一名女性)站在觀眾席後面，有一名更是拿著手機錄影舞台上的表演。漸漸地又加入數名外勞站在後面。另外，還有幾名外勞則是撐著雨傘站在多元禮堂的欄杆外觀看台上的演出(圖 4-26)。雖然禮堂內還有許多椅子，但外勞並沒有坐前去，有的外勞則坐在禮堂邊緣的椅子(圖 4-27)。

亞莫受訪時表示，他已經在拱橋新村住了 2 年，他每年都會去看表演，即使

他聽不懂中文歌曲，但是他覺得很 seronok(開心)。肯尼和亞里也是住在新村裡面，肯尼說那是華人的活動。肯尼和亞里會到關帝廟看跳舞或是卡拉 OK，但他們不會進去禮堂裡面坐下，亞里說「在外面看...我在外面」，外勞一般只會站在外面的地方觀看表演。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跨文化空間形式。關帝廟及多元文化禮堂是拱橋新村一個很重要的公共空間，提供村民膜拜及舉行各種活動的地方。雖然村民和外勞群體各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包括信奉伊斯蘭教的印尼勞工，他們卻在新村慶祝關帝廟寶誕活動上尋找到一個可以共同參與的活動；即是拱橋村民和外勞在關帝廟多元禮堂的內外，一起欣賞**流行的歌舞表演**。雖然外勞選擇站在禮堂欄杆外，或是坐在禮堂內的邊緣椅子方式來「參與」活動，但是我們看到新村的居民並沒有排斥外勞出現這個節慶空間裡。另外我在拱橋新村舉行中秋節提燈遊行活動時，也觀察到一些外勞跟在遊行隊伍的後端，但一般都是走一小段路就會離開隊伍⁴⁴。由於蒐集的資料不多，故不在此多述。從關帝廟及中秋節的活動觀察，我認為拱橋新村面對國家邊緣化，新村資源及空間有限的情況下，不自覺中在公共空間排斥其他族群，但是當有重要的節慶活動發生時，人們在歡樂愉快的情緒當兒，是願意打開空間邊界，與其他人分享他們的文化活動及空間。

(三) 同時並存的多元文化與空間形式

拱橋新村在 1980 年代開始擴大成一個地區，包括工業區、新興的住宅區、商業街等。華人村民對前來拱橋工業區打工的東南亞勞工抱持負面的看法，他們歸咎外勞是造成治安日益敗壞的原因。雖然華人村民和外勞身處在同一地區，不過他們日常生活甚少互動交流，村民覺得外勞闖入他們的空間，造成大家不安和擔心。拱橋新村昔日是一個國家監控、隔離與邊緣化的地方，當新村地區出現外勞社群，新村的公共空間(夜市場、籃球場)反而成為地區有排斥性的地方，村民及外勞在不知不覺中，畫出一條「這是華人地方」的分界線。外勞一般只是路過新村，回到宿舍或是到工業區上班；住在新村裡的外勞，也不會使用新村籃球場

⁴⁴ 田野觀察及訪談紀錄 (20100918)

來運動，或是純粹在街上聚會談天，反而會繞到離新村較遠的寶地花園商業街或是休閒公園聚會和運動。

在這個不同族群聚集生活的拱橋地區裡，每個族群都有各自的文化背景。我們看到村民和外勞因為刻板印象或是偏見，而各自在不同的空間活動。他們活動的公共空間也具有排斥性現象，例如：村民在拱橋新村夜市場或籃球場、外勞活躍在寶地花園地區。同時，我也認為這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空間，包含華人及外勞等各種文化活動，只是雙方的互動機會不多。然而，在慶祝傳統節日及流行文化的歌舞表演活動時，在社會關係中比較有優勢的村民是願意打開空間邊界，與外勞社群共享活動及空間，就像是拱橋關帝廟的歌舞表演所形成的跨文化空間。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單一文化、多元文化或跨文化是同時存在於拱橋地區，關帝廟的跨文化情況並不是一個演進的結果，而只是其中一個文化情況。我們發現在節慶期間，拱橋新村的跨文化空間情況會變的比較明顯，平常則是不同族群處於各自活動空間，偶爾有所交集。

小結：下層的階級與空間流動

馬來西亞政府從 1991 年開始，宣佈施行國家發展政策及國家宏願政策，用以取代以政府干預及族群再分配為核心理念的新經濟政策。雖然政府有意提升全國的經濟發展，不再以族群經濟平等作為主要追求目標，但是強調按照族群來分配財富及馬來人優先的基本想法，依然隱藏在上述的兩項政策之中。然而，我們再次發現國家政策其實只是服務了不分族群的上層階級，而不是圖利下層階級的馬來人。例如，政府宣佈減少直接經濟干預，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其實是扶持中產階級的馬來企業家。同時期，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與馬來西亞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從馬來西亞在中國投資的情況來看，華商佔據很重要的地位。戈梅斯及甄義華 (2006) 報告指出，馬來西亞華人投資者鍾廷森的金獅集團 (Lion

Corporation)早在 1992 年開始投資中國，涉及釀酒業、摩托及輪胎製造業、食品及百勝商場。還有郭令燦的豐隆集團(Hong Leong Group)；楊忠禮(YTL)公司等。同時，中國也是馬來西亞重要的出口國之一，兩國簽署多項商貿合作協定。

我們看到中國經濟崛起影響馬來西亞與中國的建交關係，兩國政治領導層都曾經相互拜訪對方。華文崛起成為重要國際語言，馬來西亞政府也因應全球化貿易而加入「中國熱」潮流。2009 年，現任首相納吉為了配合馬中建交 35 週年，率領政府高官訪問中國，隨團的除了各個行政部長外，還有重要的華團代表，例如：華總會長兼彭亨州華團聯合會會長方天興。方天興是馬來西亞五金機械建材總商會執行顧問，也是華裔富商與國內有名的「鋼鐵大王」。他受訪時就表示隨首相官訪中國的大馬企業家，可以趁機會與中國商家保持更密切的經貿合作(何月雲 2009)。此外，現任首相納吉的小兒子諾阿斯曼(中文名季平)，在美國唸書時學習三年的中文，納吉過後更是送兒子到北京外國語大學修讀華語課程(星洲日報 2010/7/2)。隨著馬來西亞與中國展開密切的經濟與文化交流，外界輿論傾向認為華人族群的社會地位普遍獲得提高。

上述種種看似因為中國崛起而有利華人族群的新聞，其實都是官方、華人企業家與中國方面的交流，並沒有惠及底層的華人。鄭達(2008)指出馬來西亞政府積極鼓勵華商到中國投資，參與馬中經貿合作，是積極推動國內華人與馬來人經濟合作。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華商發揮經營經驗和經貿網路優勢，協助馬來人企業家跨出國門，到中國發展業務。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對中國投資的馬來西亞華人企業中，馬來人佔有不少股份，例如陳志遠的成功集團(Berjaya Group)，馬來人就佔有 40%股份。對華商而言，與馬來人保持經濟合作不但可以拓寬華人企業的集資管道，還能享受政府的優惠政策，增強企業實力。林勇(2008.1)指出無論是新經濟政策、國家發展政策或是國家宏願政策，所謂的「公平」只是族群之間的「公平」，而不是個人或是階級之間的公平。這些政策在致力改善族群之間的

經濟差距時，完全忽略城鄉、地區、族群內部及階級之間的差異，導致進一步擴大社會整體收入的差距。正是這些差距造成並加劇馬來西亞整體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他精闢分析道威脅馬來西亞政治穩定的不是族群矛盾(特別是華人与馬來人)，實際上是階級矛盾。

馬來西亞政府、上層階級的馬來人、華人和中國政府及民間展開頻密的經濟商貿關係，不但無法惠及低層華人，有時候甚至連政府內部也有排斥華語(人)現象。就在今年(2011)4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官訪馬來西亞，在歡迎儀式的佈景板，竟然出現文句不通的中文歡迎詞。馬來文歡迎詞寫著“*Istiadat Sambutan Rasmi Sempena Lawatan Rasmi TYT Wen Jiabao ke Malaysia*”，譯成中文應該是「溫家寶閣下訪馬正式歡迎儀式」。豈料佈景板寫的是「正式歡迎儀式，與他一起溫家寶閣下的正式訪問馬來西亞」，文句極為不通(陳慧思 2011)。擔任溫家寶侍從部長的首相署部長許子根當時在場也表錯愕，事後發現是負責單位使用谷歌(Google)翻譯馬來文至中文並製作成佈景板。從這件事上可以察覺到，即使馬來西亞與中國有密切的往來，但並沒有提高政府內部華人官員受重視的程度，因為馬來官員寧願草率使用谷歌來翻譯中文，也不尋求認識中文的同僚來幫忙。我認為另一個原因是國家行政單位內部，可能因為固打制原因而缺乏華人官員。

我們看到政府從 1991 年後，開始改變國家政策論述，強調全國整體的經濟發展。然而，從各種研究報告及數據指出，這些政策隱藏著族群內部不平等的階級關係，財富分配也只是集中在富有階級手上。就像馬來西亞的華人新村，從國家獨立至 2020 年國家宏願計劃中，新村及以華人為主的村民也一直處於發展的邊緣地帶。踏入 2000 年，華人新村仍然面對缺乏完善之基本設施、土地及地契問題、失業和教育水準低落(與城市比較)等問題。在第 8 大馬計劃下(2001-2004)，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給予全國 450 個新村，共 2 億 6816 萬令吉撥款。每個新村平均只得 59 萬 5911 令吉撥款，只占第 8 大馬計劃裡房地部總撥款的 3.1% 而已(總

撥款達 86 億 7700 萬)。⁴⁵

2003 年，當時的馬華總會長兼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長黃家定說服中央政府撥款 150 萬令吉展開全國新村調查，制訂「新村大藍圖」發展計劃。該項計劃是協助房地部將新村的環境、社會與經濟納入國家主流，以 2020 年先進國宏願為設想藍圖，提出一套方針與策略，以促進新村現代化，使村民成為可持續發展且高生產力的群體(林廷輝，方天養 2005)。黃家定受訪時表示「新村大藍圖」之下，全國華人新村將分為先進、發展中和落後三個等級，政府將據此為新村制定長期的發展策略(潘磊 2004)。雖然黃家定對外聲稱「新村大藍圖」將幫助華人新村納入第 9 大馬計劃內，為新村帶來全面性發展，然而事實背道而馳。因為第 9 大馬計劃下，政府也只是每年撥款逾 5500 萬令吉發展華人新村(5 年共 2 億 7500 萬)，比起第 8 大馬計劃新村得到總額的 2% 還要少。從撥款的數據可以看出，華人新村仍然處於國家社會的邊緣，新村人口和實際所得的財政分配並不成正比

馬來西亞政府利用族群政治掩飾背後官商結合及金錢利益的真相，不管馬來西亞與中國外交關係密切，或是製訂新的國家發展政策，其實只是圖利不分族群的上層階級，底層的華人新村、馬來人或是印度社群，並沒有從國家經濟發展中受惠。另一方面，我們在本章看到拱橋新村因應人口增加及工業化而出現多元族群，華人村民看似在這個社會變遷過程中，成為拱橋地區的「上層」階級，而新村公共空間也出現排斥外勞現象，不過我們必須醒覺到「華人村民」與「外勞(內部再分不同階級)」在社會關係與空間裡出現中心與邊緣流動的情況，只是位於下層階級的關係與空間變化而已。實際上，馬來西亞上層階級包括政治人物和資本家，依然牢牢控制國家的各種資源。就如林勇所說政府有意擴大族群差距，目的在於利用族群問題掩蓋階級矛盾，轉移鬥爭的焦點，以服務上層階級。

⁴⁵ 引用自〈國內主要華團對第 9 大馬計劃的建議〉，主要華團成員是指董總、教總、華總、七大鄉團協調委員會、校友聯總、留台聯總及南大校友會。

第五章 結論

馬來西亞華人新村是在一個特殊的時空條件下成形，當中牽涉不同層級的族群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空間中的互動關係。本研究聚焦在族裔地景如何呈現這個互動過程中，不同族裔面對的空間隔離與排斥、階級流動的動態情況。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我涉入研究田野以觀察紀錄、深入訪談來發現、發掘及發展新村的社會與空間議題；作為一名在新村生活 18 年的華人居民，我時刻提醒自己研究者掌控自身情緒的重要性，在雙重身份交會下描繪一個「空間」與「社會」、「中心」與「邊緣」相互形構的華人新村動態故事。

一．「空間與社會」「中心與邊緣」的流動過程

馬來西亞華人族群是來自中國的移民，早期並無政治身份。當馬來亞面對共產黨威脅時，英政府利用國家機器的軍警人員，強迫華人移民搬遷到一個具有隔離與監視功能的集中營生活。本研究田野拱橋新村也是在這個背景下建立。當時的華人族群內部包含不同階層的人民，例如有錢的橡膠園主；擁有土地的耕農；或是無產的勞工、菜園工人、礦工等等。在這個充滿權力壓迫的隔離空間，英政府、馬來亞共產黨和華人村民互相交織成一幅「由上而下」控制，「下層反抗」的動態圖像。雖然在國家獨立後，華人紛紛申請公民權，但是政府並不信任華人族群對國家的忠誠。第二次戒嚴行動後，政府拆除鐵線網、柱頭等，但在社會排除的情況下，華人新村並沒有獲得政府關注，新村仍然是缺乏土地和其他資源。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空間的主動性作用。華人村民搬離原來居住地及農地，在新環境又面對缺乏土地的問題，以致造成更低的社會地位。

1969 年 513 事件後，國陣政府實行新經濟政策，主要目的是扶助馬來族群，縮小族群之間的經濟差距。這項政策對馬來西亞社會影響深遠，邊緣化非馬來人在經濟、土地、教育的權利及參與公共行政的機會等。大約 70 年代末，有些拱

橋村民積極尋找出路，利用「跳飛機」方式到西方先進國家，以逾期逗留的工作方式賺取外匯。從國外成功回鄉的村民，家中經濟情況明顯改善；有些村民購買房子，或是買店鋪經商，從無產的村民晉升至「有產階級」。有的村民儲蓄金錢作小孩的教育費，通過教育途徑提升社會地位。這時期，拱橋新村內外部空間也相繼出現變化。新村內部的改變包括木房屋修繕成新式洋房、興建廟宇和牌樓等；新村外部的空間則是隨著拱橋新村人口及居住密度增長，附近地區開始發展新式花園住宅區，許多在國外或城市工作的村民成為具有購買力的群體。

80 年代，馬來西亞政策朝向工業化發展，霹靂州也開始興建工業區。霹靂州政府徵收拱橋新村對面「山邊」的土地，開發成「拱橋工業區」及引進東南亞外勞。拱橋新村也逐漸擴張空間領域，成為「拱橋地區」(包括拱橋新村、工業區、商店區、新花園住宅)。隨之社會人口結構也變得更加複雜，從原來以華人居民、少數馬來人、印度人為主的新村，慢慢發展成匯集不同東南亞國家，例如泰國、印尼、尼泊爾的外勞，形成多元族群和文化的地區。在這個社會與空間互動及演變的過程中，原來在社會較弱勢的華裔工人、無地農民，在面對東南亞外勞時，他們成為具有政治身份、優越中華文化的族群。村民與外勞在日常生活上鮮少交集，拱橋新村的公共空間也因為村民和外勞對彼此的刻板印象，而新村的公共空間應因社會變化也出現排斥性的現象。例如新村的夜市場及籃球場，成為華人活動的中心，外勞無法進入與村民有互動。

另一方面，外勞住在情況較不好的村屋、新住宅區的房子或是乏人問津的商業店屋。他們繞過拱橋新村的公共空間，活躍在新村邊緣的寶地花園商業街道、夜市場及休閒公園，形成消費與休閒的族裔地景。外勞在寶地花園的商業街消費日常用品、食品和電話卡，甚至有小道消息說那裡有間雜貨店背後經營者是外勞。外勞在拱橋新村排斥性空間的邊緣外，因為人群聚集及消費能力，反而激發另一

個新的活動地區，塑造連華人村民也覺得那是「外勞」活動的地方。在外勞社群中，印尼外勞一般從事建築工人，經濟能力比其他外勞較好，加上他們懂得說馬來話，因此成為外勞社群裡的上層階級。最讓我印象深刻感受到「階級流動」關係的是印尼外勞告訴我「尼泊爾和緬甸的工人都是 bodoh (愚蠢)，因為他們不會講馬來話」。這位受訪者說在休閒公園裡，印尼外勞一般不會和緬甸或尼泊爾外勞一起運動。原來低層外勞群體在創造他們中心的同時，也在邊緣更為弱勢(如語言能力)的外籍勞工。

本研究目的是希望打破華人及華人新村是一個社會弱勢及邊緣化的刻板印象，透過田野資料描述一個社會與空間、中心與邊緣的新村動態故事。從研究田野——拱橋新村——發現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與空間是相互影響，拱橋新村主要的居民是華人，這個族裔地景呈現階級流動及空間隔離及排斥的現象。雖然在國家政策的排除情況下，下層華人村民失去土地、教育權利或是公部門工作機會，但是他們透過自身的能動性尋出路，利用跳飛機方式晉升「有產階級」。當霹靂州推行工業化及引進外勞群體後，拱橋新村的華人族群及公共空間成為地區的中心，他們排斥外勞參與新村的活動或是使用新村公共空間，例如籃球場。

另一方面，外勞社群也創造自己的消費和休閒地景，內部同時也出現印尼外勞排斥其他國籍勞工的情況。我們也發現拱橋地區的多元族群雖然各據自己的活動空間，但是當新村舉行某些節慶活動，尤其是流行文化表演時，村民和外勞是有機會實踐跨文化的空間形式。不過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拱橋地區的跨文化情況，並不是一個歷史演進的結果，只是位於某個時間點上發生的事件。「邊緣」和「中心」是一個相互形成的辯證關係，它們只有在各自相互的關係中才能被界定。當華人族群面對國家扶助馬來人政策、華人面對外勞，或是外勞與外勞之間，我們看到每個組別表現出社會與空間的中心和邊緣關係。然而，從研究個案也發現「中

心與邊緣」只是表現在下層階級的社會關係與空間流動。即使華人和新村在對照外勞時成為「中心」，或是中國經濟崛起後華文及華裔商家獲得政府重視，但是國家親中及發佈不同的政策內容，依然沒有改善低層華人村民的地位，而華人新村依然面對不公平的撥款與邊緣發展的窘境。

二·村民與研究者的再反省

我採用田野觀察、深入訪談、文獻資料的研究方法，描繪跨越六十幾年的新村故事。熊秉純(1996)指出質性研究也可以寫出從純方法角度看來很精緻的作品，她認為如果研究者沒有批判的學術立場和視角，依舊可能漠視階級剝削、倚強凌弱等現象。知識的內涵(什麼是知識)、知識建構的過程(如何生產知識)與知識建構的參與者(知識生產的主體如何影響到知識生產的結果和效果)，是研究過程中必須時時察覺到的關鍵問題，當中研究者的「自我反省」成為(質性)學術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構成。就如中心和邊緣不是二元論，研究者與受訪者也不是分開在二元框架之下，受訪村民與研究者的反身性思考也是相互影響。在田野及撰寫論文過程中，我發現受訪者具備反省能力，他們感動了我，也影響我的研究工作。雖然許多受訪者在談話中，表示不滿意國陣政府實行偏袒馬來族群的政策，但有些受訪者還是察覺到政府照顧的只是部分的馬來人，而且是有錢的馬來人。家亨說華人應該批評的是偏袒馬來人上層階級的國陣政府，而不是批評所有的馬來人。因為有些馬來人依然過著很貧窮的生活；他舉例說也有華人政黨成員從政府那裡撈取好處。

「第一，你不公平，你過分開照顧馬來人，你照顧馬來人你照顧不晒(完)，你只會照顧那些有錢的馬來人，好像你是親戚，巫統的親戚，你可以標到我的工做…其實馬來人是沒什麼，有時候我們是針對(政府)…政府都已經聚晒(偏袒)一邊，但是都是不關那些馬來人事，窮那些馬來人真是窮…好像這些(政黨)唐

人，這些會窮咩？」(家亨，40歲)

當多數村民認為外勞是造成治安不靖的原因時，仍然有少數村民挺身為外勞辯護，康大姐就說「我們馬來西亞人做(罪案)，那裡關外勞事，外勞都不知多慘，他們也被人家打劫」。雖然村民在不自覺時仍會以「我／們」對照「他者」，例如：印度人比外勞壞，不過我認為村民身上潛在反思是非常重要的事。我在華人新村長大，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可以有機會重新認識從小長大的生活環境，也讓我反思在過往，甚至直到現在的生活經驗中，經常會不自覺陷入二元分立、刻板印象的迷思中。本研究時刻提醒我同理心與反省的重要性，也警惕自己切莫把生活經驗中的不幸，凌駕至其他更為弱勢群體身上。本研究整體的意義在於指出，社會與空間的相互關係中，中心和邊緣不是必然存在，在馬來西亞處於政治及經濟弱勢的部分華人族群，應該聯合其他弱勢者共同改變整體環境，而不是在剩餘的資源中互相爭奪與猜疑。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做到誠如家亨所說「這個社會真係要變，政治要公平，不得就換人」！

三·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處理「社會與空間」裡流動的「中心與邊緣」關係時，透過分析國家政策來了解社會排除、階級流動與空間的隔離及排斥現象。本論文提到馬來西亞政府利用族群之間的經濟差距，實際上在於掩飾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矛盾的利益衝突。我認為拱橋新村從原來的隔離及監視空間，一直演變至今新村公共空間排斥外勞的現象，只是下層社會關係與空間的流動。然而，本論文限制在於缺乏分析有關中產階級的資料及田野觀察紀錄。除了政商階層的華人及沒有房地產的村民外，中產階級的華人又是何種生活境況？我並沒有深入探討下層階級的華人村民透過跳飛機等方式，成為小生意人或是擁有房產之後的社會關係進展。

如上所述，本研究缺乏中產階級的論述和資料分析。我建議後續研究可以關注華人族群裡的中產階級。隨著近年來中國崛起，馬來西亞華人因為多年來堅持捍衛邊緣化的母語教育，反而身處比國內其他族群更優勢的位置。許多獨中畢業生包括華人新村居民，在馬來西亞完成高中教育後，選擇到台灣或中國升學，特別是近幾年來中國留學生人數大幅上升。有部分人在大學畢業後留在當地工作，或是持中國學歷到其他先進城市工作，比馬來及印度族群更有機會接觸全球發展中重要節點的中國與台灣城市。舉例說明，我有兩位在中國大學畢業的朋友，一位在中國商界位居管理階層；另一位到新加坡成為高中老師，他們掌握華文的能力讓他們在全球化發展中取得先機。馬來西亞華人外流他國的現象非常明顯，而新世代的出國的華人村民，明顯和70年代末跳飛機謀出路的村民是不同的群體。因此，後續研究可以蒐集國內及國外的華人族群中產階級的資料，了解他們與馬來西亞國家社會與空間的互動關係，以期有更全面的研究成果。



參考書目

- Barth, F.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inc.
- Certeau, M. d.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n, K. B. (2005). Migration, ethnic relations and Chinese business. New York, Routledge.
- Hanif, M. A. M. (2006). The Malayan emergency revisited 1948-1960 : a pictorial history. Kuala Lumpur AMR Holdings Sdn Bhd, Yayasan Pelajaran Islam.
- Lee, C. K. (2007). Against the law :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e, K. H. and C.-B. Tan (2000).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h, F. K. W. (羅國華) (2000). Chinese New Villages: Ethnic Ident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K. H. Lee and C.-B. T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55-275.
- Ngin, C.-S. (1985). Reproductive Decisions and Contraceptive Use in a Chinese New Village in Malaysia (Culture, Women, Children, Pregnancy, Breastfeeding).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PHD
- Nyce, R. (1973), Chinese new villages in Malaya: a community study.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 Perry, E. J. (2002).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 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 Sandercock, L. and P. Lyssiotis (2003). Cosmopolis II : mongrel cities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ontinuum.
- Schmidt, M. (1998). An integrated systemic approach to marginal regions: from definition to development policies. Perceptions of marginality : theoretical issues and regional perceptions of marginality in geographical space. H. Jussila, W. Leimgruber and R. Majoral i Moliné. Brookfield, Vt., Ashgate.
- Seidman, I. (2006). Interviewing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 a guide for researchers in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Sommers, L. M. (1999). Towards typologies of socio-economic marginality: North/ South comparison. Marginality in space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spects of cult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parameters of marginal and critical regions. H. Jussila, R. Majoral i Moliné and C. C. Mutambirwa. Brookfield, Vt., Ashgate.

Taket, A. R. (2009). Theorising social exclusion. New York, Routledge.

Voon, P. K. (文平強) (2002). "Spatial division and ethnic exclusion: a study of ethnic relations in Malaysia."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5: 81-105.

Wang, L. H. (1988). "New villages growing old in Malaysia." Habitat International 12(2): 35-42.

Welsch, W. (1999). "Transculturality - the Puzzling Form of Cultures Today." Spaces of Culture: 194-213.

Castells, M. 網絡社會之崛起 (夏鑄九、王志弘等譯, 2000)。台北市：唐山。

King, A. D. 王志弘譯(1995)。建築物與社會。空間與社會理論譯文選。台北：譯者自刊

Harvey, D (1993) 時空之間：關於地理學想像 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夏鑄九、王志弘編譯)。台北：明文

Massey, D (1994) 政治與空間/時間 (王志弘等譯)。空間與社會理論譯文選。台北：譯者自刊

Stalker, P. 蔡繼光譯 (2002) 國際遷徙與移民 解讀「離國出走」。臺北：書林。

Weisman, L. K. 設計的歧視 「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王志弘等譯, 1997)。臺北市：巨流。

文平強 (2009) 拓荒者、企業家和苦力：建構國家的社會與經濟基礎。馬來西亞華人與國族建構 從獨立前到獨立後五十年 上冊。文平強。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

戈梅斯、甄義華 (2006) 馬來西亞企業在中國的跨國活動、商業網絡和企業發展(下)。南洋資料譯叢 2006(1): 17-25。

王志弘 (1998) 流動、空間與社會 1991-1997論文選。臺北市：田園城市文化。

王志弘 (2006/03) 移置認同與空間政治：桃園火車站週邊消費族裔地景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61: 149-203。

王志弘、沈孟穎、林純秀 (2009) 族裔公共空間的劃界政治：台北都會區外圍東南亞消費地景分析。台灣東南亞學刊 6(1)：3-48。

王志弘、沈孟穎、林純秀 (2009年3月) 疆域化、縫隙介面與跨國空間：台北市安康市場「越南街」族裔化地方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3期：122-123。

王賡武 (1988) 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香港：中華書局。

何國忠 (2002) 馬來西亞華人 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

何國忠 (2007) 全球化話語下的馬來西亞華人與中國。全球化話語下的中國及馬來西亞。何國忠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

吳比娜 (2003) ChungShan：台北市菲律賓外籍勞工社群空間的形成。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劍雄 (1993) 海外移民與華人社會。臺北縣三重市：黎銘總經銷。

李小江等 (1999) 主流與邊緣。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周聿峨、胡春艷 (2010) 中馬建交以來馬來西亞對中國的認知之轉變。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32(4)。

周宗仁 (1997) 馬來西亞華人地位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林廷輝、宋婉瑩 (2002) 馬來西亞華人新村50年。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

林廷輝、宋婉瑩 (2004) 馬來西亞新村人口：變遷與問題。馬來西亞華人人人口趨勢與議題。文平強。馬來西亞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163-175頁。

林廷輝、方天養 (2005) 馬來西亞新村——邁向新旅程。吉隆坡：策略分析與政策研所

林勇 (2008) 馬來西亞華人與馬來人經濟地位變化比較研究 1957-2005。廈門：廈門大學。

侯政宏 (2002) 馬來西亞華人政治參與之研究——兼論華人政治上的地位與角色。台北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候雅倫 (1995/07/08) 外勞競相湧入，國民紛跳飛機 大馬成勞工出入口國。星洲日報。馬來西亞。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1993) 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市：明文。

徐榮崇 (2008) 跨國的移植於鑲嵌——談加拿大臺灣僑民的移民動機與居住地選擇。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 第39卷(第二期)：40頁。

馬來西亞馬來亞華人礦務總會編著 (2002) 馬來西亞華人錫礦工業發展與沒落。馬來西亞：怡保名洙印務。

馬華公會新村事務局 (1999) 新村成立50周年紀念特刊。馬來西亞：馬華公會村事務局。

張小鳴 (2007年11月) 在皇后頭上動土：菲傭在皇后廣場的日常生活實踐。文化研究@嶺南 8。

張應龍，華人族群的本土化與馬來西亞的國際化。全球化話語下的中國及馬來西亞。何國忠(2007)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

章菁燕 (2010/03/13) 新村情濃：佔地理優勢迅速發展 增江全國「老大」。星洲日報/大都會。馬來西亞。

陳靜瑜 (2006) 1965年後美國華人社會菁英階層之研究。興大歷史學報17: 207 -260。

曾松華 (1984) 華族南移的背景與動向。馬來西亞雪蘭莪 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

黃賢強 (2005) 馬來西亞華人近代史的分期刍議。百年回眸 马华社会与政治。何國忠。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47-62頁

黃應貴主編 (1995) 空間、力與社會。臺北市：中研院民族所。

詹運豪著，劉務求譯 (1997/04/20) 五·一三事件的影響。南洋商報。吉隆坡。

鄒雁慧 (2008) 馬來西亞華人新村文化景觀的變遷：增江新村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趙淑慧主編 (2002) 華人在五洲。太原市：山西教育。

劉一清編撰 (2007/08/31) 珠寶百年拓荒開埠史。馬來西亞：合利印務。

劉祥勝 (1990) 回憶老拱橋。霹靂州河婆同鄉互助會廿十年銀禧紀念特刊。吉隆坡：精藝打字印務社。402-404頁

潘婉明 (2004) 一個新村，一種華人？重建馬來(西)亞華人新村的集體回憶。馬來西亞：大將。

蔡昭媛 (2009/09/19) 雪州最大村·淳樸變繁華 沙登美食鞋業冠新村。光明日報／副刊。吉隆坡。

蔡浩銘 (1992/09/17) 只賣現成傢伙，缺乏熟練工人 生意量增盈利少。中國報。馬來西亞。

蔡浩銘 (1992/09/19) 飲食業新年旺，服裝業有起色 淘金客購物保值。中國報。馬來西亞。

蔡鳳莉 (1995/02/09) 海外拚搏·匯款回馬 跳機客年賺億元。不詳。馬來西亞。

謝仲洋 (2010/02/16) 濫用跳飛機 遊學簽證喊停。東方日報。馬來西亞。

藍冰冰、葉佩盈 (2010/09/05) 華裔公僕招聘會反應熱烈。光明日報。馬來西亞。

藍佩嘉 (2008) 跨國灰姑娘 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臺北市：遠流總經銷。

嚴祥鸞 (2005) 參與觀察法。質性研究 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胡幼慧主編。高雄市：麗文文化總經銷。

饒尚東 (2004) 馬來西亞華族人口生育率下降之再分析。馬來西亞華人人口趨勢與議題。文平強。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

顧長永 (2006) 從區域的觀點看中國與馬來西亞政治經濟關係的變化。南洋問題研究 2006(2): 19-27。

不詳 (1969/06/07) 霹靂州大臣再度籲請人民團結一致促進諒解 協助國家恢復正常。星洲日報。吉隆坡。

不詳 (1995/10/09) 取回護照，重新出發 國人又掀跳飛機熱潮。星洲日報。馬來西亞。

不詳 (2010/04/14) 計劃3年內削減150萬外勞。星洲日報。馬來西亞。

網絡資料

何月雲 (2009/6/1) 納吉訪華意義非凡方天興將隨團。中國報。吉隆坡。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19700> (2011/7/10)

李易駿 (2006) 社會政策與立法十五講 第二冊。
<http://www1.pu.edu.tw/~yjlee/04edition/03/032.pdf> (2010/4/27)

林勇 (2008年9月) 新經濟政策與馬來西亞華人馬來人經濟地位的變化。八桂僑刊 3: 29-33。
<http://cnki50.csis.com.tw/kns50/detail.aspx?QueryID=29&CurRec=1> (2010/12/13)

張吉安 (2010) 拱橋河婆老人說故事。中國報。馬來西亞。
<http://www.chinapress.com.my/topic/family05/default.asp?dt=dialect&art=20100103dialect.txt> (2010/04/04)

梁志華 (2011/4/28) 百萬人外流三分一是人才 我國華裔外流情況最嚴重。獨立新聞在線。吉隆坡。
<http://www.merdeka.com/news/n/18091.html> (2011/6/1)

陳雲 (2009) 居住空間分異：結構動力與文化動力的雙重推進。
<http://www.lunwentuanxia.com/product.free.10000180.1/> (2010/4/29)

陳慧思 (2011/4/28) 佈景板中文文句不通 迎溫家寶儀式惹笑話。獨立新聞在線。吉隆坡。
<http://www.merdeka.com/news/n/18082.html> (2011/7/10)

黃凌風 (2006/4/5) 第九大馬計畫：阿都拉的黨選糖果？。當今大馬新聞網。馬來西亞。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49340> (2010/12/14)

黃潔媚 (2009/2/20) 永久地契與不立尺寸之封。獨立新聞在線新聞網。馬來西亞。

<http://www.merdeka.com/news/n/8852.html> (2010/6/13)

趙俶延 (2009) 盛產木薯風光一時，拱橋新村鄉情濃。中國報。馬來西亞霹靂。
http://202.190.203.175/content_new.asp?dt=2009-08-30&sec=local&art=0830lp08.txt
(2010/4/29)

潘婉明 (2009) 「新村問題」的問題。獨立新聞在線。吉隆坡。
<http://www.merdeka.com/news/n/10071.html> (2010/06/13)

潘磊 (2004/2/11) 馬來西亞政府撥款五千萬幫助華人新村發展。國際在線。
<http://gb.cri.cn/321/2004/02/11/441@64695.htm> (2010/12/15)

鄭達 (2008) 改革開放以來馬來西亞華商對華直接投資。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
http://www.hprc.org.cn/gsyj/wjs/mjdw/200908/t20090824_28580_4.html
(2011/7/10)

賴昭光 (2005/8/22) 黃陳的7-11賣什麼？。當今大馬新聞網。馬來西亞。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9393> (2010/12/15)

謝詩堅 (1984) 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新坡坡文獻館網頁。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3970> (2010/12/13)

不詳 (2005) 國內主要華團對第9大馬計畫的建議。
<http://web.jiaozong.org.my/doc/2009/rnr/wenxian/2005-9plan.pdf> (2010/11/23)

不詳 (2005/11/8) 林冠英：沒按照人口比例撥款 黃家定新村大藍圖將遭遇失敗。
當今大馬新聞網站。吉隆坡。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42741> (2010/12/13)

不詳 (2008/6/15) 張天賜：日圓升值誘人，赴日「跳飛機」劇增。星洲日報。
馬來西亞。
<http://sinchew.com.my/node/70168?tid=4> (2010/12/15)

不詳 (2008/12/7) 倪可敏：全馬首個州屬 霹靂近15萬張永久地契。星洲日報。馬來西亞。
<http://www.sinchew.com.my/node/93471?tid=1> (2008/12/6)

不詳 (2009/6/15) 新村情濃：山丘礦湖成房地產新寵 蒲種醜小鴨變天鵝。
<http://mykampung.sinchew.com.my/node/67642> (2011/5/31)

不詳 (2009/8/14) 多團體抗議華埠貴族化建設。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9/8/15/n2624791.htm> (2011/6/03)

不詳 (2010/6/10) 首相提呈第10大馬計劃：落實改革 全民進步 華教有紅包。光明日報。
馬來西亞。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75997> (2010/8/10)

不詳(2010/7/2) 中國·北京進修3週字圓腔正·納吉兒子華語棒。星洲日報。吉隆坡。
<http://tech.sinchew-i.com/sc/node/166656> (2011/7/10)